



大屠杀后遗症

【美】阿伦·哈斯 著

梁骏 李丽娜 车锐敏 译
北京出版社



大屠杀后遗症

[美] 阿伦·哈斯 著

梁 骏 李丽娜 车锐敏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屠杀后遗症 / (美) 哈斯 (Hass, A.) 著; 梁骏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12

ISBN 7-200-03686-2

I. 大… II. ①哈… ②梁… III. 德意志第三帝国-种族灭绝-犹太人-史料
IV.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00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1999-2970 号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 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The Aftermath - Living With The Holocaust, by A Hass.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1996.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他者文库·审视纳粹

大屠杀后遗症

DATUSHA HOUYIZHENG

[美] 阿伦·哈斯 著

梁骏 李丽娜 车锐敏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82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0-03686-2

K·412 定价: 15.00 元

鸣 谢

非常感激威廉姆·赫尔姆赖克教授和弗洛拉贝尔·金斯勒博士在这项研究中给予我的支持与帮助，也感谢亚历克斯·霍尔兹曼的极大热情。我更要对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表示敬意。为了其他人能够深刻了解大屠杀，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公开了自己的经历和痛苦。

——阿伦·哈斯

FC87-6E 05

作者的话

二战中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有关资料保存得很完整，证实了几乎 90% 的欧洲犹太人惨遭杀害。然而，对于幸存者来说，大屠杀造成的心理冲击却延续到 1945 年以后。无辜者的遇害在幸存者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当有人问一位幸存者：“人类从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他答道：“人类从大屠杀中所学到的就是，可以杀死 600 万犹太人而无人过问。”

《大屠杀后遗症》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即如何看待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幸存者，他们是怎样抚慰心灵的创伤而继续生活。本书介绍了幸存者的生活，他们在过去或者积极抗争，或者对命运逆来顺受，而今天却在对过去行为的怀疑和思考中经受折磨。怀疑和半信半疑导致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爱恨交加。他们亲身感受到人世间的魔鬼非正义地践踏和剥夺他们的一切，无疑这是极端痛苦的经历。当大屠杀的幸存者尽力用多种方式与人友好相处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地下的冤魂在用无声的警告折磨他们。看来使人失却记忆远没有消灭人的身体来得容易。

这也是一本描述人类如何奇迹般地恢复自信的书。您将读到许多幸存者提供的一手资料，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青少年、年轻人、男人、女人，所有人的自尊心都遭到严重摧残，

然而战后竟然又恢复了自信心。

大屠杀的幸存者不久就会与世长辞，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使我们可以观察、研究人类的忍耐限度及其恢复能力。人类需要旺盛的生命力来支撑。

当死神即将临近幸存者时，对我们生者来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来倾听他们的内心独白。

目 录

导 言	(1)
第 一 章 幸存者的不幸	(10)
第 二 章 谁之过?	(38)
第 三 章 无泪的祭奠	(59)
第 四 章 人性脆弱	(74)
第 五 章 面具	(92)
第 六 章 年轻的希望	(120)
第 七 章 无法忘却的记忆	(134)
第 八 章 危机家庭	(151)
第 九 章 上帝看到了吗?	(178)
第 十 章 血债血还	(203)
第 十 一 章 集体的罪责	(222)
第 十 二 章 我们记住什么?	(239)

导 言

我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为了写一本有关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孩子们的书，我查阅了许多背景材料，结果发现了很多关于战后幸存者自身心理调整的档案。我对有关幸存者心理健康的专业调查报告读得越多，就越强烈地感到震惊。虽然那些幸存者并不生活在我的周围，但我这样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的感觉就该因此而麻木吗？那些幸存者难道真的像有些作者竭力渲染的那样，沮丧、冷漠、不能再去爱甚至功能失调吗？

确实，大屠杀的幸存者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迫害。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曾经遭受过生理上和精神上打击的人们，他们所受的迫害已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残酷界限。那些无法弥补的严重摧残，使他们丧失了正常人所拥有的功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固定不变的图片无法对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精确的描绘，我后来的研究调查证明了这一观点。

这是一本有关恢复人类生存能力的书，是一本有关大屠杀的幸存者在被十分残酷地蹂躏之后，又重新唤起生命希望的书。从所提供的观察资料当中您会了解到，那些幸存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尽管他们经历了毫无自尊可言的青春期和成年期，但他们终究都能成功地恢复以往遭到损害的自尊。大

屠杀幸存者不久就会与世长辞，现在是惟一的机会，可以对人类忍耐力的极限、人类坚持生存下去的能力和决心进行案例研究。随着幸存者的死亡率不断上升，也许这不仅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有必要倾听他们对内心活动的描述。

这是一本关于个体而不是关于某种现象或综合病症的书，它揭示出一个多年与恐怖生活在一起的人，是如何避免感情麻木而顽强生活的。

这是一本描述人们如何经历对过去行为的困惑不解与彷徨不安的心理状态的书，正是这些困惑与不安使得他们对生存感到矛盾不堪。

这是一些极度痛苦的故事，因为它们直接来自那些被任意殴打、被剥夺了自由权利的同伴们的悲惨遭遇。尽管大屠杀幸存者似乎在外表上就像你和我一样，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备受折磨——消灭人的肉体要比消灭他的记忆力容易得多。

脆弱的感情可以传染。尽管没有直接遭受到第三帝国的迫害，但是，那些大屠杀中幸存者的孩子们却在其阴影下长大。正像一位第二代的人所说的：“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都在我出生之前就发生了。”听着恐怖的故事，感受着父母们的忧虑、愤怒和痛苦，想象着他们所受到的羞辱和折磨，慢慢地，在那些从未见过纳粹党卫军的孩子们心中，已被灌输了某种程度的不安。

1987年8月，我母亲让我和姐姐陪伴她去旅行，回到波兰，回到过去。我们在特雷布林卡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走访了许多地方。我逗留在犹太人踏上死亡之路的铁路旁，一想到过去的日日夜夜就忍不住地流泪。之后，我经历了这次旅行对我的心灵最有启发和震颤的时刻——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突

然感到有一股强大的磁力要我留下来，我也感到有义务留下来，来分担我的兄弟姐妹们遭受的苦难。

（在1993年的一次访谈中，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的副馆长克赖斯太纳·奥莱克斯讲述过，最近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与他联系，希望死后埋葬在伯克瑙，也就是巨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杀戮中心。是的，那些幸存者们都感到有义务留下来。）

马尔卡·莫斯科维茨^① 18岁时终于在卑尔根—贝尔森获得了自由。在其后的数年里，她的父母、两个兄弟和惟一的姐姐遇害的噩梦总是缠绕着她。正如她所描述的，随着第一个孩子于1948年的降生，才终于可以“安稳地睡觉了”。像许多幸存者一样，时光的流逝和家庭的重建逐渐慰藉了马尔卡的创伤，“再也没有梦到过那些事情。”然而，就在我们安排会谈的头一天晚上，马尔卡不时地被梦中可怕的情景所惊醒。她回忆道：“盖世太保正在追赶我……所不同的是，这次我的孩子和孙子们也和我在一起。我们跑啊跑，我不停地喊着，尽量使自己坚强一些。我相信他们不会抓住我们。然而，当我们刚一转弯，却发现他们拿着枪，站在那里大声喊道：‘不许动！’我尖叫着：‘不！’然后就醒了。”这种持续不断的、脆弱的、下意识的情感明显地弥漫于战后她的家庭生活。

匈牙利出生的艾达·科克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达朝集中营的幸存者，她过去一直隐瞒着自己在大屠杀中的经历。1946年，当传闻俄国人即将临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时，她决定跑到巴勒斯坦去。艾达回忆说：“当我来到以色列，就下决心忘记过去，再也不想那段日子，不谈论那些事情。我现在告诉你

^① 为了保护那些被采访者的隐私权，本书所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字都未用原名。

的，恐怕永远也不会告诉我的孩子们。昨晚，我一直在考虑咱们之间的会谈，我不停地流泪，一切又都回来了。”仅仅是想到采访，就使艾达多年以来设立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戴维·希梅尔斯坦是一位 77 岁的老人，家住郊外。他身着羊绒毛衣和笔挺的华达呢裤子，同我热情握手。然后，把我领到客厅的桌旁。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和一家豪华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他表现出特有的自信。然而，当他开始历数在大屠杀中的遭遇时，其社会角色逐渐消失。当讲到他和他的女儿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其社会角色完全消失了。戴维猛地站起来，边踱步边激动地说着，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们尖叫着：‘该死的犹太人！’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分开了。”泪水顺着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他愈发激动起来，“他们从我这里夺走了我的女儿，把她推进妇女的行列。‘爸爸，别离开我！’女儿声嘶力竭地叫着。”戴维一下瘫倒在椅子上，把头埋在胳膊弯里抽泣着。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试图使自己镇定下来并自责地说：“我不想……哭……我从不在其他人面前哭……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痛苦，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感受。”

为什么这些幸存者同意接受采访呢？为什么他们又一次将自己带到那痛苦的经历中呢？在无数次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极度矛盾地想：我有权力刺激那些受过惊吓的神经吗？在打电话与一些幸存者联系时，我了解到我的问题常常使他们夜不能寐，导致令人不安的后果。安娜·马利尼是一个比利时人，她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特里西恩斯塔特集中营极度恐惧。在我们会谈的 5 个小时里，她总是在哭泣。当她描述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明显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交织在里面。在那里，她被刮掉了身上所有的毛发，被迫裸体而立受

审，备尝羞辱。我问道：“您要不要休息一下？”她回答说：“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都活下来了，这算得了什么？”

这些幸存者想让世人了解真相。希蒙·纽曼通过把自己化装成为波兰人而活了下来。在把他的大屠杀经历隐藏了多年以后，他说：“在没有告诉别人过去发生的事情及我的感受之前，我还不死。”他想让我们了解大屠杀给他留下的全部影响，而不是单纯在1939年至1945年发生的事情。索尔·范戈尔德告诉我：“说出这些是我的一种悼念方式，我要把这次采访献给所有惨遭杀害的人。”——当索尔一家人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后，其父母和怀孕的姐姐立即被送进了毒气室。

幸存者曾经向遇害者许过诺言。的确，对于许多人来说，生存下来，告诉世人他们所目睹的一切，已经成为大屠杀幸存者的主要生存动力。哈里·戈德堡说：“这是我的责任，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原因。”大多数幸存者在获得自由之后，成功地重建起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经历了一种强烈的“向前进，不要回头”的冲动，这种面向未来的倾向并不意味着要忘记过去。相反，对我讲述一切是他们铭记过去的又一证明。

在我离开之前，安娜·马利尼坚持让我喝些咖啡，吃块蛋糕。吃完后，我把盘子放在厨房的水池里并感谢她：“您的谈话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这对您是很困难的。”她打断说：“你不明白，我很高兴有人愿意听这一切，关键是人们不愿意听。谢谢你想听这些，也谢谢你想写这些，这很有意义。”

从来没有人问过幸存者们的感受，也没有人问过他们现在的感受。我们也许已经知道了大屠杀的事实甚至是细节，但是，我们却不了解这种持续不断的情感方面的影响。（尽管我们有时所了解的，只是幸存者的“幻觉”，但是我们也曾经看到过伊利·威斯尔在大量的文献中的痛苦描述。）

心理医生、作家和艺术家都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大屠杀后的病理特征方面。他们几乎不承认也不相信蕴涵在幸存者中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使他们恢复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可以起到超常的作用。许多幸存者较少提及他们战后对身心的积极调整，关键的原因在于担心人们会否认他们身心创伤的严重程度。我们也许有必要强调幸存者战后的痛苦，从而不至于忽略他们过去所遭遇到的巨大的损失和无情的暴行。然而，为了理解幸存者，为了理解人类不甘心永远遭受压抑的顽强精神，我们也必须感激那些劫后余生的成功者。

为了这项工作，我采访了 58 位犹太幸存者。他们来自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丹麦、荷兰、法国、德国、南斯拉夫、比利时和奥地利 11 个国家。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落入第三帝国的魔掌的。现在，他们都生活在美国。其中有几位起初曾移民到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在经历数年的艰苦劳动、生活设施匮乏以及因敌对状态而缺乏人身安全的日子后，最后都选择在美国过更舒适的生活。他们相信，他们都经历过非同寻常的苦难生活。

每次采访都是在幸存者家中进行的，平均持续 4 个小时。除了有 6 位是我在大屠杀纪念集会上初步结识之外，其他幸存者在与我联系以前都是素昧平生。然而，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我和我最新写的书——《大屠杀的阴影：第二代》。

在我接触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拒绝了我的采访。他们反复强调：“我想把所有这一切都埋葬掉。”一位女士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中断了与我的谈话。有些人以前从未提起过经历大屠杀的往事。一些人已经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提供过证明。从未有人参与过像这样对其难以治愈的战争后遗症的非治疗性的调查，而这些后遗症恰恰是他们以前所经受的不幸造

成的。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幸存者来说，大屠杀的经历牢牢地铭记在他们心中。这是必须要流传于后世并且要刻骨铭记的：无论现在有任何困难，它们都无法与大屠杀相比。此外，它已经发生，谁对它也无能为力。人们只能拾起这些碎片，继续前行。

尽管我采访的重点是幸存者们的战后的生活，但是从一开始，我就让他们简要地向我描述其在大屠杀中的情形。我不仅想了解他们调整自身的情况，而且也想让他们触及到那些至关重要的岁月，因为那些事件使后来的生活更加不同寻常。我很清楚，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也许会揭示出在大屠杀期间的某些因素或经历以及它对幸存者战后心理的影响。

当看到这些苦难档案时，我真是悲愤交加，有好几次我都在考虑是否继续这个课题。作为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我是在父母的谆谆教导下长大的，他们希望我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免造成更深的痛苦。“我经历的不幸太多了，你怎么能再让我失望呢？”也许正是这些无意识的话语，周期性地妨碍我作一些决定。

当看到年长的、原本精力充沛的男人和女人哭泣时，真让人坐立不安。虽然他们都已为人父母，而且他们具备保护我们的舐犊本能，但是，我却不得不为他们的脆弱而感到震惊。更值得注意的是，我父母与其他幸存者不仅在经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在感情上也是如此。他们讲话带着口音，手势很相似。

当然，我也希望通过更多地知晓他们的过去，以加深对自己家庭及其他成员的了解。我知道的事实和真相越多，就越能掌握杀害我祖父母、姑姑、叔叔以及其他亲人的详细情况。

所以，我想收集他们的故事并了解其后果。因为采访时间有限，我每次都在为听到更多的事实真相而耐心地等待，同时也不得不压抑住急迫的心情。其中有一点令我深信不疑，那就是这些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尽管有不计其数的关于过去岁月的生与死的个人回忆，但我还是好像从来就没够似的，也许 600 万个受害者就应当有 600 万个故事。对于那些没有生还的人，他们同样也值得让世人了解。在弗洛森伯格 12 月份的严寒中，失去自由的人们是如何被强迫站成一行，剥得赤身裸体，被水龙头喷射。就在那次“点名”中，有 100 多人被活活冻死。

在某犹太人隔离区，有一个大约 4 岁的小孩，她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孩子，甚至纳粹分子也愿意和她说话。一天她自己在路上走着，一个纳粹分子问她想吃块糖，‘闭上你的眼睛张开嘴巴！’然后他就朝她的嘴里开了枪。

因为我们远离事件本身，因为记叙文字太缺乏想象力，与人们的真实感觉相差太远，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材料一定是经过润色加工的，至少具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会变得不真实，或会变成抽象的数字。

对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多数人来讲，这场大屠杀已经是一段遥远的历史片段。但是，对于幸存者来讲，大屠杀却是昨天……和今天。

1989 年春天，我应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邀请，作为访问教授，讲授《大屠杀的心理历史学》。可想而知，我遇到了来自德国大学生的阻力。他们是来听我的关于历史和种族的“最终解决”方面的讲座的。然而，有一天当我讲到幸存者战后生

活时，我感到了一种情绪的变化，一种强烈的关心，一种由衷的同情。事实上，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在 1945 年结束，而这一观念对于那些学生来说却是全新的。这是一种当代现象，这种现象是与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并存的。顺便说一下，临近学期末，学校负责教学管理的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转年春天再来讲授这门课程，并且它有可能成为每年的必修课。然而，在此期间，作为惩罚纳粹象征的柏林墙被推倒了。当我准备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时候，歌德大学突然表现出对此课程缺乏兴趣，借口是财政困难。重新统一为德国人提供了更深远的动力，要求对那段历史缄口不言。

幸存者绝望了。安娜·马利尼悲哀地说：“我很愿意讲述过去发生的一切，因为人们都不相信它。……人们都不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安娜和她同命运的人们非常担心世人忘记或者歪曲大屠杀。安娜理解人们想忘却并远离那些令人恐惧的回忆，但她也敏锐地觉察到，她和那些与她有同样经历的人终会与世长辞，到那时，再也没有目击者能够确切地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许多幸存者也对能有机会敞开心扉而感到由衷的慰藉，感到有责任尽一切努力来激发人们共同的善恶观念。

“我从未谈论过它，但现在我告诉你，就如同告诉了全世界。”

第一章 幸存者的不幸

在对大屠杀做出结论后的数十年里，几乎再也没有有关文章。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里，人们却目睹了各式各样的素材，有大量的历史记录、个人回忆录以及描写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生与死的小说。但是，却极少有人注意到战争的创伤所带来的影响。60 年代末期，来自医疗诊所的报告揭示出大屠杀对幸存者在心理上的创伤。一些幸存者，例如琼·艾默里，就意味深长地写出了幸存者的人格已疏远于社会，他们继续感觉到自己仍然是“不同的人”^①。15 年后，人们把注意力转到幸存者的孩子们身上。人们想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究竟对孩子们造成了什么影响，对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作用。许多提出这些问题的研究人员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近年来，在二战期间还是小孩子的幸存者们已经认识到，其特殊的成长阶段及经历对自己具有独特的影响。

心理医生和有关人士常常把大屠杀幸存者，特别是犹太人幸存者看作是一种单一的现象。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同的犹太人的经历显然是千差万别的。有些犹太人把大部分

^① 琼·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纽约，斯考克肯出版社，1986 年。

时间花在四处躲藏上，另一些人则使用伪造的非犹太人证件躲避搜捕。当成千上万的人因遭到驱逐而不得不在苏联的劳动营里干活的时候，还有许多人生活在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里，长时间地忍受着奴役。少数人走进丛林加入了游击队。幸存者不仅因被迫生存于不同的环境下受到不同的影响，而且也被环境中的“细枝末节”影响着。例如，在集中营里，他是不是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和情感上的支持，由此使得他保持着对人类的信任呢？

大多数幸存者（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东欧的人）都有着其家人被接二连三地杀害的经历，许多人痛失配偶或孩子。但是，有些人却很幸运，他们的父母、兄弟或姐妹依然健在。很显然，在战争岁月里，幸存者的人格是不同于任何其他群体的。心理学家也认为，一个人过去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可能会有利于使他避免今后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东欧最恶劣的集中营里，来自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比曾经长时间住在波兰可怕的犹太人隔离区的人更容易变得心灰意冷。

1946年，一位名叫威廉·尼德兰德的精神病学家，也是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者，在经过多年的诊断和治疗集中营幸存者的临床实践之后，发表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学术报告，认为存在着“幸存者综合症”。他列举了许多被纳粹迫害的幸存者身上的明显症状：慢性焦虑症、惧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疲劳症、臆想症、精神不集中、易怒、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在许多案例中，还有产生幻觉和人格分裂等症状（对

自己评价的改变导致对自我存在的真实感的短暂消失)。^①

利奥·艾廷格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与住在挪威和以色列的集中营幸存者有过广泛的临床接触，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幸存者综合症：

集中营生活导致的最主要的后果，似乎就是人格的巨大改变。它使人的精神脆弱，从而影响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对理智的影响，尤其是对情感生活和意志生活的影响，这一切导致他们很难适应现实生活，使受害者的生活极为复杂。慢性焦虑症、经常被噩梦惊醒或彻夜难眠、白天被联想和回忆所困扰、严重的慢性抑郁、不能享受任何东西、不能与他人一起欢笑、不能建立新的适当的人际关系、不能愉快地工作或融入社会角色。总之，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些都是最有代表性的症状。^②

尼德兰德和艾廷格的报告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群人身上，他们在很多时候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令人震惊的关于集中营的

① 威廉·C. 尼德兰德：《受害者的精神失调：对集中营病理学及其后遗症的理解的贡献》，《神经病和精神病》杂志，1964年第139期，第458-474页。

② 利奥·艾廷格：《在挪威和以色列的集中营幸存者》，伦敦，爱伦和尤文出版社，1964年。另参见T. 戴格拉夫：《大屠杀幸存者家庭认同的病理学模式》，《以色列精神病学年鉴》，1975年第13期，第335-363页；威廉·C. 尼德兰德：《对纳粹迫害下的幸存者的感情失调的精神病学的评估》，见H. 克里斯托尔主编：《巨大的精神创伤》，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8-22页；P. 乔多夫：《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见R. 穆斯主编：《对付生命危机：综合的方法》，纽约，普里纳姆出版社，1986年，第407-415页；P. 乔多夫：《集中营综合症的后期影响》，《普通精神病学档案》，1963年第8期，第323-333页；K.D. 霍佩：《遭受极度迫害的幸存者的慢性反应倾向》，《普通精神病学》，1971年第12期，第230-237页。

纪录片再也见不到了，世界被持续不断的、无可躲避的、紧急的头条新闻充斥着。但是，尼德兰德和艾廷格却坚持认为，大屠杀对于幸存者的影响是持续的甚至是永久的。对战争做出结论，给被囚禁的人以自由，对流亡者进行重新安置等等，并不意味着纳粹暴行的影响就会到此结束。这两个人的研究成果，成为大多数有关幸存者的精神病治疗的出发点。

随后，另外一些专业人士在报告中提出了各种其它的症状和相似的更深入的解释性理论。他们认为，幸存者感受到的极度忧郁导致他们完全脱离社会、离群索居、极度冷漠。死成为幸存者心中抹不掉的奇异影像，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来。^① 他们封闭自己，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人可以理解和体会到他们所经历过的恐怖。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不同的现实之中，在那里世界是一个集中营，这个世界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异化感。

这些作品声称，幸存者永远难以与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自己遭受的迫害，因为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消失，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失去了对人类最起码的信任。他们的内心在不知不觉中经常怀有一种强烈的愤慨，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免受摧残。进而有人猜测，幸存者很难“重新创建生活”，以至于在组建家庭过程中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② 确实，一些幸存者在战后选择了不要孩子的生活，他们不愿让自己受情感的摆布，因为他们害怕再度面临突然的分离。

一些研究声称，幸存者对于情感的反应普遍具有肤浅的性

① 罗伯特·J·利夫顿：《目击幸存者》，《学报》，1978年3月，第40-44页。

② 亨利·克里斯托尔：《心理损害的模式》，见克里斯托尔主编：《巨大的精神创伤》。

质。“精神麻木”或“精神封闭”是曾经用来描述幸存者缺乏感情的术语。在大屠杀期间，他们体验了无法避免的损失和迫害，由此产生出难以忍受的愤怒或恐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敌对环境，幸存者们都封闭了所有的情感，因为情感意识会带来潜在的士气消沉，会使“再多活一天”的信念和勇气减弱。尽管这种防卫在当时是有价值的，但是它的延续明显不合时宜。^①

溃疡、过度紧张和未老先衰等身心失调症状在许多幸存者中显现出来，他们不允许自己的情感宣泄出来。一些研究者概括说，幸存者对战争记忆的巨大压抑导致了普遍的感觉迟钝现象。与这些评估相反，其他一些临床医生报告说，那些经常反思大屠杀经历的病人们都非常悲哀，通常是极度情绪化的。由于以前被压抑的愤怒在遭遇迫害的时候不能很好地发泄，以至于有些人常常伴有猛烈的痉挛。总之，在有关幸存者的精神病治疗的著作中充满着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

幸存者最为黯淡的心理状态也许是他们刚刚摆脱痛苦经历的时刻。那时，先前所遭受打击的印象是最鲜活、深刻的，人们还不能立刻接受和适应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逝去的人们希望得到却永远也得不到的。一些幸存者之所以长期有沮丧和愤怒的表现，也许在于他们没有参加“悼念活动”，即对各种损害进行必要的哀悼。战时，他们不能以此释放郁愤；战后，他们又面对适应新的国家、新的语言、新的习惯和新的责任的种种压力。

然而，正如许多接受我的采访的人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幸存

^① 罗伯特·J. 利夫顿：《希罗西马的幸存者和纳粹的迫害》，见克里斯托尔主编：《巨大的精神创伤》。

者隐忍住在战争中受到的各种精神创伤，因为他们非常渴望再次获得新生，“面向未来，不要回头”。他们不久也体会到，决不会从那些对大屠杀的往事不感兴趣的人那里获得同情或补偿。

当被问及“如何幸存下来”的时候，大多数幸存者的回答是“运气”。他们都承认，许多更健壮或更足智多谋的人都未能幸免于难。他们的确都经历过九死一生，根据少得可怜的情报而作出瞬间的决定，目睹了其他不幸者的死亡。

然而，归为运气也许会有其他微妙的含义。如果一个人相信他的生存仅仅或者多数是靠运气的话，那么他就会生活在焦虑或恐怖之中。因运气而得到的生命就像反复无常的东西，随时都会失去。

人们一般都相信心理学家所指出的有关“正义世界的假设”。为了赋予环境以意义，为了避免世界的运行变化因无目的、偶然的观念而带来忧虑，大家都相信人会得到应有的回报。我愿意相信恶有恶报，因为我大体是个好人，灾祸不会降临到我的身上而应该降临在坏人身上。但是，由于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都没有把其幸存归因于自己的智力、聪明或者非凡的毅力，因此，他们否认这种具有安慰作用的假设与幻想。与此相反，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相信，“在我所目睹和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任何人身上发生。”许多从大屠杀活过来的人都会告诉你：“最好的人、最温和、最敏感、最虔诚的人未能幸免于难。”因此，大多数幸存者都不能重建他们对世界的信任，甚至无法信任生活伙伴，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多数早期的临床报告都歪曲了幸存者的真实面貌。他们大部分是根据病人的评估，而那些病人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能力进行调解。（实际上，那些找精神病医生看病的人经常表现出各种令人厌烦的抱怨。）然而，据我们了解，大屠杀中的幸

存者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寻求过精神治疗的帮助。广为流行的、对幸存者加以歪曲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也许是因为几乎所有从事心理疗法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员都是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进行治疗的，而精神分析都强调精神病理学的假设，这种假设现在则是声名狼藉的。这些临床医学家常常从单一的、个人的案例研究中或者从与为数不多的病人的接触过程中，错误地得出有关幸存者群体的一般性结论。各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都要求一般概括，即对个体差别的事物进行随机抽样，对共同的分母进行通分以及过度单纯化。一位精神治疗医师写道：“由于受害者们仍然害怕来自于权力的处罚和报复，他们表现出服从、百依百顺而且总是胆战心惊的样子。”这种描述也许对某个特殊的病人是有根据的，但是对于大屠杀中全部或者大部分受害者来说就是不正确的。美国洛杉矶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把集中营受难者的行为描述为“被虐待性变态的复归”。他写道：犹太人的受虐狂的需要“引起”了纳粹党卫军的虐待狂的冲动——一种典型的纯精神分析和病理的补充。另外一位分析家指出：

接受奴隶的角色可能会成为幸存者永久的性格特征，一些幸存者的行为就好像他们从未被解放过似的。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发现对智力功能、记忆力以及工作和家庭日常事物之外的兴趣严重压抑的例子……他不停地工作，盲目地服从命令，不表现出自己的任何兴趣或行为，似乎只有这样完全地服从奴隶般的劳动，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①

^① 克里斯托尔主编：《巨大的精神创伤》，第3页。

近期的一些研究继续表露出对幸存者的消极看法。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艾里·纳德勒和丹·本舒香两位以色列学者比较了不同的个性测试结果。在这些非临床（即非精神疗法）的样本中，测试对象一组是来自波兰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另一组则是在1939年以前就来到巴勒斯坦的有着相同背景的人。与早期的移民相比较，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评价自己情绪缺乏稳定，缺乏自然而然的情感表现力，缺乏自信，工作能力低，经常感到沮丧，更容易导致由心理压力引起的症状，更有可能患经常性的失眠，有更多的恐惧感。在纳德勒和本舒香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二的幸存者认为不会享受生活，三分之一的人说多次出现过自杀的念头。^①

我访问过的大屠杀幸存者向我介绍了许多不同的侧面，其中一点与前面提到过的描述截然不同，反映了他们在处理过去创伤时的巨大成功。纳德勒、本舒香和其他研究人员几乎都没有评价过幸存者在处理感情困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及其成功，很少有人提到幸存者的变通性、果断性和坚韧性，然而正是这些性格，使他们适应了新的生活。如果透过“幸存者综合症”或者战后创伤所引发的疾病的临床镜头来拍摄幸存者们的话，他们每天的感情、知觉、思想就会被丢得一无所有。

近来，几项比较研究也显示出，大屠杀幸存者与二战爆发前就来到巴勒斯坦的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心理差别（除了幸存

^① 艾里·纳德勒和丹·本舒香：《40年以后：城市和集体农场的大屠杀幸存者表现出来的长期巨大精神创伤的影响》，《咨询和临床精神病学》杂志，1989年第57期，第287-293页。又见J.沙南和O.沙哈：《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在以色列中年生活转型时期的认知功能和人格作用》，《普通精神病学档案》，1983年第135期，第275-294页；内奥米·莫尔：《来自过去大屠杀的信息》，《当代家庭疗法》，1990年第12期，第371-379页。

者们可能在工作中倾向于投入更多的精力以外)。^① 一位研究人员在对 245 名移民到美国的幸存者进行非临床样本的分析后,也报道说没有发现任何“集中营综合症”的共同迹象。^② 的确,典型的有关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常常被解放后的因素所影响,对于大屠杀的认识程度影响到其身体健康、婚姻美满、经济资源、维持家庭、对朋友的表现及宗教的归属。

有的人因为盼望幸存者的孩子们(独特的一代)能够不再重蹈覆辙,所以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范围内证明幸存者与大屠杀相关的各种反应。然而,正如提出幸存者综合症的一般概括那样,许多调查者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幸存者的症状不可避免地要传递到他们的孩子身上。^③ 有人声称,由于大屠杀的经历从负面影响到幸存者对人类关系的理解力,使得他们无法成为合格的家长,而且这种无能为力已经损害了由他们所抚养的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两位研究员评述道:“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所付出的代价是,内心的不安也许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解放后所组建的家庭当中,这种假设是合理的。”^④ 一位心理学家

① 乔尔·沙南:《幸存者的生存:大屠杀犹太幸存者的后期人格发展》,《国际心理健康》杂志,1988-1989年第42-71期;泽夫·哈雷尔、博亚兹·卡哈纳和伊娃·卡哈纳:《在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的心理健康》,《创伤压力》杂志,1988年第1期,第413-429页;G. 布彻等著:《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孩子们:现状与调整》,《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1981年第41期,第503-516页。

② P. 马图塞克:《集中营的监禁及其影响》,纽约,斯普林杰-维拉格出版社,1975年。又见沙南和沙哈:《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在以色列中年生活转型时期的认知功能和人格作用》。

③ 朱迪斯·凯斯顿伯格:《对纳粹迫害的幸存者问题进行心理分析的贡献》,《以色列精神病学及其相关训练的年鉴》,1972年第10期,第311-325页;伯纳德·特罗斯曼:《集中营幸存者的青春期的孩子们》,《加拿大精神病协会》杂志,1968年第12期,第121-123页。

④ 哈维·巴罗卡斯和卡罗尔·巴罗卡斯:《集中营对第二代人的影响及其表现》,《美国精神病》杂志,1973年第130期,第820-821页。

指出：“既然幸存者的孩子与其父母的大屠杀经历有独特的交互作用，那么，其感情状态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就会可想而知。幸存者遭遇的大屠杀的经历是人类社会关系被史无前例地扭曲的一个明证。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自已的经历与对世界的看法结合起来，并且把他们的观点告诉给自己的孩子们。”^①有人更明确地提出：“基于这些病人（幸存者的孩子们）的临床经验，我们的印象是，这些个体所呈现出的症状和精神病的特征，都带有明显的、类似于国际上的文献所描写的集中营残存综合症的特征。”^②

确实，许多幸存者的孩子表现出相关的问题。当谈到其父母和大屠杀的阴影时，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与其父辈的过分认同经常导致心情抑郁。另一方面，那些选择从大屠杀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的人，却依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内疚。^③他们眼看着自己同亲人分别开来，这是极其痛苦的。与幸存者父母的认同使孩子感到一种亲近感和理解；放弃父母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性格特征（例如抑郁或生气），也许会让孩子感到自己是不孝顺的。

我们发现，另一种极端是，一些幸存者的孩子觉得他们的父母被大屠杀的幽闭恐怖症和绝望情绪困扰着。他们渴望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不愿深陷于死亡和迫害而无力自拔，不要反复提醒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差异，不想陷入恐惧与悲观主义的泥潭。一位幸存者的孩子说，她有目

① 安娜·卡洛德纳：《集中营幸存者的孩子们的社会化》，博士论文，波士顿大学，1987年。

② 哈维·巴罗卡斯和卡罗尔·巴罗卡斯：《集中营的影响》，第821页。

③ 阿克塞尔·罗塞尔：《集中营幸存者家庭后期的精神影响》，《美国矫正精神病医学》杂志，1974年第44期，第611-619页。

的地选择进入一所白人贵族学院上学，以便逃离其狭窄的、聚焦于犹太幸存者的世界。另一个人说：“我竭尽全力不像我父母那样，不吸收与大屠杀有关的东西，这就是我如何使家庭生存下去的办法。”

对于许多孩子来说，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并且放弃照顾幸存的父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父母也许表示过，他们不能忍受再次的分离，哪怕这种分离是在父母和其长大成人的孩子之间正常形成的，有助于孩子的独立成长。与孩子们的分开，会使他们联想到以前的分离以及家庭成员的离散。幸存者也许并不理解孩子的内心矛盾，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了解，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与自己的父母自然而然地分开是有好处的，他们都没有体验到这一过程的重要性。最后，为了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为了减轻内疚，一些幸存者也许会鼓励他们孩子的依赖心理。“你将证明我活着的意义。”这种证明完全是幸存者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所做出的。

事实上，我们发现，第二代人对于发生在他们出生以前的事件的反应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在同一个家庭中，对于大屠杀的历史或者父母的独特经历，兄弟姐妹们经常表现出不同的看法。一些人的愤怒、恐惧和丧失感比另外一些人相对要弱。^①

显而易见，大屠杀幸存者在 1939 年以前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与特征。幸存者在战争时期的不同环境及其特殊经历（例如，目睹父母或孩子被杀害），也为他们今后调整和变化做出了解释。一些研究者天真地把自己假定的、内在于不同条件下

^① 阿伦·哈斯：《大屠杀的阴影：第二代》，纽约，伊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又见 N. 索尔科夫：《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们：对文献批判性的评论》，《美国矫正精神病医学》杂志，1981 年第 51 期，第 29-42 页；S.L. 拉斯廷：《失去的遗产》，《当代精神病》杂志，1980 年第 11 期，第 32-43 页。

的压力系数进行量化分析，把它们与幸存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评估说，把自己伪装成非犹太人要比关在奴隶集中营里的人经历的苦难少；躲藏在阁楼里要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关上6个月遭受的创伤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的幸存者的团体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加的受苦的等级。那些生存于“更温和的”环境中的人，在说出自己的经历时总是犹豫不决，而那些生活在“最差”地方的人则相反。

然而，人们究竟应如何测量恐惧呢？在犹太人的传闻以前，16岁的玛莎·贾纳斯从她在波兰切尔姆的家乡逃到华沙，说着一口流利的波兰话，没有犹太人的口音，一头金发。她大胆地冒充自己是波兰人，后来成为在德国工作的志愿人员。在华沙以及3年的德国工作期间，她不仅生活在持续的恐怖当中，害怕面纱被揭开，而且也伴随着可怕的孤独感。“每天我都能看到死亡……我是多么的孤独。我多次想到过全体犹太人会被彻底灭绝。”由于有虚构的经历作保护，使她得以在波兰生活下去。玛莎每天早上都做弥撒，她低声对我说：“直到今天，我每时每刻都随身带着念珠。”

即使这位大屠杀幸存者从未有过被人枪指额头，或是在集中营的早点名中被挑选出来而多活一天的经历，她也很明白，像她一样的人终将被杀害和毁灭，纳粹根本不容她这种犹太女子的存在。因此，她每日被迫面对死神。此外，正如幸存者对一切有关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例如，人是不会受伤害的）的假设统统破碎一样，她对于世界是一个正义之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假设也注定要破灭。

观察表明，在大屠杀中，大部分坚决抵抗的游击队员，并没有失去自我，他们没有因为感觉到无力抗拒而变得逆来顺受。贝里尔·海曼回忆起当年在波兰抵抗运动中掩盖自己犹太

人身份的情景。当时，他暴露了犹太人的真实身份，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在他逃脱反犹太主义的控制时，成百上千的犹太人却因为他们试图参加其“同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惨遭杀害。

任何特殊压力的潜在影响往往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压力的感知能力和应付能力。人的防卫机制，例如拒绝承认，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适当的反应，但是在易引发灾难的环境下却不失为求生的一种方法。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活着出来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罗丝·弗里德兰德却不信此说，“我知道不可能活着离开奥斯威辛集中营，或者是从烟囱出去，或者是被拉出枪决。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死。”罗丝终于活着出了集中营，使不可能的事变成事实。如果她没有活着出来，就无法回答：如果人们真的认为没有希望获得自由，为什么会继续忍受非人的折磨呢？

大多数被关在集中营的难友们都花大量的时间去幻想，有些人逃避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野蛮行为，其他一些人非常希望自己不去考虑痛苦的话题。“在集中营里我强迫自己，不要流露出对妻子儿女的思念，因为我如果流露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杀了我。”许多受到悲哀情绪打击的人完全绝望了。

除了个人心灵内部的调整方式以外，在每一种情形下都有缓解的因素。如果有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身边的话，常常就会得到某种精神力量，有一种安全感。里贾纳·肖梅尔说：“我总是有与妈妈拥抱的安慰感，这种安慰胜过一切。”当时里贾纳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他相信妈妈“总会想出办法”。费拉·科恩伯拉特的父亲并不在她身旁，但她却幻想到：“父亲总是在注视着我，帮我做决定，告诉我如何去做。”然而，受精神创伤最重的，是那些曾经陪伴着家人的幸存者，因为他们无能

为力地看着他们的亲人走向死亡。

当哈里·韦德尔在分拣来自庞纳的成千上万遇害者的衣物时，偶然发现了他母亲最喜欢的衣服，此刻，你该如何估量他的痛苦与不安呢？

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像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样的黑暗王国，也会出现某些人所处的环境比其他人更有利一点的情况。例如，被分派到可以避寒的屋子里干活，得到一个可以多得一点食物的工作，或者可以临时秘密地用一些物品交换食品等等。但是，纳粹所谋划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杀你，按照这种程序下去每个人注定都要被毁灭。正如幸存者们反复提到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为了能够找到两个人都有可能活下来的地方，17岁的马丁·博恩斯坦告别了他的父亲，一个正躺在伯克瑙集中营顶层床铺上无法行动的人。马丁被转移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这儿的感覺有点像天堂，我头一次有了一个床铺、一条毯子和一点食物。”

当然，因大屠杀而产生的生活压力和创伤，并非始于集中营。最初犹太人得不到某些职业和必要的受教育的机会，犹太人的孩子被禁止与非犹太人的孩子一起上学，后来则关闭了犹太人的学校。物品被剥夺，个人权利和隐私权被践踏，犹太人被逼穿上带有黄星的衣服，拥挤在犹太人隔离区。索亚·博恩斯坦描述了那种野蛮行径所带来的羞辱：“女人被强迫搜查身上值钱的东西。他们不相信你，他们居然向下搜到那儿……尖叫声，太可怕了！”贝拉·科恩布卢思阴郁痛苦地回忆道：“当德国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出人行道，你相信吗？……为什么？难道我不是人吗？为什么？”

驱逐和种族灭绝阶段开始于1942年，犹太人在心理

上遭到致命的打击，只有微乎其微的客观机会和几近全无的主观机会可以逃避灾难，人们甚至缺少共同的心理准备去面对死亡的威胁。^①

哈利娜·伯仁鲍姆在12岁到15岁期间被分别监禁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马丹尼克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我只有13岁，在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里，我被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而马丹尼克集中营的情况更为糟糕，几乎把我压垮。在犹太人隔离区受迫害的岁月里，我失去了父亲和兄弟。最让人痛苦的是，我失去了母亲，我的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在我应该尽可能地奋起抵抗的时候，我彻底绝望了……”

“在马丹尼克集中营我们不得不为一切而打架：晚上在小屋子里要找到一小块能伸开脚的空隙；要找到一个生了锈的碗，否则就别想得到令人难咽的一口汤，别想喝又黄又臭的水，但是我不会打架。在我看到女囚们为了争夺一小块地板而打斗不休的时候，或者为了冲向汤罐、抓到汤碗而打成一片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的恐惧和惊骇。充满敌意的、敢作敢为的女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从远处惊恐不安地望着她们，如果不是赫拉嫂悉心保护和照顾的话，我实在活不了几天。赫拉曾小声地对我母亲发誓说她会代替她的位置，她信守了诺言。”^②

哈利娜带着对赫拉的感激结束了她的谈话。许多集中营的幸存者都欣然承认，倘若没有别人及时的忠告、感情上的支

① 沙南：《幸存者的生存》，第47页。

② S. 戴维森：《集中营犹太囚犯之间的人类互助》，《在纳粹集中营里》，耶路撒冷，亚德，瓦谢姆，第555-572页。

持、身体上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活到今天。哈利娜的见证也说明，使幸存者软弱无力的不仅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且还包括他们亲眼目睹的事情：反复无常的殴打和枪杀；在卑尔根-贝尔森的人吃人现象；在洛兹犹太人隔离区，婴儿被从医院四楼的窗户扔出，落到人行道上。恐惧、人类信仰的彻底丧失、对恶毒行径的深度理解，人又如何估量得出这些所造成的影响呢？

在采访期间，幸存者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无辜”。凭什么我们要遭受痛苦？为什么要面临灭顶之灾？幸存者反复问着这些问题。把他们的命运解释为是对过去所犯的罪行或原罪的惩罚，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由于没有现成的答案，幸存者的痛苦进一步延续着，直到现在。

人怎样才能理解这种恐惧？……多少次我不得不赤身裸体地站在纳粹党卫军面前，成为他们的模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身上的任何瑕疵都可能判你有罪……我们在大屠杀中不是生活了5年，而是在毫无人性、羞辱和折磨中生活了1000年。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相同的：恐惧、恐惧、恐惧，10倍的恐惧。如何幸存？如何不挨饿？如何不挨打？我还不得不总是保持清洁。我每天都问我的姐妹：“我看起来干净吗？”如果你不干净，就会完蛋。

我是人，为什么德国人来的时候我要让开人行道？他们怎能这样对待我？简直荒唐。

幸存者除了自身的遭遇以外，还有众多的因素决定其所经历的生活压力的大小。在众多例子当中最为痛苦的一例，目前

在心理学上仍然无法解决的，就是让幸存者突然离开自己的妈妈、爸爸或是孩子。这是突如其来的刺激。被迫的分离产生了无依无靠、完全的孤独感。

我和妈妈一起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当时是夜里，有灯光、狗和尖叫声……我非常害怕。妈妈抚摸着我的脸说：“别担心，我们会好的，别担心，我们会好的。”然而只过了一小会儿，她就被带走了，我尖叫着跑去追她，“妈妈！妈妈！”……她伸出胳膊，带着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表情。

令人意外的是，大屠杀的痛苦遗产，反而使幸存者增强了自信心，并且保持到未来。“我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活下来，就能在任何情况下活下来。”这是那些生活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人所弘扬的主题。的确，他们的恐惧为下一次屠杀做了准备，但幸存者以饱经磨难的精神财富顽强维护着他们的权利。这个世界及其居住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证明着他们对付邪恶和毁灭的能力。

但是，如果一个人总是时刻准备着，警醒着，对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的威胁都反应迅速而紧迫，以至于反应和警觉过头，那么这种对待环境的态度本身就急需治疗了。因为真正的危险不仅是这件事或那件事，而是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看成如同大屠杀的再现。

在我的幸存者调查记录中，并不包括在大屠杀期间还是小孩子的人们。很多证据表明，他们在那时所受的精神上的影响不同于那些比他们年岁大的人。大多数活过来的人很自然会从那段挣扎中产生一种自豪感。但由于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幸存

者们年纪太小，所以他们并不记得（真实的或虚构的）熬过那段日子所需要的勇气和受压迫后所产生的反弹能量。他们战胜那些迫害并不是由于自己主观的努力，所以难怪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很少。

“许多当年是孩子的幸存者非常想记住一些东西……他们想了解更多一些，因为他们想搞清楚这一切。他们说，自己失去了童年，并且在他们的过去有一段‘空白’……他们所缺失的记忆被空寂、麻木和虚无的感觉充斥着。……他们常常抱怨自己身无归属，既不属于成人幸存者，也不属于自己孩子的那一代。”^①

直到最近几年，成人幸存者才意识到，大屠杀期间的生活对那些比他们年龄小的人肯定有潜在的精神冲击——你只是个孩子，你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因为收留你的非犹太人以为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你相对比较安全——这些身为儿童的幸存者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记得，并且因为他们遭受着一种并非真正的“幸存者”的待遇，所以他们丧失了公布自己身份的权利。

当更多的儿童幸存者得知自己的身份，宣告他们属于幸存者的行列后，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② 在修道院里或是在非犹太人家中，有时我们会发现犹太人对自己的身体

^① 朱迪斯·凯斯顿伯格：《想象与回忆》，给分析研究所的讲座，耶路撒冷，1987年。

^② 见朱迪斯·凯斯顿伯格：《大屠杀的儿童幸存者——40年后：反思与评论》，《美国儿童精神病学杂志》，1985年第24期，第4页；Y. 甘佩尔：《我是大屠杀幸存的孩子，今年50岁》，见A. 威尔逊主编：《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家庭》，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90年；朱迪斯·凯斯顿伯格和Y. 甘佩尔：《在大屠杀氛围中成长》，《以色列精神病学及其相关科学》杂志，1983年第20期，第1-2页；萨拉·莫斯科维兹和罗伯特·克雷尔：《大屠杀的儿童幸存者：对生存的心理调整》，《以色列精神病学及其相关科学》杂志，1990年第27期，第81-91页。

份有一种很矛盾的态度。（“做犹太人真可怕。我不想受那些更强悍的基督徒的攻击和迫害。不，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些孩子困惑不解，在生命的紧要关头他们不愿意放弃非犹太人的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

许多儿童幸存者经历了极大的挫折，他们的记忆中根本没有美好的回忆，甚至有些孩子还经历了被遗弃后的极度恐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仍然存留着当年收留他们的非犹太人的威胁：“如果你不做一个好女孩儿，就别想再呆在这儿。”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与其他有父母的孩子相比，这些孤儿有着明显不同的忧虑。

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和一位在大屠杀期间被遗弃的幸存者的谈话。1946年他到了美国，与叔叔婶婶住在一起。他哭着说道：“他们急于让我叫他们妈妈和爸爸，这使我很恼火……很受到伤害……我想要我自己的妈妈和爸爸。”

幸存者们都一直生活在他人的怀疑当中，与之谈话的人至少也在猜疑——你没有夸张吗？一点也没有吗？当然这种态度会加重以往的经历对他们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因此在1954年，西德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目的是对那些曾在大屠杀期间受苦受难的人给予一定的赔偿金。但是，为了证明是否有资格获得赔偿，幸存者必须接受大量的医学和精神病方面的检测。检测者通常是德国籍的医生，证明的费用需由幸存者承担。他们还要将现有的症状同以前遭受纳粹的迫害建立起某种因果联系。西德赔款办事处经常遭到一些幸存者的抗议，因为德国医疗卫生组织强迫他们做一个自我声明：幸存者们的症状都是由病态的体质造成的。这些医生声称，幸存者们在婴幼儿时期就患有恐惧症，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伤害，这就导致了以后所出现的种种问题。

威廉·尼德兰德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

性格形成学经常把原因过多地归结为“体质”，归结为其他事件或天生的因素……归结为幸存者和其父母之间在其生命的头一两年就有的某些因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4至5年里，全部或者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毁于一旦。人性的完全丧失，长期的饥饿，人的权利被剥夺，这些竟都被认为是偶然发生的因素。这纯粹是无稽之谈。^①

的确，尼德兰德和其他人早期强调的精神病理学也许是受一种愿望所驱使，也就是想使其同事们对精神创伤的影响更为关注。也许多数人的意见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进行的、从访谈中概括出来的幸存者综合症，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因为，各种伤口已经治愈，至少也已经结疤。

1939年，巴巴拉·洛温斯坦与其父母、两个兄弟和妹妹住在维尔纳。她被父母送出犹太人隔离区，在乡下被非犹太人隐藏起来。3个月后，由于孤独和思念父母，她回来了，在里加的凯泽沃尔德集中营忍受了一年的痛苦，最后在1944年的春天被驱逐到斯塔索夫。因为身患斑疹伤寒症和营养不良，她被英国解放者带到一家德国战地医院。那里的德国医生在军装外面套着白大褂，为她治疗。“当我看见他们时，我尖叫起来。我以为他们要给我注射致命的药剂。”

巴巴拉告诉我有关1959年她和一个德国精神病医师的一

^① 威廉·C. 尼德兰德：《对集中营生活的心理压力和防御及其后遗症的解释》，见克里斯托尔主编：《巨大的精神创伤》，第63页。

次面谈。医生问她各种问题，评估她的受害程度和随之而来的要求赔偿的权力。“我想我又在希特勒的土地上了。他竟说我是假的！在我与父母见面时我大哭不已，可他却嘲笑我，说：‘我听到过许多比这更糟糕的故事’。”

解放以后，大约 25% 的犹太幸存者（10 万人）移居到美国，与此同时，55% 的人（35 万）前往巴勒斯坦（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10% 的人留在欧洲，10% 的人分散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阿根廷。在美国，幸存者与当地犹太人见了面。美国犹太人不久就明确地表示出，不愿意听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对没有经历其同胞的命运而感到不安，他们立即提出在大萧条期间和二战期间汽油定量配给时的物品匮乏的历史——不要用你们的恐怖来打扰我们，我们也有自己需要忍受的贫困。由于他们对其同胞们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暴行一知半解，所以导致了許多令人不快且不适宜的类比。

美国人的责问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为什么你当时不跑？为什么你不还击？为什么你不做一些事情？当然，部分美国犹太人对幸存者的责怪，是缘于对当时恶劣的境况、微乎其微的选择权、纳粹的阴险毒辣以及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缺乏理解。如果我们相信其他人之所以牺牲，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自己所能做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仍可以继续维持这种幻想，即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同样的灾难。

以色列人同样也不善待幸存者。汉丝·布兰德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聚居区度过了她的早期阶段。汤姆·西格维是一位以色列的新闻记者兼作家，他记述了汉丝的经历。

每个人对地都很好，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听她所诉说的遭遇。相反，他们往往讲述自己遇到的麻烦。阿拉伯人如

何进攻以色列聚居区，一枚炮弹落在鸡笼子附近，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这些。他们正在谈论他们的战争以避免听她的经历，似乎他们对大屠杀羞于提及。后来，他们建议她把两个儿子送去进行精神病治疗，她没有这样做。一个儿子后来死了，另一个儿子在纳哈尔索里克核电站工作，后来在驻波恩（原西德首都）的以色列大使馆工作。那些知道她的经历的人总是在问她，为什么她和她的丈夫不早点反抗纳粹？他们总是不断地问她是如何活下来的，直到她开始感到自己不应该活着。他们把她和其丈夫讲述的经历与波兰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①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比不上后者，认为他们仅仅是为生存而战，不是英雄。这个国家需要英雄，但是布兰德夫妇仅仅才能提供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然而，人们根本不知道当时想要生存下来是多么的艰难。他们不想了解这些，他们只想听光荣的故事。^②

美国犹太人常常对这些“新来的人”敬而远之，担心自己受到不良影响。

我和丈夫在婚前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种狂热的浪漫史。他早先爱上一位姑娘，但是没有幸存下来。而我当时和另一个没有来美国的男人在一起。我想我们在婚前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所以我住在中西部地区亲戚家里。我的堂兄妹们是美国犹太人，他们是典型

^① 1943年，波兰华沙犹太人区的6万名犹太人举行暴动。纳粹分子动用坦克、大炮以及大批武装部队进行镇压，历时28天。——译者注

^② 汤姆·塞格夫：《第700万》，纽约，希尔和王出版社，1993年，第471页。

的中西部人，友好而慷慨，同时对我也有某些担心。要知道，集中营的经历使人们不会与你亲近，所有到过我堂兄妹家的人，总要向我问一些问题，例如，我之所以幸存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我与纳粹党卫军睡过觉？^①

以色列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个真正发展自我的机会，就像拓荒者为犹太人建造家园和避难所一样，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新生和康复同整个国家的再生和发展联系起来。由于不稳定的战事局面，人们可以通过行动拥护国家的主张，来发泄内心的愤怒。后来对阿拉伯国家战争的胜利，使他们增强了昔日受过伤害的自尊。以色列连绵不断的危险境况有助于幸存者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世界，因此，也许会防止他们过多地把精力集中于自身。

然而，就像在美国的情况一样，以色列的生活并没有为幸存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心理上的安慰。强行推进到战争地带后，这些新移民发现，他们正在与另一个想灭绝他们的敌人作战。刚刚经历过迫害和痛苦的人们，其生存再次陷入危险境地。在战争胜利以后，以色列人只希望像斯巴达人那样刚毅顽强，继续勇往直前，在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

对移民到危险领土上的幸存者打击最大的，也许是那些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塞巴人所强加的心理压力。塞巴人坚持说，那些犹太团体不像我们，我们不会像温顺的绵羊一样任人宰割。嘲笑幸存者的笑话广为传播。比较流行的一个笑话开始于这样一个问题：“你可以把多少犹太人装进一个烟灰缸？”在50年代，年轻的以色列人戏谑地给那些幸存者取名为“肥皂”。它

^① 多萝西·拉比诺维茨：《新生命》，纽约，阿冯出版社，1976年，第66页。

涉及到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是纳粹用那些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尸体制作肥皂。

由于幸存者遭到谴责，所以他们不便说话。当很多以色列人为幸存者提供支援时，另外一些人却责备他们，好像幸存者是以谋杀其亲属为代价才得以生还似的。幸存者根本没有被看成是英雄，反而被认为是所有光荣的现代犹太人必须回避的，他们的历史受到排斥和否认，即使是在自己人当中，在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幸存者也被迫免开尊口。1949年，戴维·本—古里安^①把幸存者的不幸归类为“令人沮丧的材料”，这些人需要用“国家的纪律”重新进行教育和约束。几年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莫舍·沙雷特宣称那些幸存者是“不受欢迎的人”。

1989年6月，由奥纳·本多尼夫和达夫纳·卡普兰斯基导演的电影《大暴雨》首次在以色列电视台播出。以色列人看到了在犹太复国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者耶胡迪特·亨德尔所描写的种族分裂。其中有关劣等种族和优等种族的说法令人大为震惊。

坦白地讲，在这个国家几乎有两个不同的种族。一个种族的人认为，他们是神，他们就是那些在德甘尼亚或者在吉瓦泰姆附近的博罗乔夫出生的那些享有荣誉和特权的人，我就好像属于那些神，我在海法附近的工人居住区长。我们当然可以说，还存在着一个劣等的种族。我们所看到的劣等人是某些有缺陷和驼背的人，是那些在战争后回来的人。在学校我受到的教育是：最丑陋、最卑鄙的不

^① 戴维·本—古里安（1886~1973年），犹太政治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以色列国主要缔造者和首任总理。——译者注

是流放者，而是从流放中回来的犹太人。^①

汤姆·塞格夫在其杰出的著作《第700万》中，写了另一个以色列人的经历：

当伞兵约尔·帕尔吉在完成匈牙利的使命回家几天以后，他前往特拉维夫的一个老兵俱乐部，那是1945年6月，每个人都用赞美之词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都想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有关犹太人的遭遇的叙述感兴趣。他们想听不同的故事，想听为数不多的人如何像狮子般地进行战斗。帕尔吉写道：“我提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们都问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不反抗？为什么他们像被人宰割的羔羊？忽然，我意识到，我们为那些被拷打、被枪杀、被烧伤的人感到耻辱。人们有一种普遍一致的看法，认为那些大屠杀的死难者是没有价值的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纳粹的观点：犹太人是下等人……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玩笑：“难道我们不是在让自己的600万同胞接受审判吗？”^②

在1949年的民意测验中，80%的以色列人认为，城市中的移民聚集区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90%的人相信，应该“引导”移民去农业定居点；超过50%的人坚持，应该“强制”移民去定居点。^③但是集体农场却非常关心移民的“人力质量”，他们不想接受病人、有犯罪记录的人、孩子或老

① 塞格夫：《第700万》，第179页。

② 塞格夫：《第700万》，第183页。

③ 以色列民意调查所：《对移民范围的公众意见》，1949年10月12日。

人。^①同时，集体农场的成员相信，尽管吸收新的移民是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们强烈反对接纳那些幸存者，理由是他们难以适应集体农场的生活方式。^②无论如何，以色列社会，特别是集体农场，强调个人的需要应当服从共同的利益。

不幸的是，集体农场的共同社区的生活唤起了幸存者对苦难往事的回忆。一位被送到米什马罗特集体农场的移民解释道：“当我在餐厅的桌前坐下，等待服务生到我桌前的时候，我在颤抖。我害怕没有足够的食物，或者我这一桌什么都得不到。”^③

没有人愿意听幸存者所看到的或者所遭遇过的事情。那时，没有人称呼他们为“幸存者”，因为这一名称蕴涵着同情和英雄的含义。在人们眼里，他们只是难民。

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耶路撒冷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审判的刺激下，有关大屠杀的教育才被以色列社会普遍接受（到1979年，以色列学校的课程表中才把有关大屠杀的课程设立为必修科目）。在对艾希曼进行起诉期间，政府要求15年来一直保持沉默、经历了大屠杀的目击者们提供详细的情况，鼓励他们公开令人震惊的细节。国家领导人突然意识到，最新获得的对共同命运的认识是一份无法估价的财富，可以巩固国家的统一，提高以色列在海外的地位。

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如果仅仅把惩罚作为目的的话，艾希曼可能早就在绑架地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加里巴尔迪大街上被干掉了。相反，本一古里安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醒全世界，由于大屠杀，人们

① 塞格夫：《第700万》，第174页。

② 塞格夫：《第700万》，第176页。

③ 《约尔·佩利斯的见证》，弗洛希姆：《莫雷谢特档案》，A972。

有责任支持以色列国家；二是使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牢记大屠杀的教训。那么，在本一古里安的看法中，什么是大屠杀的最基本的教训呢？那就是，以色列是惟一可以保卫犹太人安全的国家。

本一古里安想提醒犹太人自己的归属。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反犹太主义的原因来自于流放中生存的犹太人。当他们不同于其邻居时，他们感到害怕和被嘲弄；而当他们试着像邻居一样，通常比教皇更信奉天主教时，他们又被憎恶。”^①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本一古里安的看法与一些极端正统的宗教权威所提供的、为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说法相似：犹太人自己引起了大屠杀，是上帝对他们不断被同化（和缺乏对上帝的律法忠诚）的惩罚。

国家检察官的助手加布里埃尔·巴赫后来回忆起公开审判的另一个目的：“起诉要达到的目的是，促使以色列青年认识到大屠杀的受害者同自己的命运有关。人们希望这种认同感可以改变以色列青年一代对于幸存者的傲慢态度。”^②

6年以后的事件加速了以色列人的谦卑的进程，好像一下子回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他们感到自己被围困在犹太人隔离区，感到孤独和隔离，谈论着“防止另一次大屠杀”的必要性。对20年前被灭绝的犹太人的认同如今成为可能。

在战后生活的40年里，大多数幸存者都通过工作、通过不去思考和不去感觉来逃避过去灾难所带来的冲击。然而，他们和家庭已经登上了另一个生命轮回的舞台。默里·科恩评论

^① 《从本一古里安到伊扎克·科恩》，1961年4月10日，引自塞格夫：《第700万》，第330页。

^② 塞格夫：《第700万》，第478页。

道：“你的孩子和家庭生活越是不同于过去，你的内心就越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愿望。”他是一位艺术家，也是在爱沙尼亚几个奴隶集中营中的一名幸存者。默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子在庞纳被枪杀。“特别是当未来成为问题，也许变得不太重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又投到了亲人的怀抱。”

流失的岁月导致体能持续不断地损耗，因为幸存者原有的恐惧和脆弱感，他们对这种衰弱愈发敏感。但是，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他们对于配偶或朋友的死，以及儿女们的远离逐渐豁达起来。日渐衰老的大屠杀幸存者也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拥有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多的财富，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情感方面的紧密联系。^①

很自然，幸存者必须经历与同时代人一样的发展过程。根据埃里克·埃里克森的说法，上年纪的人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承担“自我和生命周期的义务而达到一种完满性……因为有些事情不得不发生，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不允许替代的。”^②过去发生的一切，不得不发生。

要幸存者达到所谓的“完满性”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在其内心深处，他们仍认为大屠杀的发生令人难以置信。幸存者不可能对大屠杀“慈悲为怀”，否则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亲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持续不断地作证，证明那些被害人的“无辜”，证明法西斯的滔天罪行。

^① 博亚兹·卡哈纳、泽夫·哈雷尔和伊娃·卡哈纳：《大屠杀幸存者心理健康的预言家》，见约翰·威尔逊、泽夫·哈雷尔和博亚兹·卡哈纳主编：《人类对极度压抑的调整》，纽约，普莱纳姆出版社，1988年，第171-192页。

^② 埃里克·埃里克森：《同一性和生命循环》，《心理学问题》1959年第1期。

第二章 谁之过？

罗丝·弗里德兰德所在的村庄原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后被匈牙利吞并。1944年春天，当罗丝19岁的时候，被流放到一个每天烧死上万名犹太人的地方。

“当我来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我的妹妹和我在一起，那时她才14岁，她能逃过门格尔的魔爪简直是个奇迹。从我们关进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她就吃不下东西。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周只能一次得到一点柑橘酱，她还是不吃。她惟一能吃的东西就是面包片。我经常对她生气。有一次我对她大声叫道：‘如果你什么也不吃的话，就会死掉！’

“不用说，虽然我很清楚我与她的死无关……但是，在心灵深处，我深信是我害了她。没有多久，我们俩被分开了。我去了捷克拉格，那里是处死从特里西恩斯塔特来的捷克人的地方，而她被关到旁边的克拉格。我试图跑过去和她在一起，但被囚犯头抓住，遭到毒打并被赶回捷克拉格。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可以透过铁丝网见面。在犹太人赎罪日前的一个下午，我从别人那儿得到了3个生土豆，我从铁丝网上面扔给她一个。她拾起土豆哭了起来。我告诉她今晚是犹太人的赎罪日，让她祷告……（罗丝泣不成声）……我让她回营房里，约好明

天再见面。我害怕德国人看到我们。第二天，她没有来。接下来的一天，她也没有来……（罗丝抽泣着）……我知道她有麻烦了。直到解放后，犹太人赎罪日那天举行了一个盛大活动，我才听说她已经死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愧疚。或许我应该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找她，和她呆在一起；也许我没有为与她呆在一起做更多的努力；也许为了保全自己我表现得太自私了。希望您能原谅我。其实，如果我跑过去，我的命运也会像她那样。我的思绪非常混乱……但是那些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如果你什么也不吃的話，就会死掉。”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罗丝谈起了她40年后重返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情景。“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我带着女儿穿过纪念馆，透过窗户，我看到满屋的头发。这使我回想起我们刚到那儿时被剃头的情景。接着是装满童鞋的房间，那是最让人难过的。在我看到这些童鞋之前，似乎就有某种东西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看见孩子们被纳粹士兵带到坑前，把他们推了下去。那些孩子在运输途中曾经和我们在一起。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所见到的一切。在我看到这些童鞋之前，我一直把所目睹的藏在记忆的深处。因此，我决定要找到那个坑。”

“我们来到伯克瑙，天正下着雪，矗立的纪念碑似乎正在向人们讲述着所有被杀戮的民族的故事，惟独没有犹太人。那里死一般地寂静，风很大，我们站在风中……（罗丝抽泣着）……我似乎听到自己在说：‘如果你什么也不吃的話，就会死掉。’这句话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忘掉。”

“那句话不断在我耳边回响，我像疯子一样转过身来对波兰导游说：‘那些孩子在哪儿？’她疑惑地问：‘什么孩子？’我冲她喊道：‘你知道什么孩子，我要去那个坑。’我们终于来到

坑前。我摘下手套，拼命地扒开地上的雪……遍地都是小块的骨头碎片，我使劲地扒着……我的女儿把我扶起来说：“妈妈，我们该走了。”

“幸存者的内疚”是用来描绘那些在致命的灾难中残存下来的人们情感的术语。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在死亡面前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功能，使自己幸免于难。根据心理动力学的观点，这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可能会把压抑的愤怒发泄在造成其不幸灾难的罪犯身上，发泄在纳粹及其帮凶身上，发泄在没有为他们提供保护、从而使其免受痛苦折磨的父母身上。然而，这位幸存者不是对外进行宣泄，而是转向自身。内疚是将愤怒转向自己的一种表现形式。

幸存者的内疚也可以促使每个人为大屠杀做见证，使其继续缅怀惨遭杀害的人们。许多幸存者对内心深处痛苦的回忆，在提供有关大屠杀的教育资料以及加强对遇难者的纪念方面效果显著。然而，幸存者的内疚也潜移默化地迫使每个人陷入过去而无法自拔，相对地排斥现在与未来。内疚是幸存者对其幸存的自我惩罚。

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来说，“幸存者的内疚”是对战后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内容。^①然而，我却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广泛。也许如果我在战后不久就遇见这些幸存者的话，很可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情况。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内疚的感情，这是相当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当人们渴望新生活的热情被激发出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在我所访问的幸存者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对独自苟活

^① 泽夫·哈雷尔、博亚兹·卡哈纳和伊娃·卡哈纳：《大屠杀的影响：精神病学、行为学和幸存者的透视》，《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杂志，1984年第11期，第915-929页；J. 哈森：《幸存者》，《社区关怀》，1984年6月7日，第11-14页。

感到心神不安，然而这种苦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所采访的大多数幸存者，都因孩子们惨遭杀害，他们却又无力改变儿女的命运而深感痛苦，他们因无能为力和失去子女而备受折磨。83岁的埃丽萨·科恩是我所采访过的年纪最大的妇女。她当时正在进行化疗，用头巾裹着头。互相介绍以后，她问我，在这么美好的夏天是否愿意到后院去坐一坐。我们一同走了出来。就在我拿出录音机和笔记本的时候，她带着辛酸与自责，脱口而出：“我的一个女儿被杀害了，现在你知道我的故事了。”

埃丽萨是在法兰克福出生和长大的。1929年，她搬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位荷兰人。1938年，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移民到美国。1942年，他们向德国有关当局提供“证据”，证明她的祖父是雅利安人，并且她已与犹太人丈夫离婚。这样她才被放过，不必再穿有黄星标记的衣服，而且可以从证件上去掉“J”（犹太人）字。然而，在其后的年月里，因为她的邻居们怀疑她的身份，所以，她不得不带着女儿莉莉在城里不断变换住所。后来，埃丽萨成为一个联络人，为地下工作者伪造证件。结果她被密探跟踪，后来被捕。现在她痛责自己卷了进去，其结果是害了她的14岁女儿的生命。“我能够躲避追捕，没有人证明我是犹太人，我这样维持了一年。我真笨，我怎么能够不顾女儿的生命去冒风险呢？”盖世太保把她逮捕之后，埃丽萨和女儿的艰苦生涯就进入了一个可怕至极的阶段。

回忆这些时，绝对是一种犯了致命错误而又无力挽回的感觉。在那一瞬间，47年前的感觉仍然清晰、强烈。“当他们把我们阿姆斯特丹监狱转移到火车站开始流放的时候，我以为她可以逃走……我本该说：跑啊！……但我没有……我无法逃

脱，但也许她可以。”1944年10月，埃丽萨和莉莉从卑尔根-贝尔森转到雷文斯布鲁克。“她（莉莉）在冬天干活时没有手套和鞋子……我不断地告诉她，劫难结束以后，我要给她所有想要的一切……但是，她却在我眼前变成了一个幽灵……我无能为力。”就在解放前夕，盟军正在逼近，囚犯们被关在火车里，漫无目的地在铁轨上穿行。一天早上，火车停在田边，戒备松弛。有人告诉囚犯一公里外有水。“因为她（莉莉）再也走不动了，所以我让她留在田里。我来到泉水边，用一个铁皮杯子喝水。但是当我想用杯子为女儿灌水时，杯子却不翼而飞，可能是被其他女孩偷走了。我不能给我的女儿带一点水回去（她啜泣着）。”在野地里睡了一晚后，埃丽萨醒了过来，但是她的女儿却再也没有醒来。

老人先年轻人而死本是一种自然规律。然而，由于捉摸不定的命运，许多幸存者强烈地感受到一种非自然的过程。他们看见过的所有遇害儿童无疑都是天真无邪的。他们时常扪心自责：“为什么是我，而不是那些孩子们活下来呢？”

从采访对象那里，我不断听到重复的故事。他们都因为不能竭尽全力地拯救自己的亲人而极度痛苦。有时，幸存者也会找到一些补偿自己“过失”的方法。杰克·戴蒙德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拥有某种特殊的地位，他是一名侍从。“多年以来，我一直怀有幸存者的内疚感，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在奥斯威辛拥有良好的关系……但我却不能救出我的兄弟。他一开始就和我在一起……但我所拥有的各种关系都不能把他救出来。为此，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这件事困扰了我很多年，但它已经过去了……当我在以色列生活的时候，总是想象他本可以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他本可以成为伟大的建筑师或艺术家。他是多么有天赋，在我的兄弟姐妹中，他是最出色、最

优秀的。现在内疚感已逐渐消失，因为我现在投身于以色列定居点的建设，这是非常艰苦的劳动。这儿缺少食物，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所以，我感觉我是在为我的兄弟做事。”

集中营给幸存者的负疚感提供了实践场所，因为那里是人们最基本权利的争夺炼狱。对于马上就会听到死神召唤的人而言，在清晨进行的挑选死亡者的早点名中没有被选中，实在是一种天降的安慰。因为火葬场定额的限制，这种幸运与不幸的冲突每天都在发生着。

71岁的索罗门·戈尔德斯丁是他信仰正统犹太教家庭中的惟一幸存者。他原先住在波兰南部的一座小城。当我问他：“你是否曾经感到过内疚？”他怒发冲冠，激烈的反应令我吃惊。他列举了自己的过失，“我后悔了一辈子，我为没能救出我的父亲、母亲、姐姐而深感内疚。我本可以为他们弄到雅利安人的证明信。我劝他们去俄罗斯，但却没能说服他们。我内疚，我并不想比我父亲富有，我有机会挣到数百万元。我总感到内疚，为什么我所拥有的比我父母要多？也许我错了。我内疚，我后悔一辈子。”

1944年12月，战争快结束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战争进行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被带出集中营，开始行军。当时苏联人已经非常接近了。德国人把我们带出原来的集中营，转移到其他的集中营。天气异常寒冷，我们没有冬衣，没有食物，但是，谁走不动德国人就枪毙谁。

晚上，他们把我们圈在某个农场……好像是个谷仓。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把我们带出去继续走。就这样走了几天，我的弟弟……他真的走不动了，结果被枪杀了。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首先，我们降低到了动物水平，只有生存的本能。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比当时还要恐惧。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活下去，哪怕是兄弟也顾不上了。我不知别人怎么想……我感到很苦闷，不知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这样想，还是在那种情形下这种想法很普遍？我现在有时想，我是否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但那时我只想着活下去，也许我并没有尽力去做某些正确的事或者根本就没有去做。^①

维克托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他一直和他的兄弟在一起。当他正在雷维尔干活的时候，他的兄弟因为疾病被送到格罗西罗森附属集中营芬弗泰臣。他说，在那里除了尸体以外，任何病人都别想出去。他在集中营得到了一份更好（更安全）的工作，但他却左右为难，不知是应该同他的兄弟呆在一起，还是应该自己争取机会比别人多活几天。这成了他后来的沉重负担，那是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痛。“我把他留在那里，而我却活下来了（不断地哭泣）。我什么都可以忘记，惟独这件事无法忘记。我想用某种方法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别人能够理解吗？能够体会我那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和内心受到的折磨吗？”^②

西蒙·纽曼曾经与游击队并肩战斗，他对于我有关幸存者内疚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任何内疚的感觉，我知

① 劳伦斯·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② 劳伦斯·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道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很幸运而且足智多谋。”游击队员告诫自己，必须行动起来，积极抵抗，那就是他们可以活下来的原因，因此也就减少了内疚感。一些游击队员相信，如果其他的人少些逆来顺受，少些天真幼稚，或许会活下来。然而，和索罗门·戈尔德斯丁一样，西蒙对战后津贴感到不安，“每当我吃饭时，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就感到羞愧难言……因为我的父母曾饿得饥肠辘辘。”（他掉下了眼泪）西蒙在我们最初的电话联系中，还告诉我他决不再谈“那些事情”。但在我们会谈的两个小时里，他却低头看着自己交叉的手指，不停地对我说着：“我希望我已经证明自己不是很自私的。在托马斯佐夫我曾有一个10岁左右的侄子。有时我想，我若能带着他，或许他能活下来……几年前，当我遇见那个侄子的父亲时感到十分尴尬（他哭了起来），或许我是可以救他的。”

幸存者的孩子们也不得不抑制住自身的各种感情，如满足感、安全感甚至不安全感。他们经常不断地听到父母对“现在的富有”和“过去的匮乏”的比较。他们常常体会到母亲对已逝去不再的豆蔻年华的渴望。当他们与父母谈论自己的问题时，父亲就会说：你认为这也是问题？你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

当幸存者在新建的家庭里谈到大屠杀的往事时，他们通常都要隐瞒妻儿遇害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关系到自己对现有家庭的热爱与忠诚的问题。“秘而不宣”是一些幸存者的孩子们常常用来描绘自己成长的家庭氛围的字眼，他们常常谈到这个话题。举例来说，在他们长大后，才突然知道自己还有一个长辈活着。戴维·希曼尔斯坦因失去两个孩子而感到愧疚，孩子毕竟不能替代。他也非常爱他战后出生的孩子（或为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感到高兴），不过有时他也会感觉到，爱后

者是对他无力保护的两个女儿的背叛。“你了解……你如此深爱你的孩子……但不能像以前那样爱孩子……不能让死去的孩子嫉妒……正如他们所说的，你曾有过两个孩子，你把他们丢到毒气室里了。千万别因现在好了而得意忘形。”

毫无疑问，家庭成员当中惟一的幸存者，往往要比那些与父母姊妹一起活下来的人更有内疚感。他们感受到更强烈的空虚与孤独。是那些与父母或兄弟姊妹在一起的幸存者影响了他们，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对死者的歉疚心理。因为他们对于救助自己的亲人几乎无能为力。当他面对其他没有尽到同样责任的人时，他可能会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什么。当然，如果一个人家里的幸存者越多，他的异常感就越少。丹尼尔·达维多夫说：“我没有内疚感，因为我的女儿和妻子都活着。”

在另一些场合，我也听到了来自惟一幸存者家庭的人的愤怒之声。他们指责那些比自己父母、兄弟、姊妹更幸运的人的不公正，并对那些有幸与亲人共存的人的好运感到愤怒。这些愤怒在当时就爆发了。1943年底，16岁的塞尔玛和母亲从斯坦索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你不可能理解全身赤裸地站在纳粹分子面前所受到的羞辱。他们剃光了我们的头发，同时快速地挑选。在这次流放过程中，仅有三对母女幸存下来，包括我和我妈妈。他们让我们穿上蓝色号服和大鞋，把我们关押在2号营房。妇女们的尖叫声使我感到非常恐惧。”“为什么我的母亲被杀害了而她却幸存了！为什么我的女儿被杀害了，而她的女儿却活着！”

悲剧性的后果加重了戴维·希曼尔斯坦的负疚感。当比利时被占领后，戴维的前妻原本有机会回到她的出生地英格兰，但是她拒绝离开自己的家人，最后惨遭杀害。当然，在成千上万个家庭中都有类似的悲剧，这些家庭中的成员因为不愿意离

开自己的亲人，而放弃了逃生的机会。

普赖姆·利瓦伊写道：“你会不会因自己挤掉了别人的生存机会而感到羞愧？这不仅是一种假设，而且是一种真实的自我怀疑：每一个幸存的男人都剥夺了他兄弟的生存机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挤占了周围死难者的某一生存机会。这是一种假设，但是这种想法却像一只看不见的小虫子，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不停地啃噬着、折磨着我们。”^① 67岁的巴巴拉·洛温斯坦是6口之家的惟一幸存者，她告诉我说，被送到斯坦索夫集中营的人中只有1%的幸存者。她看到那些比她强壮得多的人死于疾病、毒打和饥饿。“你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你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活了下来？我经常对此感到悲哀。我们是幸运的，但有些人并不认为这是幸运……长时间以来，我情绪低落……人们告诉我这是因为大屠杀……也许是，也许不是。你不要谈这个问题了……我为什么要让其他人为此感到悲伤呢？”你可以用数学的方法解释这个问题。大屠杀期间，在西欧生活的犹太人，每10人就有4个被杀害。在1939年，有将近320万犹太人生活在波兰，大屠杀使其中十分之九的人丧生。10个儿童中活下来的平均不到一个人，为什么偏偏是我活下来呢？

许多幸存者承认，最好的人并没有活下来，他们虔诚、顺从地把自己的命运交托在上帝手中。可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比他们做得少多了——幸存者对此感慨不已。多拉·莱文森感到奇怪：“为什么是我活下来而不是我的父亲或兄弟？他们都

^① 普赖姆·利瓦伊：《淹没者与获救者》，纽约，萨米特出版社，1988年，第81页。

比我能干。我出生于一个正统犹太教家庭，我是家里的惟一反叛者，我却活了下来，而他们却没有。”

为战后的生活寻找一个有意义的坐标，往往可以缓解幸存者的负疚感。对于许多人来说，重新使自己的家庭和犹太民族发达起来，已经成为缓解他们内疚感的共识。但是，当自己的子女们在社会上失败以后，幸存者通常会责怪自己，特别是要为后果承担责任。埃斯特·费希尔的40岁的儿子是一个吸毒者，而她38岁的女儿至今仍未结婚，仍和老两口住在一起。在过去的6年里，埃斯特·费希尔恐惧到不敢单独外出的程度。“为什么我不能使孩子们成功（我曾有幸存者的愧疚）？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活下来了？为什么有这么多麻烦？”

我接触到的幸存者中，有一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不幸与别的幸存者相比较。他们不仅不愿意通过谈论其可怕的处境来引起人们的同情，而且，在内心深处甚至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就好像他们已经死去的兄弟姐妹所承受的那样。埃塞尔·贾诺住在匈牙利的一个小村庄里，1944年春，她和家人被强行赶到犹太人隔离区，迫害接踵而来。同年6月，她和母亲被转押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埃塞尔·贾诺说：“我经常把我同其他幸存者相比，如果我要与你的父母相比，他们受的苦更多，我不能认为自己更痛苦。同他们相比，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了多少苦。我也总把我所受的苦同那些死去的人所受的苦相比。我比较着、衡量着，如果他所受的苦为十，那么我的苦也许仅为九……我需要人们同情，但同时我也对这种需要感到羞耻。”

在后来的交谈中，埃塞尔告诉我，她经常去看有关大屠杀的电影，大量阅读相关的书籍。我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做？”她解释说：“这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我再次重温它，我需要感受它。当我感受不到它时，我就会感到麻木不仁……这可

能有一点恐怖的味道，就像我走出奥斯威辛集中营后还想再回去，重新和过去那个真实的我做一次心灵幽会。我需要那体现了痛苦的自我永远鲜活。”埃塞尔·贾诺认为，她的真实自我就活在感受痛苦及其痛苦的弱化之间。她真实的自我生活在地狱中，后来的生活不过是覆盖在伤口上的疤痕。

那些永远摆脱不了心理阴影的人，实际上已经“死”在集中营中了。在奥斯威辛经受过残酷的折磨以后，埃塞尔还感到必须保持这种认同。她不断地刺激自己的伤痛，因为伤口从来就没有愈合过。正像其他已经死去了的人一样，埃塞尔会死去，他们都是被奥斯威辛集中营折磨致死的。

相反，1939年住在华沙的索娅·韦斯却没有幸存者的内疚感。她认为，所经历的残酷的大屠杀解除了自己的负疚感。1943年5月，她和妈妈刚到马丹尼克集中营，就被立刻分开了，妈妈被送进毒气室。在1943年末，他们把索娅转押至奥斯威辛集中营。截止到1945年1月，她一直被关在那里，之后又转押到其他的集中营。明显不同的是，索娅对于她在恐怖年代的表现感到无比自豪，“我是一个女孩，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如果不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不可能有这种自豪。10个人同我睡在一间屋子里，我们都得了风寒病，但是我却是惟一的幸存者。我是如何活下来的呢？在那恐怖的环境中，我是惟一给其他人希望的人。我希望今天也这样生活。但现在，我认为我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我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坚强了。”

当谈到对其行为的评价时，大多数幸存者告诉我，他们对自己在那段时间的行为感到自豪，至少感到问心无愧。一位妇女就曾问我：“我没同任何德国佬上过床，我为什么要感到愧疚？”许多人也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内心坚强和个

人勇气的结果。他们不断告诫自己，自己比其他人更坚强。68岁的马丁·伯恩斯坦宣称：“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内疚，1948年时我已经结婚了。在犹太人赎罪日的时候，我妻子也想去哭墙，但是我不愿去，最后我们没去。当我和妻子在纽约市王后区阿斯特利亚漫步时，遇到了几位熟人。他们问我为什么没去哭墙。我回答说：‘我怎么可能去哭墙呢？感谢上帝，别人死了我还活着。’与其他人相比，我不是很好吗？……尽管德国鬼子想杀死我，我还是活下来了。我为此感到自豪。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我知道，必须用我的生命做赌注去冒险。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工作就是仔细检查刚到这里的人的衣物，当然，我们必须交出所有的东西。我和其他人偷偷留了一些珠宝，在夜里用它去换一片面包。那时，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你成为枪下鬼，要么你抓住机会取得食物，继续生存下去。”

幸存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极少数能够逃脱迫害者死亡之手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对这种幸运的转折感到不适应。通常，他们会编造出一个富有逻辑性的理由来。正如丹尼尔·达维多夫告诉我的：“我没有任何负疚感，因为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活了下来。”在后来的交谈中，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话题，“我所在的集中营一共有2500人，只有5个人侥幸活了下来。我告诉自己必须活下去，因为上帝不愿意让我这样死。其次，我要活下去，以便告诉世人纳粹所犯的滔天罪行。”

在本·卡斯18岁那年，他告别了住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父母和5个弟弟，参加了游击队。他告诉我，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幸存者的负疚感。“但我出现过三四次这样的情况。三周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母亲，她问我是如何逃脱的……至少在一家里应该有一人活下去，告诉世人这个故事。如果我们都被杀了就没有人讲了。”

如同许多人找到自己生存“理由”一样，经常痛切地意识到负疚感的埃塞尔·贾诺，也一直渴望着对她后来的生活有令人满意的评价。她强调说：“我总是感到必须赚回自己的生命。”

解放后，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幸存者们很快结婚生子。有了孩子以后，这些父母们再回过头来，看着他们的儿女，为自己的幸存找到了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保罗·汉德尔是他的7口之家的惟一幸存者。“为什么我幸存下来了呢？我们之所以活着并不是因为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命运的摆布，内疚是后来的事。我原有三个英俊的兄弟，一个姐姐，她还有一个孩子……开始，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这些。也许你会想，可能我活下来是有目的的。我从没有想到过会结婚，会有孩子。但我都有了，我想这可能就是我活下来的原因吧。”

奥尔加·希梅尔法布为生存找到了一个更为明晰和无私的理由。1944年8月，她和妹妹从布达佩斯转押至奥斯威辛集中营。奥尔加告诉我：“我妹妹体弱多病，我一直在照顾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当我看见父母时，我会对他们说：‘瞧，我把她带回来了。’”

有些幸存者把那种单纯的个人的负疚感转化为对大屠杀制造者的愤怒。米纳·福格尔大声质问：“为什么感到内疚？这是谁的错？”许多人也意识到他们作为幸存者的偶然性。1942年9月27日，伊娃·布伦利克和他的残疾父母（聋哑人）一起，穿过柏林的街道被押送到火车站，他们将被送到爱沙尼亚的集中营。伊娃的哥哥已经在4年前自杀了。伊娃强调说：“我是幸运的，仅此而已。有时我认为，如果有人问我父母这个问题，他们就会说，我们去死，你要活下去。我面临过许多次的生死抉择，但我却从来没有被死神选中过。肯定有什么力量一

直在眷顾我，我为什么要有负疚感呢？你怎能决定谁去死？这不是我的错。我幸存下来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仅仅是靠运气。”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注定要死，但父母却希望孩子们能够替他们占据一个生存的位置。伊娃坚信这一点，以此缓解了心中的负疚感。

海伦·舒瓦茨确信父母希望她继续活下去。海伦认为，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欧洲犹太人不可能预感到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她认识到，在对纳粹的屠杀计划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应该从客观而不是从伦理的角度去观察。“即使在1941年和1942年，我都不知道我父母和姐姐会出什么事。谁又能够预测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知道父母在毒气室中临终思念的一定是我和姐姐……他们可能在庆幸我们没有同他们在一起。”

那些没有表现出幸存者愧疚的人，已经设计出了与之无关的理由。负疚感可能是一种对幸存本身的自然反应。有些幸存者需要为释放压力寻找某种理由。也有少数幸存者，在切断了他们与大屠杀的情感联系后，根本就不可能有负疚感。“我不是那种生活在过去的人”，他们反复重申并且热切希望能够重建新的生活。另一些幸存者一直对所发生的一切迫害、极度的残暴、无法忍受的体罚、亲人的突然离去和自己幸运而偶然的生存感到困惑不解。

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犹太人的反应，特别是那些德国和奥地利籍的犹太人，他们在大屠杀前就离开了欧洲。我们曾经读过许多有关科学家外流、富于创造力的文化精英外流的文章。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那些把家庭成员留在漩涡之中的犹太人，他们在心灵上所受到的创伤。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研究课题的范围。一个早先的病人提供了一些线索，证明了他们从

感情上对这次幸运逃脱的反应。

1935年出生于维也纳的罗丝·克林特，在第一个治疗周期告诉我，她从来不敢对自己说，你值得活下去。当罗丝4岁时，父亲被押解到波兰，她和妈妈跟着祖父母生活。1940年，罗丝和母亲拿到了移民美国的签证。当她在美国长大后，她不断对自己重复这样一句话：“除非我父亲和祖母回到我身边，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快乐。”（其祖父在她前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死了）罗丝12岁时，获悉自己的父亲死于大屠杀。在她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越富有、越成功，就越感受到深深的失落。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她反而能够感到快乐。因此，她开始努力去追寻失败。在与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结婚后，罗丝过上了一种混乱的婚外恋生活。她所有的情人都比她大很多，她似乎在不断寻找能够替代她父亲的人。由于害怕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她一直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现在罗丝已经当祖母了，才发觉自己已经没有资格享受亲密的感情所带来的快乐。“我感到我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快乐的祖母。”她的潜意识总是在刺激她去回忆、感受作为一个祖母所应负的责任，而这些正是她所缺乏的。

20世纪30年代，英国允许犹太人管理局分配已经批准的移民证书的配额。许多申请人不知道，当局的选择都是有政治考虑的，例如，犹太复国主义劳工组织更倾向拣选那些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拓荒者。然而其他人却想为埃策尔组织（一个巴勒斯坦右翼秘密地下军事组织）补充潜在的新会员。不过从根本上说，那些安全抵达巴勒斯坦的移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对于那些幸运的、得到移民签证的犹太人来说，意味着其他犹太人因此而失去了生存的机会。

那些在30年代末逃离欧洲的犹太人经常问我，他们是否

带有幸存者的印迹？他们的提问常常带有乞求的性质，表明提问者在寻求某种解脱；他们的孩子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这反映出，他们需要和那些经受过磨难的幸存者达成谅解，他们为自己没有受太多的苦而感到不安。同时也反映出他们需要得到理解，需要抚平他们因幸存而产生的愧疚。

在幸存者中，甚至出现了更多的、不易察觉的、自我毁灭的心理倾向。负疚感产生巨大的心理折磨，一个人可以忍受它，并以自己的生活成就来冲淡它。然而，他们的羞耻感使其自卑，自认为不配受到关怀。那些曾经体验过羞辱的幸存者，其人性受到进一步的摧残。

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写到：“幸存者有一种终身赎罪的心态。”因为犹太人被纳粹欺凌，“他们既有个人的羞耻，还要担当整个集体的耻辱。”^①另一位临床医生指出，虽然幸存者不能回忆起一些使他们产生负疚感的特别行为，然而在他们心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模糊的感觉，使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罪的。^②普赖姆·利瓦伊提到：“当大屠杀结束时，我们才意识到，对于这场灾难我们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抗，相反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漠然置之……幸存者认为自己应该受到指责或者接受审判，强迫自己认罪。”^③当受到生活在身边的另一类人的羞辱时，他们竟然表现得如此软弱。一些幸存者，尽管外表看上去很成功，但在他们内心却继续体验着羞耻感。

一些社会学家指出，幸存者所蒙受的耻辱和软弱，使他们增强了对自我的憎恨。“在第三帝国的监狱和集中营里，我们更多的是责备自己而不是可怜自己。因为我们太无能为力，太

① 克里斯托尔主编：《巨大的精神创伤》，第4页。

② P·乔多夫：《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今日儿童》10（5）第2-5页。

③ 普赖姆：《淹没者与获救者》，第76和78页。

软弱可欺，自我谴责的心态一直伴随着我们。”^①而且，那些对犹太人的负面宣传，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罪感。

对于大多数幸存者来说，他们在大屠杀中面对极端的不公正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以及他们在战后积极投身于新生活之中的勇气，已经弥补了他们在那段时间的缺失感。至少从外表上看，幸存者评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行为时，还是十分满意的。一些幸存者也回忆起当时他们帮助和安慰别人的情景。他们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一种相当高的自控能力。一位幸存者说：“首先，我感到非常害怕，每天我不得不面对死亡，不得不面对残酷的情景。假如德国人愿意，就可以让他的狗咬我们；或者假如他们愿意，就可以把我们中的一员带到特泽拉普尔枪毙。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会获得自由，太可怕了。你总是在尸体当中穿行。在数小时里，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笔直站着；如果你倒下，就意味着死亡。”他们知道，一个人必须把全部精力用于克服那些看上去难以克服的生存障碍。“我们只关心生存，在集中营里我不记得曾经考虑过任何精神上、道德上或与之相关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当然，一些幸存者对于他们父母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没有为孩子们提供所期望的保护而心怀不满。由于年龄关系，孩子不仅可以很容易地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也可以推卸保护他人的责任。索罗门·戈尔德斯丁假扮成非犹太人，参加了波兰抵抗运动。在1942年，他的同事发现了他的身份并威胁要杀死他。索罗门返回他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家中，一再恳求父母尽快逃走，但是他们不听。他愤怒地说：“我们

^① 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第68页。

的父母不相信在战争中还会有杀戮，所以我们就像是坐以待毙的鸭子。”

纳粹精心设计的骗局迎合了犹太人希望避免最坏结局的考虑。他们确信，作为第三帝国的劳动工具，犹太人会生存下去。纳粹分子告诉他们，“重新安居”意味着更新鲜的空气和更丰富的供应。一些犹太人中了德国人的诡计，认为在东部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并且主动踏上了假想的目标。大多数人依靠他们的熟人，希望快一点使自己摆脱痛苦。甚至当目的地是死亡集中营的消息传到犹太人隔离区时，人们都因为狂热的幻觉而不予置信。

我问：“回首往事，你希望做什么不同的选择吗？”当德国人占领波兰西南部的尼姆斯小镇时，马丁·伯恩斯坦只有16岁。他说：“在1939年10月，许多犹太人背井离乡去了苏联，我妈妈……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他声泪俱下）……她说：‘让我们放弃一切逃往苏联吧。’但接下来却有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例如，天气越来越冷，我们举目无亲，到那里干什么？谁曾想到会发生那样的灾难？”

杰克·戴蒙德是在一个中产阶级现代正统犹太教家庭里长大的。他与5个姊妹一起在德国上中学。“我恨我的父母，因为当时我们本可以离开德国却没有离开。我母亲不相信全世界会让希特勒为所欲为。我劝母亲赶快离开，但由于我们在德国生活得很好，令母亲不愿舍弃。或许我再催促一下就会……我的哥哥去了巴勒斯坦，我们全家人永远也不会原谅他。我们下定决心，整个家庭成员都要呆在一起。”

保罗·汉德尔14岁时，同他的母亲一起离开家乡齐尔兹，被带到洛兹犹太人隔离区。在1944年经历了最后一次转运后，他们被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到达后，保罗想和母亲呆在

一起，但他母亲却打了他一耳光，把他推到男人的队伍中。“我们能做什么不同的选择？不，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即使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知道的话，那么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责任感和对家庭团圆的渴望，限制了一些人丢弃家人，逃到安全的地方。尽管幸存者有那样的想法，但他们最终仍未能护佑自己的父母逃离死亡。他们因此而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与痛苦之中。

我不想丢下父母。有个人到我家里对我说，他可以让得到前往瑞士的证件，但我不能抛下父母。我并不后悔，我不能离开父母而自己苟活偷安。

我希望我能和全家一起离开，我们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德国人到达洛兹时，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光了。我们设法和一群人逃到华沙。但走了大约一英里，父亲说，他要同我母亲和妹妹一起回去，我们这些男孩应该继续走。我的哥哥朝东跑到了苏联边境，但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回来了，因为他为抛弃家庭而感到愧疚。我真不知道如果别人死了，我一个人却还活着，那该怎样生活，我会永远为此而感到内疚。

我什么事也做不了，我陷入困境。在1940年，当我姐姐去苏联后，有几个月，我也逃到巴格河的另一边，但我感觉把父母单独留下很不好，所以我又返回华沙。我很高兴和父母呆在一起，如果在最后时刻我没和父母在一

起，我是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

在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之前，幸存者强迫自己与其他人隔离。他们确信，没有人能领会或理解他们的痛苦经历。幸存者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太软弱天真了。这种想法妨碍了他们与其他人进行正常的比较。他们相信，心理差异使自己不能同别人相比——没有人像我这样。内疚和羞耻拉大了他们与普通人的心理距离。

一个人怎样才能克服负疚感、自卑感和羞耻感呢？一个人怎样才能忘却过去那个痛苦自我，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呢？一个人如何能忘掉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而又将历史与未来联结在一起呢？一个人又应当如何重新高扬自己的尊严呢？

大部分幸存者回首往事的时候，都对他们当时的行为感到无奈。当时，他们经常将自己的幸存归功于运气。不过，他们也确信，幸存需要特别的内心坚强。看看吧，成千上万的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幸存），而我却做到了。在那个非人时期所产生的卑贱的感觉都被一种自我优越感所埋葬了。他们指出，尽管我经历过如此残酷的时期，我仍然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他们重新恢复了自信和尊严。

第三章 无泪的祭奠

悼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精神负担。当人们悼念时，痛苦、悲哀、愤怒和内疚都会随之释放。在人们解除了肉体 and 心灵的痛苦之后，又可以满怀希望地重新进入这个世界。然而不幸的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没有进行悼念活动，他们将自己禁锢在心灵的炼狱之中，任凭昔日的苦难继续灼痛其灵魂。

当我问保罗·汉德尔（一个7口之家的惟一幸存者）悼念死去亲人的方式时，他回答说：“根本无法一一悼念，该哀悼的太多了。我悼念他们的惟一时间是亡灵祷告日（一个为死者祷告的特定节日）。有太多的人需要悼念了。当一切正常发生时，当然可以悼念，然而我却连一个可以凭吊的墓碑都没有。在我儿子的成人仪式上，在那个非常快乐的时刻，我竟忍不住地想到过去的一切。在祷告亡灵时，有时我会痛哭……但慢慢的眼泪就哭干了，有太多的……战后我再也没哭过。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的美国亲戚问我，在战争期间，亲人们都发生了什么事。当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们听后，他们居然没有任何痛心的表示，这对我打击很大……在我结婚以前，我孤身一人，特别是在节假日，我忍不住会哭，但是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哭。”

保罗·汉德尔对我提问的回答，说明有几个因素制约了许多幸存者的悼念活动。他们失去了太多的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姑姑、叔叔、堂表兄弟、朋友等等。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不幸的事件几乎同时发生，人们究竟应该从哪儿开始悼念呢？究竟应该对谁表达其哀痛的情感呢？

在我们的家庭中，失去一位亲人就犹如一个人失去了肢体的一部分。当如此众多的生命肢体在瞬间消失时，人们一定会无所适从。人们的情感麻木了——我是谁？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我怎么会孤独一人？在如此众多的变故中，人们不知应该如何进行悼念。同时，在战后，幸存者急需解决生存问题，恢复生活的稳定，组建新的家庭，投身于工作中去等等，悼念活动因而被延迟了。

当人们开始尝试悼念活动时，又遇到新的阻碍悼念的因素。在大屠杀中，死难者的尸体可能在埋葬过程中被搞混或丢失，幸存者无法进行个体的悼念活动，只能对全体死难者予以集体悼念。索罗门·戈尔德斯丁说：“我每次都要去哭墙祈祷（家庭成员死后要朗诵祷告文），在那里，如果有人问我谁死了？我就会告诉他们，是无法逃脱大屠杀的600万人民。”罗丝·弗里德兰德表述得更为简洁：“我认为我没有权力仅仅哀悼我所失去的亲人，我应该对600万死难者进行哀悼。”对于罗丝而言，这是一种承诺。我能仅仅哀悼自己所失去的亲人吗？（心理学家耶尔·丹尼利指出，幸存者往往用“我们”这一集合角色，取得对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认同。幸存者在叙述他们的大屠杀经历时，一般也用“我们”，而不是用“我”来表述。）^①

^① 耶尔·丹尼利：《论纳粹大屠杀老年幸存者的整合成果》，《老年精神病学》杂志，1981年第14期，第202页。

由于其他人对大屠杀的反应常常是外在的同情，甚至一些在国外出生的死难者亲属以及与此无关的犹太人根本没有反应，这使犹太人无法正常地表达他们的悲痛之情。幸存者尽量避免回忆过去的细节，以便与心灵的创伤保持距离。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也压低了他们表达情感的调门，他们希望抑制住自己脆弱的感情。目睹过大屠杀的幸存者，不断地否认他们不安全感，幻想着：大屠杀碰巧降临在死难者头上，但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周围缺乏同情心的人犯了不可宽恕的错误，因为他们在无意中形成了一种氛围，使幸存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1992年夏天，在耶路撒冷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到以色列社会拒绝接受幸存者一事。以色列当局激烈地反驳：“以色列社会拒绝幸存者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接纳了他们！”我反驳道：“难道还有比拒绝一个人的经历和情感更糟糕的拒绝吗？”此外，在美国的幸存者更为悲惨，他们想融入美国社会，像其他遭受致命迫害的人一样得到承认。作为犹太人，他们厌倦自我欺骗，渴望做一个能自由表达情感的人。但是，他们又不愿意产生不同于其他人的感觉，不愿意让别人把他们看做是异类，不愿意造成与谈话者之间的不愉快。这些又妨碍了他们做凡人愿望的实现。

大屠杀幸存者在重建自尊的过程中，对人们的反应和拒绝非常敏感。移居美国的幸存者，遇到了一种快乐主义的文化氛围。美国人赞美成功、开朗、享乐；与此同时，他们逃避失败、悲观、痛苦。为了能够被社会接受，幸存者需要“将过去的一切置于脑后”。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求幸存者背叛他们的过去，被迫隐藏他们的悲痛。

悼念心理过程的最后阶段是接受死亡，然而，幸存者无法

做到这一点。因为死者的牺牲是不公平的，是毫无意义的。另外，完整的悼念过程还包含着通过回首往事以抚慰心灵的创伤。然而，奇迹般逃脱死亡魔掌的幸存者，急切地希望摆脱以前的脆弱情感和曾经伴随过他们的厄运，不愿回首往事。

另外，在所有一切都改变了的条件下，他们无法恢复保持平衡的能力。安娜·马利尼在解放后回到故乡比利时旅行时，感到十分压抑。她说：“我一到那里，就感到压抑，我感到若有所失，一切都变了。”

生命本能不断地驱动人们向前走，幸存者也渴望着走出死亡的阴影，重新开始生活，而哀悼只能把他们带回到过去。威廉·赫尔姆赖克在其著名的《反对一切不平等》一书中，多次提到幸存者的言论：“我总想向前，不想倒退”，指出了幸存者的美好憧憬。这样的态度对每一个开始新生活的人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但是我相信，这特别的铭言也反映出幸存者隐秘的动机，他们害怕面对过去。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巧合，他无权选择。无情的事实强化了他们的脆弱感。回忆起在大屠杀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死的情景，有可能导致感情的崩溃，毁掉幸存者苦心经营的基业。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幸存者终于觉得有足够安定的心境和充沛的精力来回顾过去，有必要让感情倾泻一下了。

战后，许多幸存者很快重建了家庭，冲淡了幸存者的内心空虚和孤寂，也为幸存者找到了很好的悼念方式。战后出生的孩子们，大都是以被杀害的祖父母和同胞的名字命名的。幸存者担当起养育后代的新责任，他们极力避免孩子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强迫自己将心思全放在适应新环境和做出正确决定上，例如：尽快离开原来的国家（特别是欧洲东部和中部的地方，在那里，反犹太主义再一次昂起它那丑陋的头），如何离

开欧洲，移居到何处等等。

1945年9月，埃斯特·弗拉姆仅仅在她获得解放4个月之后就结了婚。“我悲伤吗？我不知道，我结婚太快了，我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家庭和孩子，我的女儿是用我母亲的名字命名的。我结婚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但为了孩子我必须长大。我想我从来没有悲伤过，我有了新的家庭，很多东西被替代了。我的孩子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全部。”

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自然变化，如老人去世、时间流逝、与孩子们分家等等。然而，人们不能容忍一个专断的人，在无形的宇宙之手的驱动下，作为反动力量，侵犯人类伙伴。83岁的埃利萨·科恩想起了她的家具，“一天，德国人派货车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拉走了。在卡车的一面漆着‘来自荷兰的礼物’的字样。有时，我很想知道，谁得到了我那漂亮的桌子？谁正在我的床上睡觉？”当罪犯仍然逍遥法外，享受着罪恶果实的时候，幸存者该如何进行悼念呢？他们夺走了财物，过着正常的生活，没有创伤；而受害者却忍受痛苦，原有的生活在强力打击下支离破碎、难以复原。

女性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她们的青春期，那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花季，满怀着天真和纯洁的希望。当幸存者以垂老之身回首大屠杀岁月时，无不为在残暴统治和压迫下逝去的花样年华扼腕痛惜。事实上，无论怎样扭曲，它都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特殊时光。对此，许多幸存者都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她们经常谈论起自己不曾拥有的浪漫和永逝的激情。罗丝·范戈尔德说：“我总是觉得我丧失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直至今日，回想起来，我认为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被骗走了，我的少女和青春时代……我从没有过花前月下的浪漫，可以买许多漂亮的衣服，可是我永远不能再拥有那样的时光了。每当我看到今天的

年轻人，就感到嫉妒。在大屠杀的岁月中，在从一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的路上，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被大人举起来，看一下窗外城堡的美丽风光。当时，我有很多的浪漫幻想，我贪婪地环顾四周，似乎在天堂一般，其实我是被锁着的……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中的5年，他们的时光被白白地浪费了。”幸存者急于享受生活的甜美，因此，战后他们匆匆组建家庭。为了留住青春，人们必须争分夺秒。

解放后，一些幸存者麻痹自己，强迫自己封闭对集中营的回忆，从而进一步阻止了他们的悼念。战后，幸存者不仅要面对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而且还要面对大屠杀所造成的心灵的沉重伤害。过于强烈的刺激导致了他们的麻木，而哀悼则需要健全而清晰明白的情感反应。

78岁的多拉·莱文森告诉我：“我想念我的家人，但有时人会变得麻木不仁。我在雷文斯布鲁克和一群来自洛兹的人在一起，我向一位我认识的女子询问我家里人的情况时，她告诉我，我家里所有的人都死了。我回到营地，把这些情况告诉我的嫂子。她问我为什么不哭，因为我当时就像石头一样……我心中悲痛。在节假日，我如同在地狱一般，十足的地狱。孤独……往事的记忆……我过去庆祝节日的经历……我的家庭、快乐、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不哭。”

在开始采访的时候，我像问其他人一样，用常规的方法问利奥·费尔德：“您的父母在1939年还活着吗？”他鲁莽地回答：“我不想谈论他们的事情。”在逾越节期间，利奥总是禁止孩子或者妻子提到他被杀害的家人。“这些年来我就像是行尸走肉……我试着不去想这些。我并不是虔诚的教徒，在犹太新年和犹太人赎罪日我到哭墙去。当亡灵祷告日来临的时候，我崩溃了……（他抽泣着）……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愿想。表

面上看，我做得很好……只是表面而已。”我问他：“既然你知道肯定承受不了，那为什么还要去参加犹太新年和犹太人赎罪日的活动呢？”他哭着说：“我虽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我想保留传统……我仍然非常敬重我的父母……”在我们交谈得比较融洽的时候，利奥·费尔德对我说，如果他事先知道我们要谈论所谓“情感问题”，他可能会拒绝接受采访。

1944年春天，当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索尔·范戈尔德找到他的父母，劝他们逃走。但他的父母认为，一家人必须呆在一起，不能分开。再说德国人也需要劳动力，不会杀害他们。即使德国人会做什么坏事，苏联人也迟早会来解救他们。因此，他们毫不怀疑纳粹提出的安顿难民的提议。就在年仅19岁的索尔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的父母和怀有身孕的姐姐被送进了毒气室。他回忆说：“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躺在床上，想象着如果有一天我父母中的一个人死了，我应该如何生活。我甚至不敢去想象这些，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德国人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了魔鬼。他们将我置于如此恐怖……恐怖得无法描述的境地……接下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度过的几天中，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一个聪颖的小孩一下子变成了魔鬼……毫无怜悯之心的德国人，杀死了那个聪颖的男孩，留下了我，独自过着孤魂野鬼般的生活。

“我用不断的回忆，埋葬了我的父母和姐姐，这也是我可以永远与他们在一起的惟一方式。在‘亡灵纪念日’，我可能会流眼泪，但那不是正常悲伤的眼泪……我在用自己的一生悼念死去的亲人。”

对于许多幸存者而言，回忆意味着悼念。但是，把回忆当成悼念的结果，却使哀悼突破了原有的意义。因为，既然幸存者把回忆当做自己的责任，他们就永远也没有办法完成悼念活

动。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自我麻痹的大屠杀幸存者从不大喊大叫，也不会轻易落泪，但他们也有回忆。这就是说，他们在悼念。但是，在很多时候，当幸存者还不了解自己亲人死亡的具体细节时，就带着那痛苦和悲伤的记忆去世了。

缺乏正视家人死亡的勇气，使幸存者很难圆满地完成悼念活动并对过去抱憾终生。约瑟夫·西蒙把他的家人留在卢布林，自己逃到纳粹东部管区。在苏联边境他被逮捕，并被指控走私及从事间谍活动。经过几周的审问后，他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监狱。当约瑟夫的母亲想在卢布林城外的一个小车站购买前往华沙的车票时，她被人识破了犹太人身份并被当地波兰人告发。尽管约瑟夫并不确定他的母亲是不是在1941年10月31日那一天遇害的，但是每年的这一天，他都为母亲的亡灵祷告。他解释说：“就在那天，她不再为我们而存在了。”

一些幸存者也为自己忘却过去而感到恐慌，对于他们来讲，遗忘意味着背叛。巴巴拉·洛温斯坦为此而烦恼：“我想念他们，但我不知道如何哀悼。战后，我每天都在思考那场大屠杀。我时常想起他们的样子，但我也正在遗忘，那是非常可怕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幸存者记忆中的幻觉和想象的成分增多了，甚至渐渐地产生了迷惑。我所访问过的人这样问我：“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我真的经历了那样的事吗？”随着回忆能力的丧失，悼念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少数幸存者暗暗地避开悼念活动，因为他们还存有一线希望——找到那些逃过大屠杀的亲人。而悼念即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在很多幸存者中，没有目击者证明亲属的死亡是经常的事情，这样的事例为幸存者留下了怀疑的空间。在战争结束的40年中，幸存者们一直周期性地聚集在以色列和美国寻找亲人。当偶然出现一个奇迹般的团圆时，就像是一个火把，点燃

了其他人寻找亲人的希望之灯。

国际追踪服务机构坐落在德国中部阿罗尔森镇的一座三层楼中，它拥有400名职员，已经接受了第1609号申请人的寻亲申请。他们在纳粹德国保存的4300万份文献资料中搜寻——从破烂的印在香烟盒背面的囚犯身份证，到黑色的擦得高高的集中营死亡记录。某一意料之外的证据的发现，都会引发人们如潮水般的新一轮查询。瑞士服务中心是由德国政府资助，国际红十字会管理的。1992年8月，服务中心主任查尔斯·克劳德·比德曼宣布：“我们知道，仅在莫斯科一地，就有30万人等待查询消息。”1989年，莫斯科首次公布所收藏的第三帝国的资料，立即引发了苏联人的查询。国际追踪服务组织确信，在苏联解放东部集中营时所获得的档案材料中，有60万名集中营囚犯的名单。

档案材料至今未向外界公布，而且，由于这些资料涉及面过大，内容过于复杂，很难用电脑进行整理。因此，查询总是从记录“被迫害者”的名字和7.4亿个索引卡片的档案柜中开始。由于考虑到拼写错误和各国登记的多样性，档案材料一直按字母和发音双重排序。档案中心大约每天接待700个查询，其中主要是波兰人和那些被驱逐并被迫为纳粹德国做苦工的人。这些人现在面临着退休，他们希望获得受到迫害的证据，以便得到特别的补偿。

寻找失散亲人的活动，是由那些希望得知父母下落的下一代发起的。当时，49万个查询仍然没有结果。追踪服务组织宣称，证实失踪者死亡地点的成功率只有30%~50%，因此，

只有少数人的查询才有确切的结果。^①

1942年，玛莎·贾纳斯在切尔姆一家被德国人征用的工厂里做工。她听说当晚德军要采取军事行动，来不及回家向父母告别，便只身逃往华沙。从那以后，玛莎再也没见过她的父亲。她否认这件事对自己的不良影响：“我从不参加悼念……我总觉得我的父亲时刻都和我在一起……（她边说边哭）他陪伴我、注视我、帮我拿主意、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我并不是很聪明，冥冥中总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伴随着我，我觉得那就是我的父亲。”玛莎·贾纳斯一直把父亲当作自己的护身符，过去、现在都在保佑着她。

完全彻底地发泄自己的愤怒，是幸存者表现悲痛的另外一种重要方式。在过去40年中，幸存者一直沉浸在愤怒之中。他们因为其他人漫不经心而愤怒；他们因为德国从战争中迅速恢复活力而愤怒；他们对以色列仍处于危险的地位而愤怒；他们对一再担心的攻击却在不断重演而愤怒；他们为自己所过的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痛苦生活而愤怒；他们更为人们对大屠杀的冷漠无视、不公平的态度而愤怒。

杰里·辛格在全家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周年纪念日上記起了一支纪念蜡烛。他说：“我用憎恨来表达我的哀悼。”在我们4个小时的交谈中，杰里一边对我讲述他的故事；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杰里·辛格比我采访过的大多数幸存者更易发怒，但他的愤怒应该向谁发泄呢？这恐怕是另一个问题了。

^① 通过与前苏联的联系和调阅大量有关大屠杀的材料，促使美国红十字会于1990年9月建立了独立的大屠杀和战争受害者追踪和信息中心。设在巴尔的摩的信息中心是一个资料交换所，把各种查找的材料翻译成德文后，传送到阿洛尔森，然后再与各有关机构进行联系。根据巴尔的摩行政部主管苏西·坎特的介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该中心受理了1.1万起寻人启事，大约1万人试图寻找二战期间失散的亲人。

幸存者的悲痛之情一直受到负疚感的困扰。他们总在想，我活着而他们却死了，他比我更应该活下来，那么活着的我又有何面目去哀悼死去的人呢？幸存者自然的哀悼一次又一次地被这种反常的思维所困扰。84岁的丹尼尔·达维多夫对我说：“我思念他们（我的父母），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我虽然宽恕了我自己，却怎么也不能忘记……我想起许多有关父母的事。我父亲是个非常好的人，比我好得多。”他一边说着，泪珠从他的眼角滚落下来。“我多么希望他还活着。在集中营，每当我能多得一些东西，我总希望他和我在一起，那样我就可以帮助他了。”

丹尼尔·达维多夫为不能帮助他的父亲而哀伤，其他人也一样，为过去无力救助亲人而倍受折磨。本·卡斯以前是一个坚强的游击队员，他说自己“从不取笑他人”。他告诉我：“战后在丹齐克，我有一支拐杖，我常常在大街上用它把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本·卡斯向我讲述了他的哀悼方式，“每天我都在想念他们，我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情景。我总是哭……非常难过……他们已经死了，我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了，我现在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思念他们。随着人的衰老，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各种情景又浮现在脑海里。”本·卡斯逃出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后，找到一支可以接收犹太人的游击队。“我恳求我的父母一块儿逃走，我母亲只是问那些神职人员：‘战争何时才能结束？’而他们只会回答：‘坚强些，就快结束了。’”在采访开始时，本·卡斯给我讲述了他最近做的一个梦。在梦里他见到了母亲，母亲问他：“你为什么逃跑？”

本·卡斯经常被两个问题所困扰：“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活着？”现在，他除了想念父母之外无事可做。或许当他记起那些本该在这里、甚至就该像他一样活着的那些人时，才会减

轻作为幸存者的内疚。

在大屠杀中痛失孩子的幸存者，不仅要体验最深重的内疚，而且也在心中举行着永久的哀悼。他们的消沉既反映了他们始终经受内疚的煎熬，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缺乏驱走悲伤的能力。确实，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们的心创从来就没有痊愈过。

许多幸存者把愤怒发泄在自己的出身上，他们对自己不能保护自我信仰感到失望，也害怕因此再遭受迫害。一些幸存者在战后重新确认了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而另一些人却否认他们的犹太传统。大屠杀吞噬了他们的亲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然而，由于他们脱离了自己的种族，拒绝承认犹太人的身份，安排悼念活动就变得更不方便了。毕竟那些死难者是犹太家庭成员，在他们遇害后，只能用犹太人的方式来悼念。

许多实例表明，由于大屠杀期间的隔离带有强制性、任意性，缺乏熟悉的人作见证，所以，一些幸存者无法知道他们亲人死亡的详细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或阻碍了悼念活动。对于幸存者而言，死亡变成一个抽象概念。“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坟墓，没有灰烬，我觉得死去亲人的灵魂在随风飘荡。”战后建立的纪念馆和展览馆犹如没有尸骨的坟墓，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提供了祭奠的场所和内容，对失去亲人的幸存者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近年来，随着历史修正主义者的不断出现，这些场所成为珍贵的史料，同时也是对否认大屠杀历史的谬论的有力驳斥。

一年一度的犹太人“亡灵纪念日”为个人和集体的悼念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种活动具有公共性质，它为防止幸存者情感堤坝的坍塌提供了安全保证。由相似的、真正相互理解的人组成的情感环境，对于幸存者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仪式在特定的时间内举行，不干扰幸存者的日常生活。因此，不会对其

身心调整和正常生活形成消极影响。几个幸存者告诉我说：“只有这时我哭了。”

幸存者们也参加其他的悼念活动。如果他们知道亲人的确切死亡日期，他们就每年为故去的亲人点亮一支蜡烛；如果不知道确切的日子，他们就选择一个相近的日子或象征性的日子（例如，他们居住区毁灭的日子，或者到达死亡营的日子）去做同样的事情。一些幸存者（经常与他们的孩子一起）长途跋涉回到家乡或曾被监禁过的集中营。原先居住过的环境中的气味、景状、食物和声音（想象的或者真实的）可能都有助于情感的复苏。

尽管一些幸存者对他们的信仰持有矛盾的心态，然而他们依旧参加犹太会堂的活动并遵守犹太律法。就像利奥·费尔德提到的：“我不信教，但是我愿意保持传统……我依然敬重我的父母。”保留传统仪式可以使幸存者表达对父母的敬意，让他感到仿佛父母及过去的日子就在眼前。

当幸存者步入生命中最后的阶段时，会有更多的不如意，并由此导致更多的失落感。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重打击——包括所有日常活动范围，性别、择业、业余爱好、娱乐。这使幸存者不能专注于所从事的工作，从而更多地沉浸于对过去的感慨与追忆。^①

日益增多的回忆如同漏斗一般，把幸存者的注意力越来越

^① 亨利·克里斯托尔：《战后创伤情况的自我治疗与整合》，《老年精神病学》杂志，1981年第14期，第176页。

多地吸漏到过去。他所经历的不幸——朋友的死，配偶的死，与孩子们的分离，身体的恶化，都引出了更多的与大屠杀相关的感情联系。这些不幸事件的同时存在，为人们把过去和现在的共同遭遇混合在一起进行悼念提供了机会。

1942年6月11日，索尔·加伯在匆忙中与父母走散，独自留在塔诺犹太人隔离区，而他的父母被送往贝尔齐克集中营。在纳粹的犹太人名单中有索尔的名字，名单里的人都在14岁以下。索尔是那些要送到集中营的人中的剩余人员。索尔自己承认：“我没有悲伤过，我也不去会堂祷告。我每天在家里点燃两支蜡烛，我猜想我的父母已经死了。解放后，我感到度日如年，感到悲伤，但我哭不出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会哭……甚至当我3年前回到贝尔齐克集中营时，我非常想痛快地哭一场，但我做不到……也许因为当我刚要宣泄情感时，集中营就立即钻入我的脑海，那是以牺牲现在的生活为代价的。所以当我去贝尔齐克集中营时，我很伤心，但我表现得很麻木。我抓起一把埋葬着父母尸骨的泥土，把它放进包里。我试着想象父母在火车上时的感受，到达那里后的感受，在毒气室里最后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儿女在婚前一直住在家里。在他们结婚时，我感到一种和失去父母时同样的伤感。在女儿出嫁的第二天，我去散步，我哭了，这是我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一次流泪。”

从心理学上说，所有的损失在感情影响方面都是彼此相似的。对于幸存者而言，这种原则可以帮助他们最后完成悼念过程，但也有可能导致原有感情毫无防备的崩溃。

许多幸存者把正常的衰老现象看作是大屠杀经历的再现。因此，把孩子的成家、配偶和朋友的死亡都当作战争

造成的巨大损失来体验。当他们的孩子追随美国的独立理想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他们把在这个国家里，所有老年人都要体验的被遗弃、孤独、寂寞的感受，看作像大屠杀那样灭绝人性的事情，因而极力逃避。^①

大屠杀的幸存者要进行真正的祭奠是十分困难的。在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中规定，当家庭成员去世后，要立即举办一次悼念仪式。由很多人组成一个悼念的环境，可以使失去亲人的人们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悲痛之情。哀悼过程要持续一周才能最后完成。然后哀悼者在大家的陪伴下走出房间，象征着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

而那些被认定为多余的幸存者，在解放后已经精疲力竭、胆战心惊，惶惶如惊弓之鸟。他们的感觉是依然受到逼迫，在继续逃亡，根本无法组织悼念亲人的活动。战后，当世人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时，谁也不支持和鼓励他们进行悼念活动。几十年过去了，当幸存者慢慢地调整自己，对所经历的自然死亡作出反应时，他们仍然为遇害的亲人感到深切的哀悼。也许，在今天，他们的哀悼能够获得开明家庭和社团的支持，这些人最终会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悼念活动持理解、鼓励和宽容的态度。

^① 丹尼利：《论整合成果》，第 197 页。

第四章 人性脆弱

每个星期六下午，米里亚姆·戈德法布都会来接她的好朋友莱拉·平库斯一起去打牌。莱拉是一个寡妇，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尽管从那天凌晨开始，伊拉克就开始对特拉维夫市进行第一轮闪电攻击，但是这并没有打破米里亚姆持续了10年的常规。这是他们的共同期盼，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可以尽情地欢笑，忘却那些伴随着人生前进旅程的苦难。

像往常一样，米里亚姆先把车开进莱拉车库的空位，然后乘电梯到莱拉住的三层公寓的门口。她敲了几下门，没有声音。几分钟后她更急促地敲门，还是没有反应。她把耳朵贴在门上，隐隐约约听到了呜咽声和微弱的说话声。米里亚姆赶快来到有莱拉公寓钥匙的一个邻居家，迅速回来打开了房门。米里亚姆顺着声音望去，只见莱拉跪在卧室的角落，身体在不停地颤抖。她低着头，一会儿又把头转向墙。当米里亚姆靠近她时，她含糊地说：“不要毒死我！不要毒死我！”“莱拉，我是米里亚姆。”可是她的话对莱拉一点作用都没有。她还是不停地：“请不要毒死我！请不要毒死我！”米里亚姆抱住她的肩膀，慢慢地扶她站起来并对她说：“没事了，莱拉，你很好，也很安全。”莱拉还是不停地摇着头并哀求道：“不要毒死我！”

不要毒死我！”

在拉麦特干的同一条街上，也就是在莱拉家北面的另一个小区，住着一位年已七旬的老人。她的头发花白，名叫费拉·格罗斯曼，是马丹尼克集中营的幸存者，她的丈夫戴维是从布肯瓦尔德解放出来的。那天她家隔壁的公寓遭到外族的突然袭击后，孩子们就恳求他们离开这里，到费拉堂兄的集体农场去居住。农场在村镇的中心，相对安全一些。戴维很害怕，不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费拉很坚决地说：“我哪儿也不去，我不能让希特勒们再把我从家中赶走。”警报响过两夜以后，这位瘦弱、身高不到5英尺、有4个儿子的老太太，站在卷帘窗户前，挥动着握得紧紧的拳头说：“你们不会赶走我的，你们这帮狗杂种！你们以前没赶走我，现在也不要妄想。你们干什么我都不害怕！”

莱拉·平库斯和费拉·格罗斯曼的不同表现，显示了幸存者对过去的不同反应。在莱拉的事件上，新的不幸摧毁了在大屠杀中几已耗尽了的精神力量。人们可以把费拉的反应看成是一种企图掩盖内心恐惧的虚张声势。但是，人们必须明白，她的表现说明了幸存者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她认为原来的那些刽子手又回来破坏她的生活。

对于精神变态的本质、表现和大屠杀影响的程度，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少有人认为幸存者已经完全正常。许多幸存者的显著特征是他们的脆弱感。就人类本性而言，人们渴望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大家都遵从自然的因果律，并因此做好趋利避害的准备。而幸存者对于过去所遭遇的迫害，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体验。巴巴拉·洛温斯坦是家里惟一的幸存者，她说：“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对于巴巴拉和其他幸存者来说，谁都不能预料将来要面对什么样的不幸，无法准

备，因此根本不可能进行自我保护。

由于过去的痛苦经历，许多幸存者把未来想象得很危险，并做好了准备。米纳·福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迫与亲人分开后，在历经无数的劫难后活了下来，最后她被当成奴隶送进了纽伦堡的工厂。她说：“在上千人的场合或者在戏院，我总是先要寻找出口在哪里，我总是下意识地想着在任何情况下的自救。”

埃塞尔·雅诺夫在匈牙利米斯科尔克的一座小城市里长大。“在童年时代，我作为犹太人，从来不是中立的。我总感到会被人伤害、攻击或取笑。”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来之后，她的个人危机感影响到她现在的家庭。“在我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我总是担惊受怕。当我离开他们时，我总怕在我回来时见不到他们了。当他们外出宿营时，我总有他们会被淹死的幻觉。我总做噩梦……在50年的生活里，我的忧郁症不断加重，我不得不减少活动。我不能忍受我的无能……是否我应该逃避……再一次体验无助感，使我感到非常痛苦。”

尽管人们愿意相信生命是绝对神圣的，但现实使这种个人安全的潜在安慰也破灭了。奥尔加·希梅尔法布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幸存者，在美国洛杉矶过着一种现代正统犹太人的生活。她有信仰，但仍心存恐惧，“生命毫无价值，杀人也无关紧要，生命不像过去那样有意义。”生命不再像过去、像大屠杀之前那样有价值了。50年前，人类在山穷水尽时，已经采取破釜沉舟的态度。人们不断释放怒火，不想再压抑了。就像过去上帝无法保护我们一样，现在他同样也是无能为力的。

一些幸存者试图摆脱脆弱感。杰克·戴尔蒙德在德国的一座小城市长大。作为家里惟一的幸存者，解放后他来到巴勒斯

坦，在他决定去美国前的几年里，一直住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他说：“集体农场使我有了一种归宿感”，“我知道我要为自己争取到更多。”

战前，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希望有坚强的个性，我总是很厉害，因为在学校时老师告诉我，犹太人是劣等的，所以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经历了集中营生活以后，我的行为有些改变。我可以很厉害，但过后我又为一些行为感到羞愧。我在集中营的经历使我更坚强……同时也让我对别人的痛苦更敏感。战前，我是一个自私狂妄的人。在经历了集中营的生活后，我有了社会良知。

“这些年来，我对家人太粗暴、太独裁了……我采用了在集中营学到的那种行为方式……我主要是对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太粗暴了，而不是对陌生人。”杰克对亲人而不是对陌生人粗暴，他硬起心肠对他所爱的人作出冷酷的样子。对于杰克和那些在奥斯威辛呆过的人来说，他人就是地狱。他们无法分辨客观可能性和有根据的主观猜测之间的区别。

为了应付将来会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掠夺性战争，艾达·科克努力使自己变得坚强。“我没有童年，14岁时，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被剥夺了。有时我是粗暴的，这是因为生存的需要。有时你会犯错误，但你不能让别人从你这儿拿走什么。我喜欢捐赠，为慈善团体捐赠。但是，如果有人从我这里拿走了什么，我就会同他斗争。当我离开集中营时我就下定决心，没有人能再从我这儿拿走什么。”

大屠杀的幸存者生活在危险和不稳定中。海伦·舒瓦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塞弗勒斯长大，1939年时，该地被匈牙利吞并。因为海伦一家拿不出作为匈牙利公民的证件，1941年全家被驱逐到波兰。1944年，在一辆马车上，她和父母一起被

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她的父亲是一位内科医生，他建议大家服用他备好的毒药，以应付不可避免的局面。海伦已经懂得，家、财产、生命都是那么的容易消逝。“我从没有想要一所大房子。我知道人的需要很少，物质财富并不意味着富有。我知道人最需要的是生命。”海伦懂得金钱、物质财富或者身体健康只能提供假想的安全。

罗丝·范戈尔德告诉我：“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不能在收款台前排队……如果有人不小心推了我……我总是要检查一下我的身体。我不能忍受别人走在我的后面。”罗丝承认她的过分自我保护意识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罗丝说着话，眼睛茫然地盯着窗外，“我不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生活，我害怕所有的事情。我害怕电话——它可能会带来监禁、死亡或者是其他悲剧性的消息。”她把脸转向我，继续说：“有时你会想，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人。我们对孩子太精心了，并且我们也教导孩子如何行事。我们总是尽力使他们安全……我把家里的人控制得太严了，这很不好。我可能因此毁掉他们的生活。我的家和财产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希特勒可以拿走所有的东西，但我要抓住生命、我的孩子……我不想失去家里的任何一位亲人。”

幸存者曾有多次站在通向死亡路口的经历，他们不寻常的脆弱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死亡的焦虑”使他们不断重复危险的警告，^①以致把每天毫无危险的活动都看成是冒着致命危险。幸存者的子女经过这种过分的熏陶，已经反映出无根据的恐惧症状。父母的不安全感影响了孩子们。在第二代人中，很多人谈到过弥漫在他们家庭中的恐怖气氛。

① 哈维·巴罗卡斯和卡罗尔·巴罗卡斯：《集中营的影响》，第 821 页。

知道了他们经历过的那些可怕细节，促使我形成了悲观的性格，愤世嫉俗的人生观。我们这些人，本应该比那些有正常家庭背景的人更有能力。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不要相信别人。有的人注重着装、外表和外在的东西，这种方式并不是不必要的，但是往往使人们只看到虚假的一面。

在生活中，我承受着巨大的悲哀。大屠杀增强了我对社会黑暗面的认识，我们不过是机器和动物，不是什么人类。我妈妈说：“外边有很多希特勒，所以你们要变得坚强些。”

认识到人的毁灭性的一面让人感到恐惧。一些大屠杀的罪犯没有再进行谋杀活动，而有一些人毫无疑问地仍参与了谋杀。以前的作恶者依然是毫无悔改的谋杀者，这对我的人生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不能再信任别人或太理想主义了。

在很大程度上，我已经认识到不能依靠别人。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帮助你的人很少。所以你必须照料、帮助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如果你能在心中保持自信，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我很像我的父亲。^①

保罗·汉德尔是他那极端传统宗教家庭中的惟一幸存者。在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每天在午休时都要从单位回家，为的是给孩子洗个澡，也许是想确认孩子还活着。“我完全是

^① 哈斯：《大屠杀的阴影》，第37页。

家庭的附属物，我太爱我的孩子了。自从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就和家庭紧紧地连在一起。我失去了许多，无论我有什么，它都像一种财富，我不想失去。”谈话后，我有幸与保罗的美国籍妻子进行交谈。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变化很大，“突然间他的脾气变得很坏。”这种新的补偿，引发了保罗隐匿了很久的脆弱感、挫折感和随之而来的暴躁情绪。

幸存者对其周围人的不信任，不仅是因为人们的迫害和背叛，还因为他们认识到，人们对同伴的难处经常装聋作哑。伊利·威塞尔写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仅人死了，就连他们的良心也死了。”幸存者强调，一个人只能依靠自己。

在大屠杀中，那些接受了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帮助的幸存者，较少地表现出怀恨、责备和悲观的情绪。在一些有关集中营的作品或口头叙述中，幸存者似乎都根据他们的经验和感知进行划分。一些人的说法是很自私的，对任何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进行评价。而另外一些人则毫不迟疑地承认，在那些日子里，别人在保护他们生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帮助不仅可以提供身体和精神上的营养，而且也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在我的采访中，经常遇到一些幸存者，当讲到他的朋友去世时，哭得比他的父母去世还要伤心。父母的保护是一种自然的期待，而朋友的援助则是更应该感激的。

大多数幸存者认识到，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而且具有危险的攻击性。无论如何，总要有某些人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犹太人一直是并且以后也会是掠夺者喜爱的猎物。索尔·哈尔彭以前住在柏林，曾经关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诺德豪森集中营。他告诉我：“我不相信人类。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不相信人们所做的一切。如今，人们失业了，希特勒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他们找一个替罪羊。我相信犹太人又要遭殃了……有时，

我想找一个地方，一个岛屿，没有人能找到我和我的家人。”

由于相信他们会遭到不断的攻击，很多幸存者已经不再指望其他人种的认同，而是专注于犹太人世界。一位幸存者的孩子告诉我：“除了自己家里的人，我父亲谁也不相信……生活中每件事都和这个问题有关。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访问过一些外表看起来很消沉的幸存者，他们对前途的看法很悲观。在大屠杀期间，这种悲观主义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我们并非天生如此，而是纳粹强加给我们的。）大屠杀后果的持续影响，正像幸存者所预料的那样，是邪恶的胜利。那些幸存者在大屠杀中，为了应付对他们的迫害，变得脆弱了。战后，他们想努力表现出战前个性的水平，但体质上的脆弱也影响到他们战后的调整。

尽管脆弱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大多数幸存者尽量不以极端的方式表露出来。压抑的情绪通过缺乏耐心、易怒、对个人侮辱的敏感等方式流露出来。幸存者已经能够控制他们外露的愤怒，以高兴的假面具出现在公共场合。一些子女在描述幸存者周期性的盛怒时谈到，他们的怒火犹如压力巨大的锅炉不断地升温，一旦面对真实或想象的冒犯，马上就会沸腾。幸存者经常是在家庭这一安全地带撕下自己的假面具。

我父亲是个妄想狂，他总是想到死。他有两张面孔，对朋友，他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对家庭，即使是很小一件事也能激怒他。与他相处必须小心翼翼。

我父亲很敏感，许多事都能引发他的脾气。战争电影，任何有关德国或纳粹的事情……他对人没有耐心，包

括他的孩子。他很武断，时常体罚孩子。他从不说什么，但你知道他之所以这样愤怒，是因为他的家人在大屠杀中全被杀死了。^①

对大部分幸存者来说，大屠杀时期就是上千个饥饿的日子，上千个关于食物的梦想（一份食品也许要用人的生命做代价）。艾达·科克对我说：“我对食物与其他人不同，我从不扔任何食物，我吃得很多。当我在集中营时，惟一的希望就是自己有一个整面包，那样，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因为没有食物，我的身体垮了。如果我感觉喜欢什么，我就吃。”索尔·哈尔彭也受到以前渴望的影响。“我怕饿，如果买面包，我一定要买两个，这样我就不会产生匮乏感。”尽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索尔总是感觉饥肠辘辘。幸存者在防备着历史的重演。

当人们经历生活的失意时，最痛心的就是我们的纯真被玷污。伴随着许多引发个人创伤的事件，生活幻想破灭的过程加速并强化了。强烈的打击完全占据了孩子们天真的心灵。幸存者特别痛苦的是，他们内心的纯洁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破坏了。艾达·科克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恨。”他们独一无二的经历，造就了他们这种特殊的表现。

在戴维·希曼尔斯坦的9个兄弟姊妹中，只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还活着。1942年5月，戴维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都以非犹太人的身份离开安特卫普，到达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法国的维希。后来，戴维被法国保安队（即二战期间的法奸组织）抓去审问并且交给德国人。同年9月，他和家人从德

^① 哈斯：《大屠杀的阴影》，第93页。

兰斯被驱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死在毒气室里，戴维幸存下来，又被送到奥斯威辛的一个附属劳动营。“因为我很健康并且有双好鞋。”他在1942年12月逃跑，穿越欧洲，回到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告知了东部死亡工厂的神职人员厄尔曼一些关于集中营的情况。但震怒的厄尔曼命令他离开。厄尔曼坚持说：“我从集中营得到的消息说，那里的情况并不坏。”戴维在占领区以非犹太人的身份度过了一年，他们被迫为了V-1工程（即向英国发射导弹）而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挖山洞。戴维的兄弟们非常幸运，没遇上纳粹分子。戴维解释说：“如果你在集中营过上一段日子，你就会与众不同了。我母亲是维也纳人，在家里我们讲德语。解放后，我再也没有说过德语。我的两兄弟没在集中营生活过，他们说德语。简单地听说那些暴行与亲身经历他们的凶狠毒辣是不同的。一旦精神上遭受的创伤复原，我们可以更乐观，更少怀恨。但当我们遭受另一恶毒攻击时，仇恨就会燃烧，我们的记忆是不会原谅他们的。”

曾经在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和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呆过的一位幸存者多拉·莱文森反问我：“当我确信再也见不到丈夫和孩子们时，你能否想象我是如何在运牛的货车车厢中冲出一条路到窗边，向他们说一声‘再见’的？我亲眼目睹了纳粹党卫军的一个女看守的行为，绝对的残酷，绝对的非人道。在卑尔根-贝尔森的最后几天，我们没有任何食物和水，而且我们感染了伤寒病。我的一个朋友不过想喝一些泥浆水，但是，这个女看守对她又踢又打。我对此已感到麻木，没有歇斯底里，而是麻木。”对多拉来说，她经历的感情波澜超越了她所能调节的限度。出于自卫的需要，我们不能感受太多的悲哀和反感。事实上，有很多调查者的报告都对精神麻木的幸存者作了描述。

然而，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幸存者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相反，他们有很多相当强烈的情绪表露：悲伤、快乐、内疚、气愤、同情。或许时间太久，或许他们感到情感的体验是安全的先决条件。他们所经历的岁月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幸存者的回忆，并把与其相关的事件及感情融为一体。

一些看起来比较理智的幸存者，非常清楚地记得发生在50年前的悲剧的准确日期和时间。他们把个人的大屠杀历史看作理论研究对象，用一部编年史代替了他们的眼泪。索尔·范戈尔德对于日期和时间的记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准确，他告诉我说：“可能我太冷静，分析太多，但那总比痛苦得不能自拔要好得多。”这个幸存者相信，把精力集中在客观环境上会增强他的能力。准确并清晰地记住日期和时间是他要完成的任务，这是用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解除痛苦，如同筑起一座防卫设施，有利于化解幸存者被压抑的情绪。

除了一般的感情丧失外，少数幸存者还泯灭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生命固然重要，但却可以轻易失去，因此又怎能产生追求其他事物的激情？戴维·希曼尔斯坦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奥斯威辛被杀害。解放后，他和他的表妹结婚了。“战前，我是一个狂热的摄影迷，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喜欢我的作品，我会很不高兴。战后，我只是对摄影感兴趣，而不是追求完美……我失去了妻子和孩子，所以对我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这就像是个零。为了忘记发生过的事情，我只是工作，而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一切都是虚无，我失去了真实的东西。”什么东西能比孩子更有价值，更值得为之去努力呢？当一个人深知其应有的热情已经永远离他而去时，又如何能满怀激情地走进生活呢？

实际上，人们无法逃避对大屠杀的记忆。因为他们的身心都与过去联结着，无数种刺激都可能引发幸存者强烈的感情。

耳闻目睹过的消息、形势、人物，回忆起那流逝的光阴，都会引起他们的悲伤或气愤。“很多次我下班回家时心里烦闷，孩子们就问：‘爸爸，您为什么生气？’我不是生气，只是有些事伤害了我。可能是因为我听到德国人说话，也许我听到有人在妄谈大屠杀。”因为他们扮演的是迫害幸存者的角色，所以穿着制服的权威形象和狗，似乎都是最容易唤起幸存者忧虑的对象。

不幸的是，作为孩子，幸存者的后代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的父母易躁易怒。父母对一些刺激的反应经常使孩子受到过度的惊吓，尽管没有什么明显的可以理解的发怒原因，但孩子们却必须忍受。一个幸存者的孩子这样描述下面的情景：

我记得在我们去学校接我两个姐姐的路上，我伸高手臂去拉妈妈的手。姐姐们一个在幼儿园，另一个上二年级。当我们拐过街角，我妈妈突然发疯似的抓紧我的手，使我感到她受到了惊吓。当时我才3岁，搞不清楚其中的缘故，但后来我知道了是什么力量使她如此……当我和母亲到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学校时，她向我解释说，她一看到钢铁厂冒出的团团烟雾就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惊恐，立刻联想起那些从火葬场冒出来的一团团难看的灰色烟雾……她的父母和家人就是这样被毁灭的。^①

如前所述，因为胜利具有压倒毁灭的力量，许多幸存者提高了对抗困难的能力。然而，对于另外一些幸存者来说，过去

^① 德博拉·博格：《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们：未来的岁月》，硕士论文，戈达德学院，1980年，第5页。

大屠杀灾难的沉重包袱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并可能使他们再次滑向深渊。阿贝·斯塔克是在1945年4月10日从布肯瓦尔德被解放的。他抽泣着告诉我，当他看见美国人时已经瘦得皮包骨。“那时我只有23岁，却在德国的集中营里像奴隶一样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1969年，由于阿贝很消沉，他进行了心理治疗。“我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倒霉的事接踵而来。我感到生活压力很大。如果不是因为大屠杀，我一定会是另外一种状况。当我来到美国时，没有任何亲朋，那种情形非常糟糕。”在1971年2月加利福尼亚南部发生的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中，阿贝的全部生意都毁掉了。阿贝问道：“为什么不幸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这个无辜者再一次被伤害了。一个人必须忍受多少灾难？一个人的承受力又有多大呢？阿贝对这样的问题无能为力。

对于许多幸存者来说，夜晚是最危险的。当他们睡着时，回避过去伤痛记忆的防卫机制放松了警惕，奥斯威辛集中营重返梦境。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测验（与其他心灵创伤的受害者一样）中总是出现噩梦这一明显反应。在最近出版的资料中，有三分之二表明，大屠杀的幸存者有睡眠障碍，比一般群体发生的次数多。这项调查也表明，经常出现的噩梦与幸存者在集中营里的长期监禁有正比关系。^①

我发现，幸存者的绝大部分噩梦出现在刚刚获得解放以后。在他们需要重建生活和需要面对新的压力和责任时，梦境中的记忆如同清醒时的记忆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回到过去。由于这种回忆妨碍了他们重建家庭生活的努力，所以幸存者都不

^① J. 罗森和 C. 雷诺兹等著：《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睡眠障碍》，《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991年第148期，第62-66页。

愿意细想过去的事情。

在频繁经历这类事情的同时，近年来，一些幸存者已经注意到新出现的与大屠杀有关的梦境。这些人说，他们有意识的思想已经重新回到过去的伤害事件中。它加重了白日梦症状，也加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形成的无助感，重新唤醒了他们曾被抑制的想象和情感。现在，他们已经 70 或 80 岁了，幸存者被无情地推到死亡的边缘，这种意识更多地刺激他们回味和评估自己的生活。相同环境的刺激也会勾起他们对过去苦难的回忆。看一场大屠杀电影，读一段进攻以色列的消息，谈论一下个人的经历，参观集中营，都有可能刺激埋藏着的恐惧感。

1939 年时，路易斯·温特劳布是波兰骑兵的一名军官，与士兵一起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举行暴动。他是我见到过的最坚强的幸存者。他强调：“当你参加波兰军队后，就会变成一个粗暴无礼的家伙。”然而，当我问到他的噩梦时，他拒绝说：“我不想提它……我不能说。”因为太恐怖了，其他的幸存者只能回忆起一些零碎的噩梦，甚至有些人什么也记不起来。也有少数人相信，他们可以尽力凭意志来控制。“我的大脑像一部机器，可以控制它不去想那些事情，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会自动醒来以阻止噩梦。”

我访问的三分之一的人从没有做过与大屠杀相关的噩梦。海法科技学院睡眠研究室的研究员指出，心态调整较好的幸存者，回忆梦境内容的能力明显要比那些 1939 年移居到巴勒斯坦的被控群体低。结果表明，幸存者梦境记忆力差，可能会对精神健康有利。

一些幸存者讲述了他们定期被配偶叫醒的经历。巴巴拉·洛温斯坦告诉我：“我的丈夫把我叫醒后，说我喊叫过。我喊母亲、丈夫或者其他一些关于枪和被人追赶的事。”奥尔加·希

梅尔法伯也同意这种说法。她丈夫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被杀死，没有来得及说任何“其他事情”。奥尔加的睡眠经常被她的丈夫打断：“他喊叫……有时在我没有把他叫醒之前，他还踢打我。”

幸存者们的睡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大屠杀有关梦境的影响，他们也注意到，这些梦境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有些内容直接反映过去的经历，一位奥斯威辛运输队队员的幸存者梦到：“我把那些人带下火车，然后看着他们走向焚化炉！”66岁的索尔·哈尔彭告诉我：“我看见我自己在被挑选的人群中，赤身裸体地走向毒气室。我哭着醒来，浑身是汗，无法再入睡……一直坐着……在集中营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被挑选……如果他们记下你的号码，那就要倒霉了。许多人在被挑选时尿了裤子。我们必须赤裸地站在军营里等待，等待着死亡的宣判。”

另外一些梦境反射出害怕遭到遗弃、漂泊、孤独以及缺乏安全感的情况。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海伦·舒瓦茨告诉我说，在战后最初的五六年里，她被噩梦困扰着，“梦境都是相同的，我去某个不认识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回家……我时常感到在那里陷入了困境。”另一些幸存者通常梦到被纳粹追赶，被逼上绝路等，如果醒得太迟，还会梦到被抓住。“那里有铁丝网，狗对着我狂吠，我想藏起来。我尖叫着醒来不让自己再做下去。太可怕了。”另一个幸存者说道：“当时房间里非常热，就像是在德国兵运送我到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闷罐车里一样。我做了噩梦，德国人跟踪我，想抓住我。我经常被德国人追赶……或者我在某个地方躲避时被德国人捉住。”

还有一些梦境清楚地反映了幸存者的内疚。埃塞尔·雅诺夫说：“我有一位朋友，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我梦到我们一起奔跑，她落在后面。在早上（当我醒来）那种感觉似乎是我

害了她。”幸存者的负疚感促使很多人感到自己与亲人被杀有某种关联。他们通过自己潜意识中的死亡感受，渴望与死难者共同分担最后时刻的痛苦，以减轻自己的负疚感。大屠杀期间，在犹太人隔离区有一种传闻，说要把流放者送到德国去做工。罗斯·弗里德兰德通过关系，使她被第一批运走，逃离肮脏的和挨饿的生活。两天后，她的旅程结束地不是德国，而是波兰南部的一处叫做奥斯威辛的地方。“我经常梦到被送进毒气室，一次我听说人们为了空气好一点，就爬上屋顶，我就梦到自己用各种方法向屋顶爬去。”

毫无疑问，脆弱性这一主题伴随着幸存者的过去和现在，伴随着幸存者的梦境，也伴随着他们清醒的时刻。

德国人带走了我的孩子。

我从纳粹那里逃跑，他们想抓我，抓我过去的家人，还要抓我现在的家人，有时候在梦境中这些都混在一起。

我同妻子和两个外孙坐在某一地方等待着射击……我对妻子说：“好了，我们到目前为止，生活得还不错。”这个噩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幸存者非常害怕像他们失去原有家庭一样，再失去他们重新组成的家庭。

安娜讲述了一个10岁女孩在被挑选后垂死挣扎的故事：早些时候，当她的家人从普拉佐夫运走时，他们经历了很多次的“挑选”，小女孩已经知道了挑选的含义，并对此感到害怕，因此，那个小女孩又踢又抓。当她拼命地向身边的妈妈喊叫的

时候，三个纳粹党卫军抓住她，把她拖走。她的母亲不愿意让他们杀死自己的女儿。一个纳粹分子走到那位母亲身边，问她是否愿意同她女儿一起走，而母亲虽然排在她女儿后 20 位，却回答：“不。”

安娜承认，当时她心里责备那位母亲不同女儿一起走，稍后她又补充说：“我又有什么资格责备她呢？”在她自己的女儿出生后的几年里，她常做噩梦，重复着集中营里的那一幕，惟一不同的是那个拼命喊叫的 10 岁女孩变成了她自己的女儿。^①

梦中的景象有时还反映出幸存者在大屠杀期间不可战胜的感觉。保罗·李以前是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军官。1944 年 10 月，他被命令从格罗西罗森途经奥斯卡 - 辛德勒到布林里兹（在苏台德区）的营地和工厂。保罗详细讲述了他的大屠杀岁月。他说：“曾有很多次子弹从我旁边擦过，有许多艰难时刻，但我知道我会渡过。有时我梦到我在逃避什么，但我总能逃脱，无论是什么我总能征服。”

当幸存者体验了过度的脆弱、死亡的焦虑、失去亲人的恐惧后，最引人瞩目的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被忧虑所压倒。在了解了一些大屠杀中人们所忍受的惨境后，我的学生们经常评论，幸存者竟然一切正常，这真是奇迹！在经历了那样的个人和集体的灾难后，人怎么能不完全疯癫呢？

当然，幸存者并没有完全成功地征服大屠杀的幽灵，大部分人必须安排相当紧张的生活。很多时间里，他们的外表和行动与我们没有区别。但是当他们每天早晨醒来时，他们却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盼望。

^①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 12 页。

当一个幸存者被问到：“人类从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

他回答说：“人类从大屠杀中所学到的是，有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涂炭，但却没有一个人关心。”

第五章 面具

许多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过去遭受过的剧烈痛苦。白天，他们要忍受那些记忆的刺痛；夜晚，他们也常常会受到无意识梦境的折磨。然而，在我采访过的大多数幸存者中，当问道：你们认为自己正常吗？他们都非常肯定地回答：“是的，当然正常。你不能坐在那儿为此悲哀一生，那样无济于事。”

一位名叫埃斯特·埃尔芬鲍姆的妇女，她的女儿在特里布林卡集中营被杀害。她告诉了我她是如何保持正常心态的。她说她在战后决定不要孩子，因为她不能忍受再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对我来说，有孩子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之后她又承认：“节假日对我来说像是地狱。当往事涌现出来时，我愣愣地呆坐着，实在不愿回忆。”

马雷克·汉德尔曼是他家中惟一的幸存者，他比希特勒活的长久，他对我的提问感到惊讶。他说：“我正常吗？是的，我很正常。”

幸存者必须使自己确信，他们的敌人没有成功。承认无法挽回的损失，承认那些使他们遭受痛苦的人已经介入到自己新的生活中，那将意味着他们的损失无法估量。因此，幸存者承认自己有一些孤独症状——情感障碍、噩梦、对子女的安全过

度焦虑、不间断的恐惧——然而他们却宣告胜利了。“我正常吗？是的，我很正常。”如果承认不正常，可能暗含着他们的“疾病”已经传给了第二代。这是有希望的一代，应得到补偿的一代，有复仇心的一代。（最近在我的一节课上，一个学生向一位幸存者提问：“您认为您的经历是否会影响到战后您的家庭？”她回答说：“绝对没有，我和我的丈夫是非常坚强的人，否则一开始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们的孩子都非常健康快乐，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医生，他们都工作得很出色。”）

罗丝·范戈尔德告诉我，她每天都在想大屠杀，这对做个正常人是个挑战。“我正常吗？绝对正常。但这无法切断我的记忆。我越回想就越气愤，但是感谢上帝，我很正常。你知道这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在青年女牢里，这个牢里的人要去集中营干活，隔壁是母子牢房，她们要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些妈妈跑进我们的屋里想逃命，我听到她们的孩子在尖声叫喊。我回忆这些事，我无法阻止自己去想。”“悲剧使人坚强。我愿意让自己成为坚强的人。我坐在集中营里，我的工作是在放炮。在值班的时候，我产生了幻觉。我看见所有我想看的事情。战争期间，为了实现理想，我想活下来，我要做很多事。我要学……我要去打希特勒。我要活着让他看，他没有摧毁我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如果精神也可以摧毁，似乎不太正常。

幸存者认为，他们的战后生活是正常的。他们有了房子、家庭、事业、朋友等等。但他们也知道这些是实现理想的外在标志，内心却是空虚的、无法抚慰的伤痛。“是的，我正常……但我们幸存者都是不健康的，我们都有一颗破碎的心。每个幸存者的心都是伤痕累累。”

许多幸存者注意不断调整不稳定的心态，他们都在防备某

种偏离正常状态的侵扰。内奥米·利德出生于维也纳，在婚后不久，她被监禁在靠近里加的塞拉斯皮尔斯集中营，被强迫做流产。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生活之后，包括：凯泽沃尔德集中营、斯坦索夫集中营以及穿过德国的死亡之旅，内奥米在1945年3月1日被苏联人解放。“如果你细想那些你无法改变的事情，就会把自己搞得很悲惨。我总是展望生活，向前看，不向后看……我总是干活而不去过多地想。我不想，不看，只做事情。但是，当夜幕降临我睡不着时，就无法排遣那些往事。”幸存者告诫自己，把注意力和反应选择指向未来。但是在睡梦中，他们的控制却失灵，防卫也崩溃了。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索罗门·戈尔德斯丁被分配到加纳塔干活，在那里他们负责对一些衣服和物品进行分类，这些物品是那些已经送到死亡营的人留下的。索罗门的工作使他有可能会吞下宝石和黄金，然后通过大便排出来用以交换食物和伏特加酒。他解释说：“在加纳塔，99%的时间我在醉态中工作。如果我没有醉，或许我已经自杀了。”我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我比其他入坚强，索罗门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去看心理医生，他会说我不正常。但是，作为幸存者，我毕竟经历了大屠杀，之后重建了生活和家庭，我认为我很正常。我看到从越南战争中回来的美国士兵，50%都变得疯疯癫癫的，因为他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没有准备。我想我是正常的，我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走进毒气室。”索罗门·戈尔德斯丁重复着许多幸存者的主题：如果在有如此的经历后，我依然能够做到这些，我一定是正常的。索罗门观察那些经历了创伤的人的反应，通过比较，他有优越感。他特别相信，既然过去他比他们受的苦更多，或许如今他更有忍耐力。

丹尼尔·达维多夫在奥斯威辛、格罗西罗森、弗洛森伯格

经历了各种苦难后，在特里西恩斯塔特获得解放。他在说起自己的大屠杀岁月时，颇有些斯多葛学派的味道。对于丹尼尔来说，他的生活线索在那些年没有完全中断。他的生活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转折。“大屠杀还是善待我的，因为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活着，我们一起回到家。大屠杀像一场噩梦，我没有受到任何身体上的伤害。我认为生活很有意思。因为我过去一直梦寐以求一些食物，一块烙饼。在美国，我可以吃到，但是我的医生对我说‘哦，这对你不利’。”

丹尼尔的女儿、女婿及两个外孙住在他隔壁的房子里。他的生命通过第二代和第三代保持了延续。与自己的亲人在一起，比较容易减轻对种族灭绝的恐惧，减少由此形成的精神压力对他们的侵扰。一些幸存者的孩子，如果没有住在靠近他们父母的地方，他们会每天打电话，以减少长辈的牵挂之情。（我38岁的时候被邀请去德国讲学，在法兰克福的第一晚，我刚要进入梦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出她打电话只是想证实我是安全的。）

艾达·科克的孪生兄弟和妈妈永远消失在奥斯威辛“孪生囚犯”关押处。这飞来横祸迫使她接受了生活兴衰变迁的现实。她失去了最亲近的人，这为她过正常人的生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教训。“我认为，人不会永远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正常，我对自己有自信。而且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只要我在这儿，我就可以为了什么而被选择。我更正常是因为我知道事物都是很短暂的，而其他人则可能认为是永恒的。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东西会持久，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我只能知道今天我有什么，但我不能保证明天我有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对明天的遐想里，想象那不曾拥有的安慰。陷入脆弱以及具有压迫感的想象，会使人感到空虚。

我时常觉察到，那些幸存者总是试图向别人证实，“大屠杀”对他们并没有产生长久的影响，他们不比其他人缺少什么。“我将向你证明我是多么正常”是潜在的动机。而且，这些人都不愿意再去看、去听、去回忆，所以，从表面上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他们就会觉得更舒服，而且也会被别人接受。“你必须过正常的生活，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走路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但是，你要么过正常的生活，要么自杀……因为没有地方可让你哭个不停。”而且，正像在欧洲没有犹太人的立足之地一样，在美国也同样没有埃利萨·科恩（她4岁的女儿被杀害了）家族的存身之所，因此，他们只能强咽泪水。

讲到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琼·艾默里写道：“在生活中，当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时，往往期待着得到帮助；后者补偿了前者。仿佛在没有任何防御的情况下，不料挨了警察一记重拳，却没有人伸手援救。我们当中一些人的生命就此终结，再也不能复活了。”^①

幸存者相信，他们必须表现出一种礼貌和快乐，使曾经在另一个“正常”世界的痛苦感受远离自己。经受了非人的待遇和人性的背叛，他再一次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他无法表现自己的真实感情。艾默里及其他的幸存者，不仅无法与人们建立信任的关系，而且他们表现自然和本能的能力也被剥夺殆尽。

一位68岁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萨拉·宾德这样宣称：“我非常正常，我相信我自己。大屠杀并未从心理上影响我。它使我更加坚强……并且不再相信人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你必须自救。大屠杀恰恰使我更坚强。”萨拉找到了冠冕

^① 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第29页。

堂皇的理由来掩饰她所经受的痛苦。萨拉·宾德的观察，无论从字面还是内在的含义，都有一定程度的愤怒和无助：世界是一个不友善的对手，你不能指望你的人类伙伴。

许多幸存者都清楚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尽量表现出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然而，他们自我意识的基础已经动摇。一个人如何才能表现得像正常人呢？这就是他们对我的问题的反应。戴维·希曼尔斯坦的两个孩子在大屠杀中都被杀害了。幸存者的内疚同样困扰着他对现实及成功生活的认定。“每天我都在回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的姐妹和兄弟们……他们如何走进……他们如何走进毒气室……他们如何痛苦。许多次我看到那一幅景象……我看到许多骷髅，我用与你完全不同的方式观看。我看见了那些细节……每一具尸骸并没有显示出它是如何受苦才变成现在这样的。其他人仅仅看到了骷髅……他们不把你当做什么……之后他们将你变成一个奴隶，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总之，他们在肉体上摧残你……这一切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你早晨步行去工作时，头垂得不够低，如果他愿意的话，就会找任何理由，掏出手枪向你射击……这事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你确实无法忘掉……你只能忙上加忙，仅仅为了忘却它……我们参加聚会……你坐着笑也不能笑（他哭泣着）……你担心被赶走……他们不允许你有快乐。”

不，不，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一步一步地摧毁着我，我在慢慢的、一点一点地死亡。我建立了新的家庭，如果我未经历过这些事，我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即使在战后，生活也像是地狱，所以你假装自己在忙着。有些东西你是放不下的，人们或许认为他们可以摆脱这一切，而你却不能。也许你忘了独自被困在顶楼的恐惧，或

许因为盖世太保与你擦身而过，步枪抵着你的脑袋。你不可能正常。事实上，我认为，正因为我们太正常了，所以我们是不正常的。^①

我觉得我的脑袋被这些没用的东西充塞着：各种图像和声音，燃烧尸体的恶臭。还有……你不可能抹掉这一切。它就像在一层皮里还有一层皮，那层皮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你不能摆脱它……它会永远陪伴你。许多幸存者也有与我一样的感觉，但是他们不愿说出来，所以他们就矢口否认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很难把许多东西说出来，因为……因为我们承受了这一切。我与你不同，你有一种生活而我有两种。你知道，我毕竟是生活在两颗行星上。对我来说，希特勒砍掉了宇宙的一部分，创立了灭绝地带、痛苦地带、杀戮地带。这就像被砍掉的行星重新并入正常板块一样，只能是所谓的正常。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真的正常，我们生活在另一个行星。我们是从这个行星上被赶到那个行星上的，如今又重新被赶回来，与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如何生活，也就是说，学习如何用叉子、如何用肥皂、如何刷牙……我们就是这样……这样过着两种生活。我们不可能将此一笔勾销，也不可能逃离。人们会否认它，我敢说可能会有很多人否认这些回忆，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那是很可怕的……我告诉你，在这里，我也看见了门格尔和火葬场，我看见了那里的一切，那不可胜数的丑恶。你

^①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140页。

知道，那些记忆是非常可怕的。^①

战争结束后，环境不允许我们崩溃……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孩子，引导他们，做个好父母，举行聚会等等，但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②

幸存者试图确立一种正常的生活模式，以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为大屠杀的模糊记忆所吞没。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那些在阴影里长大的后代来说，正常化的问题比他们的父母更突出。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常想，如果纳粹要把我的父母投入火炉，而我只能救出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通常会救妈妈，你认为那正常吗？^③

就像许多幸存者放弃不正常的自我想象，他们也坚信，自己享受生活的能力并没有被严酷的考验削弱。尽管这些幸存者感到愤怒、内疚、悲哀或者恐惧，他们仍然拒绝承认，是过去的经历使自己变得更加脆弱。他们要过正常的生活，并且决心享受这种生活。然而，他们经常仅仅是更多地完成了享受过程，说明他们经历过了但并未获得内在的满足。在内心深处，避免回忆过去生活的挣扎一直没有停止过。

为了从他们周围不断发展的环境中获得快乐，一些幸存者“分裂”或分割自己。他们把过去留在秘密的港湾里，从而使

①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53页。

② 同上书，第205页。

③ 阿尔特·施皮格elman：《莫斯二号》，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91年。

其不再影响和妨碍现在的生活。马丁·伯恩斯坦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前，从未谈起过他的经历，并且从不允许自己流泪。在解放 25 年以后，他才有勇气面对自己重建的成功人生。“40 岁以后，我才开始摆脱了自我束缚，尽情地享受生活。以前我一直约束着自己，妻子一直在帮助我……基本上，我在努力学会不把过去与现在混为一谈。我从未对我的孩子们说过‘吃吧，因为我当年没有东西可吃！’……尽管我有足够的理由快乐，但是，我不允许自己彻底快乐。”马丁·伯恩斯坦将永远不会“彻底的快乐”！悲伤和无法弥补的失落感将会永远伴随着他。不过，马丁·伯恩斯坦现在终于明白了，也接受了自己需要解脱的说法，不再关闭过去记忆的大门。

索尔·范戈尔德也努力把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分开。“能够保持心智健全和快乐，应该功归于自己。你经历了如此多的困难，你有权利享受快乐。在我的生活中，我为快乐而奋斗……另外，就是分割我的生活。我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邮递员，那是我的工作，我不希望因此使自己不快乐。”

1942 年，索娅·韦斯的父亲和兄弟们被从华沙送往特里布林卡。1943 年，当索娅 19 岁的时候，她和母亲一起被驱逐到马丹尼克，在那里，两人被隔离开，索娅的母亲很快就被毒死了。在经历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关押后，终于她在马尔霍夫获得解放。索娅一直没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在我内心总是有巨大的悲哀。我可以出去享受生活，但我依旧悲伤，它从未离开过我……我总有一些孤独感，那感觉就像你总是拖着身后的包袱，永远不能自由。”要评估索娅意志薄弱的程度是非常困难的，或许她有强烈的幸存者的负疚感，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回忆往事。

你生活中的所有经历，所见到的一切……你又能对它怎样？……要知道，就是这样，一些人厌恶生活，因为他们发现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没有延续。而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生活的，知道它是不延续的，没有任何可值得延续的内容，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无从判断，就这样活着，直到你了解这个世界确实捉摸不定。^①

在到目前为止，对许多幸存者进行定位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们的看法总是扩展到过去丧失的东西。当我问70岁的罗丝·范戈尔德，在经历了大屠杀的影响后是否可以快乐生活时，她答道：“当然受到影响，虽然尽力去享受生活，但总会留有一些记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好事，我总想到过去。我母亲不能活着看到我的婚礼，无法活着看到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总是想到上百万的孩子们，他们把孩子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把他们扔在墙角……我从未真正快乐过。每当发生一件快乐的事，我都会想到在集中营里受难的人们。每当以色列的军队表现出色时，我就想，应该叫醒希特勒来看看……任何的快乐都无法弥补我们所失去的一切……我的弟弟们、我的父亲……”在如此愤怒的情绪中，罗丝又如何能够快乐呢？

幸存者希望和自己的亲人一起分享快乐时光，亲人们的快乐会增加他们的快乐感，他们特别渴望与父母分享快乐。“快乐？看，快乐怎能与同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在一起相比呢？”保罗·汉德尔说：“当我结婚的时候，那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但是我感到特别孤独，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妻子提到过这些。”“经过这场浩劫，我再也不可能是一个百分之百快乐的人。我失去

^①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147页。

了如此多的亲人和朋友，我失去了他们，永远地失去了。”

对于一些幸存者来说，在经历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苦难之后，一切享乐都是要遭报应的。快乐暗含着对那些受害者的背叛，快乐是对那些已经发生过事件的扭曲。“我羡慕那些能暂时从他们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的人……他们还能笑，能够快乐。任何一个处在我这种情况下的人，都不可能再发自内心地笑出来，只有浅薄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些事情总是隐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怎么能快乐得起来呢？如果你还能活着并享受快乐的话，那几乎就是对你失去的一种犯罪。”^①

幸存者埃塞尔·雅诺夫现在是一位心理学家，在她心中充满了幸存者的内疚。她以前告诉我：“我总是觉得这种内疚渗透了我的整个生活，这是一种我无法克服的感觉，这种内疚是针对享受快乐的内疚。我感觉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在我们家里有许多庆典，但大家从未真正开心过。我非常羡慕那些感觉自由的人，如果允许，我愿意死去。”

幸存者的负疚感窒息了戴维·希曼尔斯坦的快乐。戴维的第一个妻子出生在英格兰，她本来可以渡过海峡逃跑，但是她却不愿把自己的丈夫丢在后面。当戴维重复两遍“她本来能够幸存却没活下来，而我却活了下来”时，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不知所措的表情。后来他解释到，他的外表不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如果我笑，那不是真正的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去获得成功或者交友。它只是影响了我的内心。我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或者是我应该的那样高兴。你看，我的孩子们不理解我，他们不知道我的笑不是真正的笑，他们也不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话：‘在失去了那么多人以后，你没

^①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146页。

有权力快乐。’我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我是一个健全的人……但却失去了一些东西。如果我以前没有结婚生孩子的话，我不会知道有那么多快乐。我知道我以前曾经比现在更快乐。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们从未想过有些东西可能会失去。”

作为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我从小到大一直认为笑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一个人的浅薄。直到我30多岁时，才理解了欢笑的价值和必要。我必须学会慷慨地给予别人以欢乐。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种观点在与我谈过话的人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欢乐是被暴力夺走的，他们力争重新把它夺回来。

罗丝·弗里德兰德到达美国以后，完全沉浸在她的服装设计的工作中，她现在再也不想过去的那场大屠杀了。她喜欢繁忙，她从演出、优雅的晚会、人们的注目、热闹喧哗的气氛中感受到了充实。在她的家庭灾难发生12年后，她选择了回首往事，成为当地一家大屠杀纪念馆的讲解员，在社区中成为一个演讲者，经常在学校集会上介绍大屠杀。“自从我开始谈论大屠杀以来，我特别清楚自己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生活。我以前曾喜欢过跳舞，现在我再也不跳了。即使是一些享受的事情，我也总要寻找出一个目的，或者某种意义。”为了证实自己生存的意义，罗丝坚持把自己投入到有意义的活动中去。另外，过去那段可怕的时光，使罗丝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太信任。与其他事情比较起来，大屠杀就像一把尺子，对于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要让他们在不考虑目的的情况下作出快乐的样子，将使他们无法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然而，也有几个与我交谈过的幸存者强调，他们比过去更会享受生命了。他们对好运气心怀感激，因为他们懂得相反的一面。他们急切地抓住生命中拥有的东西，这也反映出他们害

怕失去现有的一切，害怕他们刚刚得到的恩惠转瞬即逝。生命和生之乐趣，曾经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东西，但却被强行夺走了。这种残酷记忆将留下深刻印迹，永生难忘。索尔·哈尔彭告诉我：“我热爱生活，每一分钟我都珍惜。相信我，如果你现在不做，明天也许你就做不成了。从生活中我学习到的一个真理就是，如果你想做什么事，现在就动手。”

有人认为犹太人不应该享受生活，这种势力还比较强大。然而海伦·舒瓦茨公然反对这种奇谈怪论，她尽情地享受着大屠杀后意想不到的生活。“享乐人生的感觉更加深刻了，你不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是一种恩赐，所以，你应该更珍惜它。”

幸存者们不愿承认他们的反常心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坚持认为，他们有享受人生的能力。然而，他们却愿意承认潜在的困难和过去生活对他们精神生活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幸存者都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①所以说，这些幸存者非常善于处理他们的创伤，根本不去注意那些心理健康专业的理论对其战后心理调整的作用。

在解放后的若干年里，幸存者的物质需要、重新生活、重组家庭的热望转移了他们对内心生活的关注。众多的障碍——不熟悉的环境、外语、没有钱、没有工作——都需要克服，无暇去伤心、发泄愤怒、哀悼他们无辜遭受的损失。

许多幸存者坚信，保持忙碌是必要的，可以不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戴维·希曼尔斯坦声称：“我的心理疗法就是努力工作。我在一个月中开了5家店，我要工作不要思考，不然你就会发疯或许……要忘记真是太难了。你必须不断做事才能不回

^① 卡哈纳、哈雷尔和卡哈纳：《健康的预言家》，第171-192页。

忆。我现在和你坐在这里，我很情绪化……我不去看心理医生，工作对于我就像一个心理医生。我仍然害怕独自翻看前妻及孩子的照片。”其他人也强化了自我回避机制，为的是掩饰他们的痛苦和感情上的脆弱。玛莎告诉我：“我有一个习惯，每当我讲述那段往事时，我都会讲笑话或者告诉别人我是怎么愚弄那些德国人的。”

在我所采访的人中只有不到 10% 的人看过心理医生。在这些人中，有的进行了一些专业咨询；有一半的人寻求帮助，以解决一些与大屠杀没有必然联系的问题（例如，婚姻或打孩子）。当然，大屠杀遗留的影响可能间接地决定了这些危机（例如，烦躁不安、异常敏感、反应不平衡或社交窘迫症）。但是，幸存者都认为，寻求心理指导与经历大屠杀的历史没有关系。

对治疗的抗拒力来自多方面。一些幸存者可能害怕自我形象的转变，从独一无二征服死亡的幸存者转变成一个精神病人；从一个无比坚强的人变成一个被摧毁的人。埃斯特·费希尔可能是我所遇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幸存者。由于受许多无名恐惧的影响，她感到生活很压抑。她自己承认，由于没有父亲，她的孩子非常软弱。她宣称：“但是，我为自己这么长久的幸存感到骄傲。”为了伪装自尊，为了不去细想大屠杀对自己的负面影响，埃斯特·费希尔需要专注于自我成功。

由于一些幸存者需要努力忘却过去的羞辱，他们采用了证明的方法，反对夸大人类弱点的片面观点。他们相信，只有虚弱或软弱才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由于害怕流露对过去的恐惧感而难以控制目前的状态，幸存者不愿回想过去。然而恐怖、愤怒、悲痛却隐藏在内心深处。幸存者尽力使自己远离阴影，尽力向前看，远离死亡的恐怖。

有可能幸存者受潜意识的影响，担心因为战争中的某些特殊行为或者在战争中的消极行为而被心理医生指责。据权威统计，即使最初的立案，都会引起他们的焦虑。由于“环境”的影响，幸存者不得不做出许多令他们倍受折磨的决定和行为。道德时代带来了他们在道德上的两难选择。或许有的因为内在的矛盾，有的因为人们对他们在战后所讲述的故事不相信也不感兴趣，大多数幸存者都相信，所有生活在大屠杀时期的人都可能理解在那种形势下的行为或经历大屠杀后的心理影响。安娜·马利尼称，在她的事件中，心理疗法明显是多余的。心理疗法根本不可能根除她的记忆和那种极度的痛苦。“我不需要它，你不能忘记，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想象到那是怎么样……奥斯威辛集中营，人们竟然不相信它。”安娜的话反映出了另一个主题，有些人拒绝仔细考虑和认真反省大屠杀，在他们看来，发生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只须好好生活。

5年前，作为心理医生的埃塞尔·雅诺夫也曾寻求心理帮助。埃塞尔的内疚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她解释了她不愿寻找心理帮助的原因：“必须承认，我并不感谢我能生存下来，也必须承认那是一个错误。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我像是失败了。当别人死去的时候，我有什么权力去抱怨？”其他人已经死去，已经到了痛苦的极限。对于埃塞尔，寻找心理治疗就等于抱怨。

对于许多幸存者而言，物质财富和家庭象征着精神健康的内部力量，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自己似乎做得很好。一个非常成功的幸存者解释说：“看看我所取得的成绩，就知道没有必要进行心理治疗。我没日没夜地努力工作，因为我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我过去所没有的东西。”

其他幸存者对于他们过去所受的心灵创伤继续保持感情上

的敏感并且断言：“在这种环境下，我做的一切很正常。还有什么可期待的？”他们宣称，他们的反应很正常，不需要治疗。索娅·韦斯也不愿再想起过去。“我不能谈论过去，就像你曾经埋葬了其他的东西一样，过去被埋葬了。可能我需要一个心理医生，我相信我需要，但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但还不能稳如磐石，我的情感还不像我希望的那样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是艰难的，需要某种精神上的稳定。一个人的经历应该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坚强的人……我尽力而为了，但生活毕竟是艰难的。”

67岁的卡拉·格兰特来自波兰一个小镇，他是家中惟一的幸存者，在美国底特律离她家很近的地方接受治疗。30多年来，她一直定期返回波兰。我们在一起谈了5个小时，最开始时她告诉我：“在战争前，我母亲的姐姐在美国。战争爆发后，她请求我父亲尽早赴美。但是我父亲认为，美国不好，所以，我们留在了波兰，后来他们都遇害了。”解放后不久，20岁的卡拉嫁给了另一位幸存者，他们认识才不过一个月。“战后，我看到许多人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但只有我在这个世界上孤单一人，为此，我不知哭过多少次。我寻找过我的表姐、表哥和叔父们，可他们都被杀害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陌生人，没有家，没有人可以交谈，感觉很孤独，就像河里的一块孤独的石头……”卡拉在解释她之所以寻找心理治疗的原因时说：“我要应付我的孩子和丈夫，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也无法理解我，我的家简直不像一个正常的家。我的丈夫是个精神病患者，他经常发疯似地讲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如何被从他母亲和姐姐身边拉走，他哀求要和她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法从这件事中解脱过来……我们过着艰苦的生活，维持着不幸的婚姻。战后我没有感到一丝的快乐。”

对于那些选择心理治疗的少数幸存者来说，经历心理疗程也是很困难的。心理疗法需要有乐于冒险的意愿，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通过释放来缓解他们的敏感和脆弱。很多事例证实，这种“基本的信任”是工作成功与否的必要因素。但是，幸存者的信任感在战争期间被所遭受到的精神创伤所破坏。他们总是过分担心失控，担心会失去对现在稳定状态的控制力，这种扭曲的记忆是很普遍的。一些患者表明，他们不敢回忆过去的事情，特别是那些与罪恶或羞辱联系在一起的事情。

对心理医生来说，潜在的陷阱包括，当他们听到那些以前被认为只是存在于小说中的恐怖事件时，很难继续客观地面对愤怒或绝望的感情。相反，他们会不能完全正常判断或相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情，他们的怀疑态度会随即传给患者。最糟糕的是，他们会把患者现在的症状归于幼年的抵触心理，而且不太相信犹太民族因大规模迫害事件所受的影响。直到1980年，精神病治疗协会才创造出判断精神压力疾病的方法，承认了创伤对于压力症状延长的作用，而不一定是由于无意识的挫折和争执造成的。

尽管战后国内局势紧张，还存在外部障碍，大屠杀的幸存者依旧显示出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那些移居美国的幸存者，大部分很快成为了社会中层的体面人物。战争期间，幸存者们采取了一种心理学上的相对论。他们在集中营的时候，如果能得到一双皮鞋而换下木鞋，就感到非常高兴。定量配给面包不仅使他们懂得了珍惜，而且使他们面对战后的困难从不惧怕。经历了这些遭遇，使他们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也有例外，那是因为他们对出乎意料的迁移和死亡造成的损失过于敏感）。在大屠杀中，幸存者的反抗谋略有所发展，加强了他们克服困难的决心。他们确是这样，不被感情所妨碍，勇往直前。

虽然一些幸存者对某些突如其来的困难也感到恐惧，但大多数人自觉行动起来与那些伤害和威胁其生命安全的事情作斗争，他们毫不畏惧。他们对自己说：“最坏的遭遇曾经出现过，我战胜了它，所以我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在承认运气因素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幸存者的自救、果断、机智、刚毅帮助他们获得了自尊。

尽管在逃生中，怪异、混乱、偶然机遇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能够生存还有其他的原因。有些幸存者自己也没有发现那些原因……

一些人因为他们还活着，所以对自己形成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生存，不过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其他人不愿经历的艰苦历程。这种经历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得到确认，至少他们相信那些经历几乎是同一类事情。他们有做重大决定的能力，而且这些决定是事关生死的，他们不能不为此感到高兴。他们无论何时陷入绝境，即使是脱险的可能性很小，也不放弃积极谋划，使自己成为成功的幸存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一直持这种观点，并对这种认识模式推崇至极。^①

在幸存者的谈话中，他们重复着这个主题，或许不像骄傲那么值得炫耀，但却关系到他们的过去和目前的决定。“我不会放弃，我要渡过难关。”“我不会被难事压倒，我要设法搬走挡在我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由于曾被人类残酷地抛弃，许多幸存者已经失去融入人类

^① 拉比诺维茨：《新生命》，第87页。

群体的勇气，他们仅仅集中注意力关心他们的核心家庭和周边的犹太人亲戚。（在犹太人的社区里，大屠杀的幸存者是以色列最热心和最忠实的拥护者。）但是，在我采访过的人中，也有一些人，由于饱经苦难，他们的心态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路易斯·温特劳布是波兰拉齐明地区一个哈西德派家族中惟一的幸存者。他问我，“你理解离开孩子的痛苦吗？”1942年，在华沙犹太人区外，路易斯先系上十字架，然后把一个标签挂在仅仅两岁女儿的脖子上。标签上写道：“我是寡妇，我丈夫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乞求您可怜可怜我的孩子，耶稣基督保佑您。”路易斯把女儿领到一个街角，他到街对面建筑物的阴影下躲了起来。

他注视着一个波兰警察把女儿领走了。战后，路易斯在一所修道院里找到了女儿，那里的修女们向他索要钱财，否则不让他领走女儿。他对此并不抱怨，并称：“大屠杀把我变好了，我是好人，我有更多的理解力和情感，我对痛苦更加敏感，对其他人比以前更加宽容。”

早年，西蒙·纽曼装扮成一位波兰的非犹太人并且积极参加抵抗。他告诉我，“在经历了战争后，我已经部分麻木了，只有本能的反应而没有感情。”我问他，在大屠杀的持续影响中，哪一种是最显著的。“内心的软弱，我觉得我无法阻止那种经历的出现，也无法挽留所失去的一切。有时，我只想哭。”

大部分幸存者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与没有陷进第三帝国漩涡的人有所不同。这种疏远感，在他们被出卖经历的强化下，成为一种独特的、抹不掉的印迹。他们认为，保护无辜者的人类契约被废除了。我问索尔·芬克尔：“大屠杀对你有任何持续的情绪影响吗？”他哭喊道：“非常糟糕……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全世界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是他们没有付出任何

努力来阻止它。”

我们珍视生命，那时贝西生了个孩子，可是德国人把孩子带走杀掉了。我们是什么，超人？对此置之不理并且对世界说：“感谢你们解放了我们？”我们把手洗干净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和平……也许其他的幸存者能够，我不知道。如果你问我，我就会回答，我不能。然而，我要生活，要创造，要贡献，要工作，能够呆在一个给予我自由的国度里我感到快乐……但这不是结果，还有更重要的结果。即使被给予了一些补偿，也不可能将心底的伤痛抹去……我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吗？……我不这样认为。^①

如果人们早一点关注他们后来关注的事情，或者至少对纳粹不公正的迫害予以关注的话，幸存者也许已经放弃拉动人类负疚感的绳索，听任人们否认他们的痛苦，切断所有遗留的记忆。

除非萨拉或者别的人强烈请求她坦言相告，否则她会有意回避谈论饥饿、犹太人隔离区、奥斯威辛集中营、点名或任何其他类似的经历。当她讲述她所确信的一切时，人们不能接受那些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可信的事情。告诉人们那些他们不能相信或者不愿相信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置于一个非常糟糕的境地：或者他们憎恨那些事物，或者会认为你在这些事情上不可信任……除非人们请她讲，否

^①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52页。

则她不愿意谈论太多过去的事情。在后来的几年里，她带着沙哑的声音自豪地讲述了一个故事。她说，在他们搬到休斯顿后，一个大学的犹太教授在几年时间里，每周都同她和她丈夫玩牌，却从来不知道他们是幸存者或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只知道他们是战后从欧洲来的。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战争、罪恶、政治、历史以及各类话题。但是，这位教授和他的妻子从来不想知道她和她丈夫是什么人。战争期间在希特勒铁蹄践踏下的欧洲生活过的往事，她从未跟他们提起过。^①

即使对话者相信他们，幸存者也感觉他们并不能被人理解。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可能预测未知的模糊现实。在那时，他们对未来的无知促成了对生命的否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普遍认为，幸存者所遭受的迫害是无法证明的，不管怎样，你会使自己遭受无端的怀疑和指责。

幸存者强调大屠杀的惟一性。他们拒绝把自己的悲剧与其它灾难进行比较。他们感到大屠杀是一次独特的经历，从而阻止了那些不太排外的民族对他们的认同感。路易斯·温特劳布阐述了幸存者和非幸存者之间的区别，“让我们讲他们看到的故事（大屠杀），他们是用旁观者的眼光观察的，他们不能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他们无法理解。即使是我自己，当我有时回顾整个事件时，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的。那些事情不可能是人类做的。”

人们相信，能够相互安慰和吸引的亲密朋友才能相互理解。因此，拥有这种相互关系的人，常常可以去做而不必说出

^① 拉比诺维茨：《新生命》，第124页。

来，不必解释。然而，其他人却排斥你，根本不能了解你的行为方式。因此，幸存者对于其他幸存者的认同并不奇怪。（一个幸存者认为另一个幸存者没有遭受比自己更严重的不幸，然而，另一方却抱怨别人对自己痛苦的理解总是比自己感受到的少。）多拉·莱文森说：“对那些经历大屠杀的人而言，可能我是比较随和的，我的感觉与他们比较接近。我无法同那些非幸存者谈我的经历，他们不能理解……我不能排队取食品，即使是在非常美味的自助餐中也不行，一排队我就会看见自己在集中营的情景。这对我的美国朋友很难解释。即使我告诉他们，他们也理解不了上百人排队要一小片面包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我告诉我的幸存者朋友，‘我不能排队’，根本不用告诉他们原因。你看，这就是区别。”

通常，我们与最亲密朋友的交情始于童年时代。在成长的年代里，相同的经历形成了彼此的默契，那里有对其他人基本经历的本质认识。当我们长大成人，远离童年的生活环境，我们要达成一致就比较困难。早年的历史被切断了，但由于他们体验了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大屠杀——幸存者趋于相互肯定。无论是出生在波兰、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各种细节——气味、声音、习惯、祈祷、政治——形成一个同一的犹太世界。

当幸存者描绘他们在解放后的条件时，他们经常说：“我获得了新生。”这当然意味着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准备重新开始。但是，幸存者使用这个句子也有隐晦的意义。其意思是说，对于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人，不仅在世界上失去了过去那种生活，而且生命的根系——母亲、父亲、丈夫、妻子、孩子和财产——也完全被一笔勾销了，

“仿佛我哪儿的人也不是”。^①

由于刻骨铭心的伤痛，幸存者自己与其他人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他们注意到那些很自然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也记得他们的掠夺者。保罗·汉德尔是他家里惟一的幸存者，他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5年地狱般的生活，也没有看到他们的母亲走向焚尸炉。你出席过很多场合，也看见很多的父母和祖父母。我总是问：为什么不是我的父母、祖父母在这呢？”西蒙·纽曼告诉我：“与那些非幸存者朋友相比，我感到我与幸存者有更近的血缘关系。我认为，我的美国犹太人朋友几乎都是浅薄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从未达到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深度。昨天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那是非常悲痛的事，但他们一直在抱怨葬礼的安排有些不对。我自己在想，我连自己父母的坟墓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哭泣着）……看看你们有多么幸运。”

幸存者把他们的生活经历与那些“浅薄的人”相比，并要自豪地讲述他们辛酸的历史。他们要把悲惨的过去以及现在的特殊种族感情，转换成为一种优越感，这与非幸存者进一步地分离了。1942年以前，索尔·西图维兹和他的一家住在托马斯佐夫-马佐维奇的犹太人隔离区。当索尔和他的父亲在犹太人隔离区以外工作的时候，他的妈妈和姐姐被包围起来，她们被带到特里布林卡。索尔在18岁时，孤身一人到了美国。“我认为我们比那些非幸存者要强，我们来到这里，不认识任何人，身上没有一个铜板，不懂当地的语言，不知道怎么养活有4个孩子的普通家庭。而我们在这经济发达的国度的表现是十分出

^① 拉比诺维茨：《新生命》，第109页。

色的。”

我问萨姆·戈德堡：“你与未经历过大规模屠杀的人有什么不同吗？”“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却认为我不一样。我比他们强一些，他们看不起我。在以色列，他们问幸存者为什么不打回去。在美国，他们把我们看成是缺乏经验的生手。我被送到德克萨斯州的科普斯-克里斯蒂，他们看到我的号角，然后嘲笑我：‘你见过香蕉吗？’”

幸存者有不同于非幸存者的观点，他们更警觉、多疑、警醒。他们看到了内在的东西及其力量。

我学到了更多关于人性方面的知识。他们（非幸存者）却没有学到。我知道没有人性的人是什么样。在这个有规律的世界里，人们根据他们的环境表演着。我生活的方式不同，因为我知道相反的那一面。

总之，那些非幸存者更天真，他们相信很多废话。我更有经验，我不会受那么多伤害，因为我不相信人们所告诉你的那些事。

我认为我辨别危险的能力要强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屠杀的人。

许多幸存者内心是很痛苦的。伊兹哈克·朱克曼是华沙犹太人区暴动的一位领导人，他声称：“如果你能舔我的心，它会毒死你。”赫谢尔·卡普兰如今79岁，他是在维尔纳的家庭中惟一的幸存者。他忏悔到：“因为我迷失……找不到路……这伤害更多。人的死亡是一个正常过程。人们死亡的方式使他

们与那些活着的人区别开来。”

正如他们坚持说他们是正常的，具有享受生活的能力，精神很坚强一样，少数幸存者坚持认为，他们与非幸存者之间基本没有区别。他们曾被挑选出来过一次，他们不愿被打上烙印再一次与众不同。

玛莎·贾纳斯强调，她和其他幸存者不太相同。16岁的玛莎在战争期间，佯装成一个波兰非犹太人一直在德国工作。在那里，她遇到了几个好心的德国人。战后，她描绘了厄尔姆难民营的“恶劣条件”。“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有几个德国人对我很好，他们有修养而且整洁。在那里，我与从俄国和匈牙利来的人们住在一所难民营里，他们非常肮脏鲁莽。”当时，玛莎没有否认她的犹太人身份，但对德国人却有一些认同感，对他们表示友好。即对敌人有认同感，并从敌人那里获得力量。由于她与集中营里的其他幸存者保持一定的距离，玛莎可以避免因为看到她的犹太同胞的遭遇而导致的精神伤害。与绝大多数幸存者不同，玛莎因为对德国人的认同，而对德国重新统一保持了乐观的态度。她设想：如果德国人喜欢我，我不必恨他们，也不必害怕他们。

多数美国犹太人拥有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那些来自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突出了自己的犹太人和幸存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在幸存者与美国犹太人之间是有距离的。大屠杀的幸存者认为，那些在安全的大陆上晒太阳的犹太人的情感是有限的。

78岁的多拉·莱文森很气愤，她不愿听关于在二战前美国犹太人社区缺乏安全感和政治组织的说法。对她来讲，这是不能原谅的。“我觉得美国犹太人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在塞尔玛游行，但是，当我们正在遭到屠杀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到华盛

顿游行。他们崇拜罗斯福，忘却了他抛弃圣·路易斯。他们装作不知道，但我不相信。”多拉同时对美国犹太人把他们不同的生活条件进行简单比较感到愤怒：“我听到很多人都抱怨说：‘我们在大萧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我不必告诉你这给我造成的影响。”这些冒犯性的语言，使得幸存者与美国犹太主流社会进一步地疏远了，因为美国犹太人对幸存者的苦难经历太缺乏理解。此外，美国犹太人对苦难的抱怨，证实了他们与坚韧的幸存者相比是多么的脆弱。“如果他们得不到冰激凌，他们就哭鼻子。”索尔·哈尔彭对我说：“美国犹太人？他们被宠坏了。他们对我说，在二战中他们没有汽油票。”

幸存者对美国犹太人的感情，也受解放后他所期望的和得到的帮助的影响。有些美国亲戚跑到欧洲寻找幸存的家人，并且发誓要帮助他们向国外移民。很多幸存者对他们在欧洲和到达美国后得到的帮助表示感激。这些帮助来自像希伯来移民资助协会这样的犹太团体。其他的幸存者却希望得到更多。1942年，埃斯特·弗拉姆的母亲和弟弟从里加的犹太人隔离区被抓走，她的父亲和哥哥早已被抓走。由于埃斯特得到了工作许可，她可以留下来，但是她坚持要陪着她的母亲。在阿佩尔普拉兹集合时，埃斯特的母亲发现忘记带儿子那双结实的鞋，埃斯特便跑回家。但是当她返回的时候，她的母亲和弟弟已经被带走了，此后她再也没见到过他们。在旧金山郊外她自己家的门厅，摆放着遇害家人的照片。埃斯特愤怒地指责：“他们从未询问过。到今天为止，我的美国朋友从没说过：‘告诉我你的遭遇吧。’他们根本不想知道。”

美国犹太人从未遭受过反犹太主义的致命影响，所以他们既没有充分的警惕，也没有对这场反犹太运动作出反应。幸存者要告诉美国犹太人，你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安全。“我是

一个幸存者，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罗丝·弗里德兰德频繁地在学校演讲，她强调说：“当我发现他们在二战中的行为方式时，我极为气愤，现在我更加愤怒。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场大屠杀却依旧不理解……为了犹太孩子的未来，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听了犹太人的谈话，他们并不知道情形有多么严峻。”

大屠杀的幸存者与他们的民族紧密地融为一体。在欧洲这个犹太人生活了19个世纪的家园里长大，他们有着更坚韧的传统，对他们和他们祖先的历史延续性和命运的感情远比对其犹太亲戚更亲密。因为没有国家作为强大后盾，所以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迫害。为了民族的生存，幸存者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对于幸存者来说，以色列是最可靠、最重要的保证。如果在1930年，世界就有了一个犹太国家，上百万的犹太人也许就会得救了。今天，幸存者仍然认为，无论在哪里，以色列都是身处危险境地的犹太人惟一可以信赖的避难所。而且，以色列的军队不但在其国境内保护着他们，同时也为世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提供了安全感。令一些幸存者感到恼怒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和他们一样，对以色列有同样的感情和意志坚定的献身精神。他们抱怨说，美国犹太人太幼稚，因为他们不能明确地支持以色列，他们会把所有犹太人置于险境。海伦·舒瓦茨解释道：“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批评以色列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担心，我们面临一个独特的现实，我们知道拥有以色列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们从来没有认为犹太人已经有可靠的安全了。”

大屠杀幸存者曾经历过被另眼看待的痛苦岁月，我现在渐渐理解了我所访问过的幸存者在与美籍犹太人相处时的不自然感。这种感觉也许反映了移民的不安全感，一种来源与归属区别的意识。很多时候，美国犹太人增强了幸存者这种忧虑。在

二战前，罗丝·范戈尔德在波兰一个小镇渡过了人生的前 18 年。她说：“当我遇到美国人，我的心情有些复杂。根据我的判断，我认为他们看不起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比他们矮一节。在我的一个班里，一个犹太妇女对我说：‘你们那些人……’我震怒了。这使我想起了德国人，因为我们和他们有鲜明的区别。”

除去那些累累伤痕，在幸存者身上最为明显的是那种乐观的态度：他们有着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能力，组建新家庭的能力，享受生活的愿望，并且，依然信奉犹太人特有的信仰。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幸存者中，几乎没有明显意志消沉的人。（当然，我没有机会观察那些拒绝采访的人。）一位幸存者告诉我，他的妹妹由于精神异常产生了纳粹分子要把她带走一类的幻觉，不得不三番五次地住院治疗。几位在大屠杀中有名的幸存者（琼·艾默里和普赖姆·利瓦伊），最后因绝望而自杀。不管怎样，那些幸存者组织显然不愿多谈此事。当我问：“你们在集中营时是否有自杀的念头？”我所拜访的那些人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但与此恰好相反的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杰克·萨尔茨曼对我的回答，就是不断重复那句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我才不会让那些杂种们称心如意呢！”

第六章 年轻的希望

杰克·戴蒙德向我描绘了一个少年在集中营的遭遇。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逼着杰克去看他哥哥吊死的情景。“不论你是否愿意，你会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不得不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孩子般的天真烂漫已经成为奢望。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一步也不能走错……在战争期间，我也有和别人一样的小算盘——不要引起注意，不要被抓到，这是一种技巧。许多人都比我聪明得多，但由于过分自信，不能做到谨慎行事而惨遭杀害。在集中营里，为了求生，你不得不随大流，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在那里有许多同性恋者，他们往往很厉害，我总是有意识地避开，以免被骚扰。我从没有被骚扰过，但许多别的男孩却不像我那么幸运。

“在集中营里，先死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想的太多，人性怎会如此？……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而我则埋着头，从不思考这样的大问题。我想青少年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我还不够成熟，不太考虑后果，不去考虑更为深远的事情……但是我父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心已经死了……他总是不停地问：‘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很害怕，但我的精神并没有崩溃。那么多的成年人丧失了求生的欲

望……有时我在内心筑起一道无形的墙，使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视而不见……就像真的没有发生一样。我父亲确实看透了四周的处境，而正是这一点毁了他。”

近年来，人们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说明，纳粹在大屠杀期间，通过虐待、强奸、袭击以及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等方式对儿童进行迫害，造成这部分幸存者的身心创伤。

传统观点认为，人们遭受创伤的年龄越小，对其今后生活的影响就越大。在他们看来，因为孩子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基本感觉，防卫机制还不坚固，应付压力的方法也不成熟。然而，大屠杀的幸存者（那些大屠杀时期的青少年）以其年轻人所特有的优势，向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我在这里谈到的，并非是对生存而言所必须的体力和毅力，也不是纳粹选择年少和年老的人加以处死的过程对年少者的影响（因为这些人无法胜任奴隶般的劳动）。我所讲的是，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可能为克服逆境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这些青少年对变化的环境能够很快地适应，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太多的习惯，也没有太多与过去的联系，他们能够比较轻松地接近新的环境，接受新环境对他们的要求。艾达·科克从14岁被监禁，一直到16岁，经历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达朝集中营和马尔多夫集中营三个不同时期。她告诉我：“我简直是换了一个人，我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如果他们发现我14岁，就会杀了我……我没有任何经验。开始我不了解有关性方面的事情，也不知道德国人为了满足性欲带走了许多人。我不得不说谎，告诉别人我已经18岁。他们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说谎，怎样骗人，怎样偷东西，因为我年龄比较小……所以我很快地学会了这一切。”

青少年不了解形势的严重性，也不知道恶势力对他们迫害的程度，因此，他们完全避免了心理冲突。处在青春期的青少

年没有因不公平或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而感到痛苦，他们免除了信仰危机和种种失望。尽管在最开始时，他们缺乏综合认知能力，但过后，他们也很少因极度悲哀和孤独怀疑而麻痹自身。

一个老人肯定比一个14岁的孩子考虑的问题多，当时我所想的只是为我的父亲和姐夫得到尽可能多的食物。另外，我和父亲在一起，他一直在试图宽慰我，让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做好每一件事。那时，我甚至不相信母亲和我那怀孕的姐姐已经被毒死了。当成年人聚在一起时，他们总是自己哄骗自己。他们经常讨论“上帝会看顾这一切”……或“上帝不会理睬它”……而我只是低着头，尽力求生存。

25岁的人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生活经验，那就是用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对我进行的教化。我不是很聪明，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想的不是很多，只是在身临其境时，我才能理解，也许这就是我的幸运之处。在集中营里有很多自私的行为，但我却很天真。当我刚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我把鞋子放在头下当枕头，第二天鞋子不见了。毕竟还是个孩子，我很幼稚。

由于对邪恶力量缺乏全面的认识，年轻人一般是比较乐观的。年少的幸存者虽然面对的是充满了挑战和障碍的生活，但是他们依然成功地维持了几乎是奇迹般的生存。罗丝·弗里德兰德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昂格瓦的一个小镇长大的，她始终保持着希望。“在我的家乡有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一个医生，他们有一个小孩，当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穿带黄星的衣服时，他们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自杀了。可能他们对将来要

发生的事想得太多了。但对我而言，即使感觉到危险，我也相信自己能渡过难关。在18岁时，我很天真，也许23或24岁的夫妇很现实。在整个大屠杀期间，我一直很乐观，我从不想象自己的死亡。

“战前的生活对我的幸存是有帮助的，我知道在生活中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排斥，而且也朦胧地意识到那种生活有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绝望……我记得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我们三人睡在挨着墙的架式床铺上，墙上有裂缝，我能偷看到一点儿外面的天空。我常常问那位母亲：‘你说在外面的人会不会看到我们所看见的那颗星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和他们一样自由？’她却常对我说：‘睡吧，我的孩子，睡吧。’……”

“我曾对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的朋友说过，我知道自己没有方法活着离开那里——或者被毒死、或者被枪毙，但我仍然不相信自己会死。”

米纳·福格尔是家庭9位成员中惟一的幸存者，她的家在靠近喀尔巴阡山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家里的人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她与母亲和兄弟姐妹分开，被安置在C区并设法逃过了多次毒气实验的挑选。作为孩子，她的行为是冲动的，由于恐惧她顾不上羞怯，经常忘记行为的潜在后果。米纳解释说：“孩子像小动物一样，不知道害怕，年长的人没有勇气做我所做的事。”

在对付持续不断的、残暴的种族灭绝过程中，许多成年人崩溃了，而年轻人没有感觉到像成年人那样沉重的压力，他们没有感觉到死神的临近，因此愈演愈烈的迫害没有对他们造成毁灭性的心理影响。他们关心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忍耐的范围。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他们拥有激情，渴望发挥生命的光和

热，这种热情是无法扑灭的。埃丝特·费希尔在1944年19岁生日之前，一直住在洛兹犹太人隔离区。在这3年中，她看着父亲和妹妹死于饥饿和疾病。“每个人都知道明天不是我们的，只有奇迹发生你才能活下去。但我们依然相聚、相爱，我也有其他的感受……令人兴奋……但也是艰难的……你会变得如此坚强。”因为周围的现实告诉埃丝特和她的同伴，他们没有明天，他们的感情因而更强烈、更急切。埃丝特也有幻想、有爱、有对未来的憧憬。

安娜·米切尔在被驱逐到马丹尼克时，已经是家里惟一的幸存者，她最急切的愿望是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她说：“那时我们年轻，我们需要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如果我们年龄大一点，可能调整起来就会更加困难。因为年轻，学习东西很快也很容易。”如果你年轻，你会有更大的决心不被过去拖垮或阻挡。在你的生活中，只有一点点小的部分被毒化，你仍然有时间和能力来矫正，用旺盛的生命力抵御迫害的影响并使爱神复苏。

15岁的埃丝特·弗拉姆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把食物和书信偷运到犹太人隔离区。尽管在进入隔离区的搜查中，纳粹分子如果发现带有违禁物品的犹太人，就会立即枪决，也常常有人遭此不幸。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把她吓倒。埃丝特声称：“我认为我所做的算不上是什么英雄行为，我仅仅是因为年轻，年轻人爱冒险。”埃丝特的年轻帮助她逃避了死亡，她没有把这当做一次冒险，她幻想着永远拥有生命。

西蒙·纽曼作为地下组织的成员，佯装非犹太人，以此替人伪造证件，帮助其他人逃跑，还在华沙周围走私枪支。他告诉我说，年轻人需要兴奋的满足感，那些年是一种“崇高的体验”。“我最缺乏的是痛苦体验，在华沙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有

意义的时期，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处于那种环境，有那样的机会。有多少人可以说他挽救了其他人的生命呢？我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不只一次！我见过一些世界上最好的人。”西蒙没有被他的波兰同胞出卖的感觉，与其他幸存者不同，他没有一点愤怒之情。一些人在关键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当大多数犹太人的生命在迫害和仇恨中受煎熬时，西蒙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站出来为正义的事业而战斗。

孩子习惯了区别于成年人的对待方式，也熟悉了成年人的不平等对待。索罗门·戈尔德斯丁说：“因为我比较年轻，我能够承受更多的惩罚和羞辱。”作为一个青少年，他所经历痛苦，并没有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也没有太多的耻辱感。然而成年人则不同，尽管这压迫来自人类同伴而不是天谴，但是遭受接二连三的羞辱，他们依然感觉到迫害的压力巨大，并对此深感无能为力。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丹尼尔·达维多夫是他那个牢房中年龄较大一个，他当时 36 岁，他比同室的狱友更有经验，这一点对他极为有利。但是，他把心思全都放在他的妻子和孩子身上，他因为自己不能保护家庭而深深地自责，负疚感和羞耻感紧紧地缠绕着他。“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经历的比较多，我对晚辈有一种父亲般的责任感，我感到必须对他们有所帮助。我试图不去想我的妻儿，但是不可能（他泣不成声）……我失去了他们……也许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必须回家去找他们……听……我们就像动物一样，我们整天都在想如何得到食物，总在做梦。如果我能够再次回到家里，我就会找到一大罐饼干，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当然，角色也有颠倒过来的时候，有时孩子们拼命地想去保护自己的父母。1944 年春天，海伦·舒瓦茨与父母一起到达

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些带着孩子的妇女，当她们的孩子遭遇不幸时，她们尖叫着撕扯自己，一切都令人心碎。我紧紧地站在妈妈的身边，即使那意味着死亡我也在所不惜。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不能留在母亲身边保护她，她已经46岁了，在那里算是老人了，我必须照顾她，使她不至于遭到杀害。这种恐惧感充满了我的全部生命，一直到战后也是如此。”

几个幸存者曾经向我透露，他们在成年后一直对性生活存在不安全感。青少年时期遭遇到的性骚扰（更多的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毁掉了他们。根据幸存者的经历和受到性侵害的报告，在集中营里，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对象往往是逮捕他们的人。这些幸存者遭遇到性迫害，解放后又很快地结婚，进一步增加了他们性生活方面的障碍。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性生活体验。在许多案例中，爱情都不是他们在战后选择配偶的原动力。孤独感、熟悉感（幸存者经常与同乡或远亲结婚）、重建生活的渴望、摆脱过去的阴影等等，往往成为幸存者战后婚姻的推动力。

幸存者在解放后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么战后的50年他们又过得如何？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调整？在1945年，一些幸存者感到自己的感情被消耗一空，另一些人感到麻木不仁，有些人难以抚平逝去亲人的创伤。不管怎样，与那些在战后初期就与家人团聚的人大为不同，他们被隔离开来。有时，他们返回到祖先世代生活和繁衍的地方，去德国看看不断更换的红十字会贴在布告栏中的犹太失踪者名单，审视着其他犹太人的陌生面孔。

在很多情况下，更可怕的是幸存者希望的破灭。索罗门·戈尔德斯丁是他家里的惟一幸存者。他说：“1945年时，我非常消沉，每天都忧伤不已。一开始我总是梦想我的兄弟能回

来，然而……后来，我走遍了德国，希望找到活着的家人。但是，毫无结果。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里，我觉得我很快就会发疯了，所以我只好去找了个妻子，继续生活，以便忘记过去的一切……我痛恨德国人，我不能再呆在德国。”

毋庸置疑，在1945年，没有家人的陪伴，是最令人沮丧的生活。路易斯·温特劳布告诉我：“我的心破碎难收，似乎已经远离这个世界，我得的是心病，这是什么药也治不好的。”利奥·费尔德在14岁时已经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莫索森集中营和弗洛森伯格集中营。战后他成为孤儿，他在德国参加了美国军队。“在弗思附近有一个集中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到那里去寻找自己的亲人。我很孤独，在战后的岁月里，我拥有所有我想要的东西，食物、住房……可总是感到若有所失，我感到非常孤独。”

杰里·辛格从布肯瓦尔德的金德布洛克获释后，把自己形容为“一个爱发脾气的年轻人”。在随后的几个月，只要有可能，他就尽量发泄自己的愤怒与不满。“我喜欢与人争斗……如果我听到有人争吵，无论是什么事情，我也要加入进去。”在幸存者中，索罗门·戈尔德斯丁愤怒的程度是异乎寻常的。大多数幸存者在大屠杀期间敢怒不敢言，在解放以后仍被迫压抑怒火。索罗门回忆说：“因为美国人不允许，我们不能杀德国人。德国人如此迫害犹太人，我们却不能报复，我简直快要疯了。”

经历了长期人类社会的强制性排斥，当幸存者被重新接纳时，他们感到十分困惑。原来熟悉的一切——亲人、财产、家庭、日常生活、社交礼节、社区，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一空。在战争开始时，他们还不是成年人，许多生活的知识还没有学会。战后，他们面对的是无数的问题及很多悬而未决的答案。

1955年内奥米·利德结婚了。她帮人做衣服，上夜校，在美国快乐地生活。然而，在1945年时，她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我真的一无所所有……我不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莫名其妙与现实分离，我也不知道如何做衣服。”艾达·科克记得，解放后一年中的生活是“混沌”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获得自由，但是我没有父母，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获得自由以后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我们离开集中营时，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美国人给我们口香糖，但是我只有15岁，为什么他们不送我上学或回家？……我是一个孩子……失去了妈妈和爸爸……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的遗留问题却从未结束。甚至在战争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住在自己的家里，为什么别人要把我们家里的东西都抢得一干二净。”

索娅·韦斯的父亲和兄弟在1942年就被驱逐到特里布林卡。解放后，索娅·韦斯回到了华沙，她满怀希望去寻找她的父亲和兄弟，结果无功而返。于是，在1945年10月，她回到德国。“我们脏乱得一塌糊涂，我们6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我感受不到任何生存的乐趣。我为生活作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一文不值……我们曾经像人一样……我该如何向你解释……当一个人游荡在……当一个人游荡在……他无所依托，失魂落魄。我们看上去很可怕，我已经没有头发，大部分牙齿也脱落，看起来肮脏不堪。只要找到能吃的东西我就不停地吃，所以我很肥胖，我庆幸自己没有那时的照片。”

在解放后的几年里，也有许多幸存者既不沮丧也不绝望。恰恰相反，因为摆脱了死亡的恐惧，他们感到十分快活。在解放后，也不清楚是为什么，当其他人感到更加压抑时，一些幸存者却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另外，也有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例如，受迫害的性质和程度、其他幸存家庭成员的存在、

战前的人格倾向、对忧伤的抵御能力、对战后环境的强大支撑力、对个人生存意义的理解等等。

丹尼尔·达维多夫告诉我：“我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我能生存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我非常感激上帝创造了这个奇迹。”的确，不仅他奇迹般地生还，他的妻子、孩子和5个兄弟也活了下来。解放4个月后，20岁的萨利·沃瑟嫁给了她哥哥的狱友，一个劳动集中营的小伙子，她住在温森（卑尔根-贝尔森附近）一所宽敞的公寓里。“我那时感觉良好，一直是笑口常开。”“笑？”我问萨利。“为什么不笑？年轻人的特点嘛。我们都很年轻，我们要享受生活。有些人无法摆脱大屠杀的影响，他们比较软弱，但有些人却比较坚强。我丈夫是他家中惟一的幸存者，他时常呆坐着回忆过去。而我们即使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也坐在房里唱歌……那并不意味着你忘记了发生在周围的一切，而是想办法活下去。”

“每个人都有一点动物的生存本能。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你现在坐在电椅上，你不断乞求，一直到精疲力竭。他们正准备插上开关，突然有人进来说，停一下，你自由了。想象一下那种兴奋，你会毫不迟疑，飞快地跑出去，大喊我活下来了。”不要怀疑你的好运气，不要太颓废，竭尽全力勿回头。对于萨利·沃瑟而言，大屠杀不仅没有使她软弱，反而激发了她的生存本能。

保罗·汉德尔揭示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思想矛盾，幸存者的负疚感深深地笼罩着他。“有时，我为自己的生存而高兴，也许那是自私的，但这是事实。有时我会很悲伤，但我不会对任何人提起。在那段时间里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想念父母和兄弟姐妹，想知道他们在毒气室里临死之前会想些什么。”

幸存者希望弥补失去的时间，渴望重建被摧毁的一切，继

续生活，尽力驱散自己生活中的恐惧和悲哀。索罗门·戈尔德斯丁谈到：“开始的时候，人的确生活在记忆中。但是，我们也希望立刻重新开始生活，我们希望结婚，努力忘却过去。”1946年，埃丝特·费希尔嫁给了她幸存下来的同乡。在战争中，她失去了家庭，她需要与自己所爱的人缔结连理，弥补生活中的缺失。“我只想要一个孩子，这是我的惟一希望。”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这段时间，幸存者忙忙碌碌，他们抚养孩子，勤勉工作，捐钱给以色列。这些活动有意无意地抚慰着他们的创伤、愤怒和内疚。他们仅仅在做，而不愿去想、去感觉。我问马雷克·辛格：“那段时间您有何感受？”这一提问引出了他许多的商业冒险经历。尽管需要与不熟悉的环境作斗争，尽管对孩子的安全产生不应有的担忧，尽管担心他们的新生活和好运再次失去，尽管他们工作时间更长更辛苦，但是，大多数幸存者仍然认为那是一段愉快的时光。他们感觉到这是一段有活力的、奉献性的、有希望和相对安全的日子。

丹尼尔·达维多夫说：“我在美国工作得不错，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到1955年，杰里·辛格已经结婚6年，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圣弗尔南多他的事业十分成功。“我拥有很多乐趣（在1955年），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家庭中充满欢乐。我参加了一个宗教社团，我和其他幸存者一起玩纸牌游戏，我的牌技很高超。我不愿意谈太多有关大屠杀的事情。我知道非犹太人永远不会有心来询问这些事情。”

然而，对于另一些幸存者，在一个新的国家重建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战前的专业训练、职务如今毫无用武之地；过去所受的教育和所得到的身份地位，因为缺乏流利的英语而派不上用场，这使他们感到灰心泄气，甚至感到

羞辱。更多的情况是，这些幸存者被迫进入到无法显示其才华的领域中去。许多幸存者的教育被突然中断了，不能继续发展。

索尔·加伯来自波兰的塔诺，是家中的惟一幸存者。他回忆起 50 年代的凄凉生活：战争结束时他年仅 17 岁。19 岁时，作为一个孤儿移民到美国。“我离开学校很多年了，我的英语不好。我赤手空拳来到美国，没有钱，没有亲戚。那段时间真是困难，比大屠杀期间的压力还要大。我开始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如今，索尔是一个牙医，而且担任几个幸存者组织的领导工作。像大多数幸存者一样，索尔经过调整，获得了成功。

索娅·韦斯活生生地看着母亲在马丹尼克集中营被带走毒死。解放后，她嫁给了另一个幸存者，那人有一个女儿。他们三人在德国短暂停留了一阵后，移民到法国的马赛。当我问她在 1955 年时的感受如何，她说：“调整自己来适应一个新的国度，是很艰苦的，我们不得不去谋生。我与内奥米（她的继女）很难相处，她在修道院里听说犹太人杀了基督，她不想做犹太人……如果你有自己的孩子，你会同孩子一起长大。那时，我是一个年轻女子，有自己的困难。法国人把外国人看得无足轻重……你必须缝合生活的创伤。那时，我去商店，人们总说：‘为什么每次到这里你都不笑一下？’许多年来，我甚至不会哭。当他们带走我母亲时我都没有哭，后来也一直没哭过。而现在我总在哭……在受迫害的时候，我表现得比后来好，那时我可以忍受各种打击……战后，我常常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购物，人们说：‘你真奇怪。’他们说对了，我是有些怪……从我开始在我丈夫的公司里工作后，我觉得一切都在好转，我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工作起来顶三个男人。它使我

忘掉所有别的事情。”索娅·韦斯像三个男人一样工作，因为她需要三个人的力量压抑她的思想和感情。当她停止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时，又将会怎样呢？

当时，幸存者形成了基本的调整方式，初期是感情麻木或者兴奋愉悦；接下来是一个否定期，压抑扰乱的情感和记忆，以便能集中精力重建生活和家庭；最后通过追忆往事并倾吐更多尘封的记忆，与过去的遭遇建立历史的联系。当然，这种调整方式也会受到不断变迁的生活的冲击。生意场上的失意、信念的动摇、严重的生理疾病或残疾、家庭危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幸存者重建世界的努力。

对于幸存者而言，对其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童年快乐。在一定意义上，第二代人是对他们父辈梦想的补偿，是对过去被掠夺和毁灭的补偿。孩子为父母的生存提供了目的，从而减轻了幸存者的负疚感。父母们强调，这就是我活下来的主要原因。我采访了两位幸存者，尽管他们在经济上有了非凡的成功，然而却非常焦虑，因为他们的孩子婚后对家庭不忠，或与非犹太人结婚。对于幸存者来说，孩子的不忠不孝，不仅暗示着希特勒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而且也暗示着他们弥补过去的损失、开拓新生活的努力宣告失败。（第二代人已经对这些问题有所反应，尽量接受祖先的规定。在犹太人口中，异族通婚率是非常低的。）^①

幸存者经常说起他们曾经历过三种生活：大屠杀之前、大屠杀期间和大屠杀以后。此时，一些幸存者的过去和现在已经混合在一起，他们离过去的经历越远，感觉就会越不同。前些年，埃丝特·弗拉姆一直不允许自己回想过去的苦难经历。她

^① 哈斯：《大屠杀的阴影》。

告诉我：“如果我总是回忆，势必就会影响到我的孩子，我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她继续用现在的观点描述过去那朦胧的记忆。“我和三个女孩子躺在集中营的床上，想象我们能否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不用偷窃，用刀叉吃饭而不是像动物一样用手……我越远地逃离过去，我的生活就会越不同，我想的就越少。有时，我不得不扪心自问，那是我吗？我真的经历了那些事情吗？”即使埃丝特目前的生活是正常的，她也确实在集中营里呆过，还提出了如此的设问，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般人”的想法。他们认为大屠杀是难以想象和不能理解的，就像埃丝特现在反问自己一样：我是否夸大了事实？

我问幸存者：“在生活中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艾达·科克的回答反映出很多受害者都曾有的悲观与感谢的混合情感，“我感到悲哀，因为我害怕我们都被杀光，没有任何人为集中营作证。后人已经否认发生过这一切……但基本上我是高兴的，我与孩子们一起生活，他们表现很好，使我感到很幸福。”

幸存者要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他们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弥合亲人遇害给他们造成的创伤。倘若如此丰富的生活仍然不能消除深埋幸存者心头的沉痛，或许他们就只好放弃一切，无法走上成功之路了。但幸运的是，年轻的优势为他们改变一切提供了精力和希望。

第七章 无法忘却的记忆

尽管推翻了纳粹法西斯统治，但是幸存者感到，大屠杀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战后的生活。“尽管我生活得很好，我还是忘不了过去。我总在想，假如没有希特勒，我根本就不会来美国。”幸存者个人及家族的历史被割断，失去了国家的归属感。琼·艾默里写道：“家是一个人从小到大依恋的故土，失去了家的人就等于迷失了自己。在异国他乡，即使对周围生活环境非常熟悉，甚至可能不会因为醉酒而跌倒，但在那片土地上行走，依然不会理直气壮。”^① 维也纳出生的汉斯·梅尔认为，他与国家亲密无间的纽带被割断了，这不仅使他无法认祖归宗，还产生了不安全感。当然，虔诚的犹太人依旧保持着种族的延续性，他们始终拥有自己的保护神。但是，对于艾默里而言，在经历了第三帝国的蹂躏之后，曼^②、海涅和贝多芬已经与他无关，他强烈地意识到：“人多么需要有个家。”

讲德语的移民作家……他们生活在幻觉当中，似乎他

① 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第48页。

② 曼·海因里希（1871~1950年），德国著名小说家。作品猛烈抨击了威廉二世统治下德国专制的社会结构。代表作有：《帝国》三部曲、《亨利四世》等。

们代表着“真正的德国”。因为祖国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指纳粹）的控制，他们不断在国外加强他们的声势。一个幻想当中的真正的德国，他们曾经在其怀抱里长大，而今德国已经与这些人毫无干系。他们感觉到，似乎他们这些保留着德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被流放了，这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无国籍难民对德国和国际社会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在犹太人心中形成一种意识、要求、力量，即希望得到承认。他们终于明白，他们是流浪者，而不是德国历史文化的保护人。^①

尽管幸存者早已离开卢伯林、雷多姆或切尔姆，但是他们总是禁不住地要去回忆那些地方和那里的生活。回忆往事是重新开始正常合理生活的需要。然而，多数幸存者认为，战后重建的生活尽管很成功，可并不合乎自己过去的理想。而且，幸存者对现实越是不满，就越倾向于回忆过去所拥有的快乐时光。对于一些人来说，尽管事业很成功，尽管组建了新的家庭，但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1939年，戴维·希曼尔斯坦和妻子及两个女儿生活在安特卫普，他忍受着自责的痛苦对我说：“我整天都在想那些日子，想过去拥有的快乐时光。战前，我经常在屋里唱歌，而且能唱好几个小时，我是标准的男高音……自从大屠杀之后，我再也没有唱歌……我记着戈培尔在战争中的一次演讲，他说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只要有犹太人存在，就绝不会罢手。如今，尽管第三帝国灭亡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快乐也不复存在。”

幸存者到了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的时候，往往怀着

^① 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第45页。

向往的心情回忆起青年时代。如今，他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孩子们另建家庭，身上的担子也轻了许多，他们很想知道那些过去与之共患难的人的故事。“战后，我必须为生存而忙碌，为将来做打算，所以，没有时间考虑过去的事情。现在我拥有一切，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在大屠杀中，我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现在，我的孩子也离开了家庭。当孩子们小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为他们奔忙，他们就是我生活中的一切。然而现在，他们都走了。”

战后经历的痛苦和艰辛，加剧了不少幸存者美化战前生活的倾向，他们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幻想归咎于年轻人看问题的简单和天真。同时，幸存者也有着把自己父母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理想化的倾向，他们坚信，如果没有大屠杀，就可以生活在诗情画意般的环境里。然而，他们无缘停留在孩童般天真的世界里，他们不得不学会在错综复杂、屡遭挫折的成人世界中生活。

也有少数幸存者对战前生活的理解更为现实，他们出生于贫穷的乡村地区，并在那里长大成人。海伦·舒瓦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塞弗勒斯小村庄长大。“如果没有战争，我永远不会有后来的体验。我周游世界，见识广泛。战前的生活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那时的生活并不美好，在那个小村庄，只有一条肮脏的小路和一个电影院，那是一段很艰苦的生活。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时间给我洗头，我不得不从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我一无所有，甚至没有自己的床。”很有意思的是，海伦和她的亲人都活下来了，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这种改变使她从更积极的方面去认识人生。

一些幸存者极力避免对大屠杀及其以前生活的回忆。“我

只是当有人提到那段往事时才去回忆，为了幸福，我有意识地忘掉过去。回忆没有什么好处，生活在不断向前发展。我需要
对家庭负责，还要考虑其他的问题，我不能回到过去，我要向前走。”然而，他们总要参加一些幸存者组织的社会活动或者在谈话中涉及过去。幸存者告诉我，他们总爱用：“你还记得……”的方式开始谈话。在幸存者之间，大屠杀几乎成为自我认同的方式。“我们出外就餐，在吃完的时候我会问他：‘你要一些加餐（给集中营里做特殊工作的犯人的额外食物）吗？’或者，如果我们在寒冷的冬天排成一行站在外面，我们就会像过去那样，靠在一起相互取暖。”

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大多数幸存者对于他们在大屠杀中经历的每一天都保留着生动的记忆。^①在战后的年代里，许多人依旧努力地保持对过去的记忆。近年来，幸存者重建生活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他们发现过去的记忆日见频繁地浮现在脑海里。巴西·博恩斯坦在洛兹的犹太人隔离区亲眼看着他的父亲死于饥饿，他的母亲和姐姐被毒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1948年他到达蒙特利尔时，犹太组织一直为他熟悉新的环境提供财政援助，但是巴里却坚持要立即工作。巴里宣称：“我不想要任何人的施舍，解放后的这些年我已经变得麻木了。我只有在看电影或看书时才会有感情的流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多愁善感了……比战后初期更容易受感染……那时，我忙于生计，没时间多想，我希望能自食其力。1950年我结了婚，两年后有了两个孩子，我为家庭日夜忙碌，像奴隶般工作。我决心要自食其力，根本没时间去感慨过去。当我能自立的时候

^① 伊娃·卡哈纳、博亚兹·卡哈纳、泽夫·哈雷尔和T.罗斯纳：《对付极端的损伤》，见威尔逊、哈雷尔和卡哈纳主编：《人类对极度压抑的调整》，第55-76页；卡哈纳、哈雷尔和卡哈纳：《健康的预言家》，第171-192页。

候，我才开始考虑其他的事情。”

艾达·科克是奥斯威辛和达朝集中营的幸存者，她如今在洛杉矶拥有并管理着大笔财产，我们是在她的私人公寓中采访她的。公寓建在布局合理的贝弗利山庄的大街上。我问她：“您是不是经常想起大屠杀年代的事情？”她回答：“只有在晚上或不忙的时候。我是一个工作狂，除了工作我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我一周工作7天，从早上5点到夜里12点。什么？我应该退休？生活在过去？这是我忙的原因。我不想有任何闲暇。人们去航海，但是在航海时你做什么呢？你想……为什么我母亲不在这儿？为什么我兄弟不在这儿？……我没有把那个年代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即使是进集中营之前的事情我也不愿意说。当时，我不得不戴上犹太人的标志，其他的孩子向我投掷石块。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集中营每天的24小时里，你必须学会如何打发时间。”

幸存者试图通过工作来打发时间，忘却记忆。但是在生活中，他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潜在地将他们与大屠杀的记忆联系起来，那种联系是非常特殊的，是那些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对于幸存者，由于过去的记忆是生动的、直接的，由于恐怖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脆弱感，因此，他们每天的生活都在不断地提示着过去的痛苦。

任何时候只要我看见起重机就会想起大屠杀。我目睹过被吊死的犯人。你知道，当人吊起来的时候，脑袋向下垂着。在诺德豪森干活的时候，如果机器坏了，他们就说是恶意破坏。一天，他们把12个人分成一组，用钢丝吊在一个铁棍上。他们用起重机把铁棍吊起，那些人一连几天就一直悬挂在那里。

当我看到电影院门口的队伍时，我仿佛又看到了毒气室前面的长队。

每天都会看到一些事情。我们住在离索比博8公里远的地方，曾闻到过焚烧骨头的气味。当我去看牙医，医生在我的牙齿上钻孔时，我就会想起那种味道。

几个月前的一天早晨，当我散步时，看到街上有一个苹果。由此，我想起了在我们前往考弗林工作的路上，我看到路边有一个苹果，我拾起来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下去。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犹太囚犯头让我站出队外，我被抽了15鞭。

最沉重的打击是我父母的死……以及他们死时的情景，想起他们就使我无法安宁。昨天，我和丈夫开车出去，跟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面，公共汽车排出的大量废气让我觉得憋气。这使我联想到，当毒气喷向我的妈妈爸爸时，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呀。你看，你过上了正常的生活，那种事从来没有……也永远不该发生。那只是暂时的。

我在马车上听说过……它使我想起外表上如此体面的人们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来……我想起那些高雅的人在杀害无辜的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外表上看起来是那么漂亮、优雅，装作没做过什么错事似的。

在采访过程中，78岁的多拉·莱文森的诉说，使我想起了她的儿子马克。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物理学教授。我的采访引发了多拉对这些琐碎往事的回忆。多拉和马克分开了，当她被送到雷文斯布鲁克时，马克却被送到了布肯瓦尔德。在战争结束前，他们奇迹般地在卑尔根-贝尔森团聚了。“我虽然说了很多，但都没有详细描述。现在我想起来了，当我儿子在火车站跟我说再见时，眼泪从他的眼中滚落下来，他问我：‘妈，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新兴的反犹太主义以及对以色列安全的担忧，很可能导致幸存者极度的脆弱，有时也会导致压抑不住的狂怒。

波兰出生的罗丝问：“我猜你出生在美国。”

我回答说：“不，我出生在德国。”

她轻蔑地断定：“那你一定是德国犹太人。”

“不，我……”

她惊慌失措地问道：“你是德国人？”

我解释说我是战后出生的，当时我父母住在海德尔伯格的一个难民营里。

罗丝强调说：“我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中，许多小事情，包括一种气味、一个人手枪的扳机……以及回家或在难民营里，每天都会忆起。政治事件会引起回忆，以色列会引起回忆。现在这种回忆更多了，因为报纸上读到的事情正在发生着，新纳粹、十字标志、剃平头的家伙，这些难道是我想象的吗？他们不是正在做吗？战后我们就像生活在旋涡里，我们想去生活，希望忘记过去，就像许多人去掉了自己身上的集中营的号码，希望证明自己。你不愿意别人拿你不当人看待……可是你仍然感到无助……那些事情正在发生。”

年龄大一些的幸存者清楚地表明，在他们现实生活中，总

是把对过去的回忆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们比年轻的幸存者有更多可以回忆的内容。此外，幸存者的内疚也强迫他们去回忆，因为他们是成年人，应该对亲人的死负更大的责任。在见面之前，80岁的路易斯·温特劳布已经录了像，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西蒙·威森索尔中心的档案材料证词录制口头陈诉（研讨时，大部分的幸存者都拒绝提供证据）。他是家中惟一的幸存者，死去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两个兄弟和四个姐妹。路易斯在他住宅附近建了一个犹太人小教堂，他解释说：“这是我为父母建的墓碑。”

杰里·辛格 1939 年时只有 11 岁，他代表了一小部分拒绝回忆的幸存者，他们不愿过去恶魔般的年代给现在的生活带来麻烦和苦恼。杰里果断地避开这些烦恼的事情，有意识地割断与战前生活的纽带。他玩保龄球，开德国轿车，不属于任何幸存者组织，不参加任何大屠杀幸存者的国际聚集。“从 1945 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仔细考虑那些事情。当幸存者聚在一起时，不可避免地把谈话转向过去。我走开或变换话题，我不想为任何大屠杀事业或纪念馆工作，我希望在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后，人们就别再来打扰我。”

许多幸存者不看有关大屠杀时代的书籍和电影，以避免引起沉痛的回忆。埃利萨·科恩的大屠杀故事就像咒语一样不断地重复：她如何不能救 14 岁的女儿，她如何因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而葬送了女儿的生命，她如何无能为力地看着女儿奄奄一息直至死亡。她告诉我：“一次，我看了一场电影，因为电影里的场面使我突然想起了大屠杀的情景，我跑出了剧院。尽管没有人说我，但我已经受不了了。还有一些彻夜不眠的夜晚，一旦看了电影，我就会想我又回到了过去，我甚至不敢去任何纪念馆，我怕自己会完全崩溃。”

许多幸存者不太清楚第三帝国的历史和它对犹太人的计划。如果你问一个典型的幸存者，在“万塞会议”^①上发生了什么事，她肯定不知道答案。一些幸存者至今忿然不解：为什么对犹太人的迫害会发生在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索尔·范戈尔德声称：“我想象不出其他的集中营是什么样，我所住的木板房就是我所理解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与另一位幸存者交谈时，我提到了一本关于大屠杀的书，我极力向她推荐。很显然，她觉得自己因此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我经历过大屠杀，我不需要读那种书。”对于这个幸存者而言，她的经历已经足够了，她拥有大屠杀的亲身经历，她自己就构成了对大屠杀的全部注释。

萨拉·宾德是奥斯威辛和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告诉我说：“电影影响我吗？没有！什么对我的影响更大呢？电影并不像现实那样可怕，人们谈论电影时，我的感觉很好。”而其他的幸存者却不希望上演有关大屠杀的电影。他们愤怒地认为，语言和图像不能完全捕捉到残酷和恐惧的滋味。丹尼尔·达维多夫非常愤怒：“如果它能对人们有所触动，我很高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我们当时的真实感受。反过来说，如果他们能表演出10%，没有关系。但如果他们表演出90%的真实情况，人们就会关上电视机……很多事情引起我的回忆，我变得很情绪化。我没有读过一本书或看过一场电影。他们把整个过程表演出来，这与你亲身经历完全不同。我从不看

^① 特指纳粹高级官员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郊区格罗森-万塞召开的会议，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在各地搜捕全部犹太人，将他们车运并组织集体劳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足以使大批犹太人“自然减少”，而残余的人则可以“相机处理”。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8卷，第113页。——译者注

大屠杀的电影，因为那不是真事……一些电影也不公正，散场后当人们走出影院，仅仅像是看了一场电影，没有任何恐惧。为什么害怕那些德国人——英俊、潇洒地从集中营里穿过——你在银幕上根本无法表现那些可怕的东西。”

各种媒体再现的大屠杀故事，一般都是通过某一片段使人们接触到那段历史的。在德国，当电视上演有关大屠杀的节目时，它唤醒了整个国家的记忆。在成千上万的德国家庭中，最初是孩子挑起了与父母关于那个时代的争论，出现了意见完全不同的两派。理想主义者认为，媒体的表现力度还不够，应该更真实地再现大屠杀；现实派则认为，对已经上演的大屠杀节目应该知足了，至少它可以唤起观众的情感和遥远的回忆。

尽管非幸存者无法理解那些描写真实的作品，但是大多数幸存者还是感激作者纪念犹太人的创作意图。一些幸存者沉浸在那些想象当中，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他们需要使自己确信这些事情真实地发生过，或许他们是想通过这种释放方式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或许他们是希望从过去混乱的记忆中理出一些头绪。多拉·莱文森解释说：“我不读书，我没有兴趣读那些关于别人的体验。但我看电影，我看到了许多我自己的影子和我的经历。之后我会做噩梦，但我还是要看。我认为我是一个受虐待狂，在许多画面中，我都看到了自己，我陷入其中难以自拔。”

多拉像许多幸存者一样，完全陷入了个人的大屠杀经历，而没有为其他人的体验留下心理空间。所谓“我没有兴趣读那些有关别人的体验”，就是说，她的灾难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事件。她强调，大屠杀是一种个人亲身经历的事件，而不能简单地说是—种历史灾难。她的世界被摧毁了，她的亲人被屠杀了。对她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更糟糕的呢？她坦言：我

了解大屠杀，因为我经历过。

戴维·希曼尔斯坦在1942年5月同他的家人分开，他的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都惨遭杀害，戴维一直想了解他们当时的境遇，甚至想了解他们生命最后一刻的所有经历。“每一场电影我都要看，如果没看成，我就读各种书籍。有时我感觉情绪很坏，我的妻子总是问我：‘你为什么总要惩罚自己呢？为什么总要读那些书呢？’我经常找一些我没看过的东西，我要读一些有关我兄弟姐妹的故事。每当读这些书时，我就会与他们不期而遇，或许我会了解到一些亲人或朋友的事情，我想知道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戴维要找回所有他能找回的东西，通过挖掘更多亲人命运的素材，戴维对过去的记忆进一步得到拓展。

有时，负疚感迫使幸存者去看更多的电影和书籍。罗斯·弗里德兰德和她14岁的妹妹德博拉一起来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些年来，她一直为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救助妹妹而感到深深的懊悔，“我总是没日没夜地看书，有时书中的情节使我毛骨悚然。我得了头痛病，变得心烦意乱，夜不能寐，但我想知道其他人的经历。我知道我幸运的原因是我仅仅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呆了3个月……我感觉我的经历只是大屠杀经历的一小部分，通过读书或看电影，我感觉像是又经历了其他的事情。我能理解它，就像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交响乐……我想知道更多。哪里是它的结尾？我要知道每个人的故事，我愿意同那些呆在毒气室里的人交谈，他们有什么感觉？我总想起我的妹妹，她在毒气室里的感觉是什么？她挣扎、喊叫了吗？我想体会她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每一瞬间的感受。”

幸存者为自己丧失了对战前生活环境和在大屠杀岁月的记忆感到悲伤。书籍和电影可以帮助他们把战前、大屠杀和现在三

种生活结合起来。这既证实了他们的坚强，也有助于恢复他们的自我认识。“当我们经受痛苦的时候，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都在盼望看到法西斯战争的失败。看电影使我重新体验了胜利，看到自己作为一个人重新站立起来。此外，通过看电影，我又进一步确认了魔鬼的行为，他们是怎样的猖狂嚣张。”

索罗门·戈尔德斯丁是个爱发脾气老头，在我们开始谈话时，他总是离题千里。似乎他对我的提问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好奇、陌生和混乱。“你为什么不去研究那些屠杀者呢？为什么只研究犹太人？这真快把我逼疯了。人们还讲述大屠杀，他们知道什么？！去研究那些屠杀者，为什么研究我呢？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怎么？我很有意思吗？去问问那些屠杀者的后代，他们对自己父母的行为有什么感觉。”索罗门怒气冲冲地面对这个世界，包括对许多幸存者。他愤怒，因为有些幸存者把自己描绘得比事实更英雄或更有先见之明。作为家庭中惟一的幸存者，索罗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不喜欢人们研究大屠杀，他们不会得到真实情况，有许多幸存者甚至还在编故事。我在加纳塔（奥斯威辛集中营分类拣选处）干了4周，我不知道他们焚烧了人。他们告诉我那是事实，我不太相信。有一个女士四处游说，她曾在特里布林卡集中营呆过。她若真在那里呆过，又怎能活着告诉人们这些呢？啊！她想当个大英雄是不是？说实话，那是应该诅咒的行为，真是糟糕透顶。”

我已经从几位游击队员那里领教了与索罗门类似的愤怒，他们厌恶那些空有游击队员称号却没有实际参加过战斗的人。在幸存者中，大部分人都非常痛恨那些消极被动的犹太人。正如大屠杀的经历有不同的层次一样，抵抗也有不同的层次。他们的愤怒可能反映了一种经历，一种无意识的情感，他们对父母没有采取更多的办法，没有带领兄弟姐妹们逃避死亡而感到

遗憾。为什么他们不努力抗争，保住自己，保住兄弟姐妹们的命呢？同时，从整体意义上讲，如果更多的犹太人起来反抗，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幸存者的父母及同胞可以活下来。游击队员更希望自己与消极被动的人区别开来。

随着光阴的流逝，幸存者也渐渐地变得开朗、直率起来。然而，当我问那些受访者，他们是否有意识地回避谈论某段特殊经历时，大部分人都强调说他们绝对没有故意省略任何情节。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既然忍受过来了，就没有什么恐怖不能谈的了。“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不删减任何事情）是因为我很幸运，我从未遭到纳粹分子的毒打，也没人严刑拷打过我。我目睹恐怖事件的发生，但都没发生在我身上。”有些人非常希望有人愿意听他们对大屠杀的回忆，特别是当听众对某些恐怖情节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就会尽量详细地讲述。

在给孩子讲述大量过去的经历时，几个幸存者（主要是游击队员）略去了一些血腥的细节或他们自己在敌人手中遭受折磨的内容。这些抵抗战士之所以回避他们在这些可怕的场景中遭受的折磨，可能是想减少子女们的恐惧感。他们担心，他们在当时极为特殊环境下所遭受的耻辱，会损害他们在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们希望孩子不要混淆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正义行为与不可饶恕行为的区别。

索罗门·戈尔德斯丁永远为自己幸存而内疚，这使他无法用豁达的观点看待自己的行为。他从未向别人吐露过他曾杀过一个德国人，他不愿意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或者其他的反应。“我不是英雄，我是懦夫。当我向犹太人隔离区走私东西的时候，我害怕得尿了裤子。我不想因为我杀了德国人而把自己当成英雄，我只是为了生存。我是个胆小鬼，没能救得了自己的父母。我父亲叫我把枪扔掉，我服从了，你不知道当时多么可

怕，我是个懦夫。”索罗门相信，他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救出自己的父母。

幸存者不大愿意透露的事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犹太人出卖自己人的事情。为了避免或害怕德国人的报复，有时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警察也逮捕一些企图组织反抗的人，更有一些人则完全出卖自己的同胞；另一类是个人遭强暴的惨痛经历。

我问一位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的幸存者：“你是不是在有意回避你的大屠杀经历？你愿意给我讲讲发生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事情吗？”“不，（他失声哭了起来）……这都是犹太人之间的事情，我不想再为他们留下任何污点……我热爱犹太人民，我不想让下一代对犹太人产生厌烦的感情。有一些犹太人危害了其他人的生命，有些人十分软弱，他们认为通过告发别人，就可以救自己或者得到一些食物……但我不能议论别人……他们给盖世太保指出犹太人隔离区里掩体的位置。里面有一二百人，掩体制作得很好，如果没有人告密，他们是不会发现的。”

围绕犹太人在关键时刻所充当的各种角色的辩论已经展开，犹太委员会的成员、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头、还有那些在犹太隔离区的警察部队服过役的人，已经引起了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和研究。幸存者对这些人当时的言行有两种意见：一些人强烈地谴责那些人充当了叛徒的角色，认为他们比德国鬼子还坏。有几份报告说，解放后，有些犹太囚犯头被犹太人杀死了。另一些人则在更多地权衡，不愿评论个人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所表现出的行为。

一些幸存者因为曾被强暴而感到无地自容，因此拒绝谈及此事。我采访的一个男性幸存者承认，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少年时代里被迫接受了同性恋行为。我采访的几个女性也讲述

了第一次惨遭强奸和性骚扰的经历。

埃丝特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也有险遭强奸的经历。她从不愿提起那段往事。“在集中营规定的洗浴时间，纳粹党卫军站在我们周围，指点着一个姑娘的乳房，并取笑说这个姑娘比其他入更漂亮。”这些发生在青春成长期的性侵害在幸存者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埃丝特说：“我可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性生活。我的丈夫总是告诉我，他希望我能主动一些，可是我从来没有过。”

世上的人们是关心幸存者的全部大屠杀经历，还是有选择地关心呢？一些幸存者一直不愿诉说，关键在于他们觉得没有任何意义。语言文字无法清晰地表达他们经历折磨的程度，他们深信，人们永远无法想象和理解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为了给我们剃头，他们让我们先冲洗。当我从奥斯威辛淋浴室中走出来时，有一些纳粹军官正看着我们。一个狱友拍着我的肩告诉我，有一个德国人正在远处招手让我过去，后来我才知道那家伙是门格尔。我不知所措，即使在我父亲面前，我也从来没这样过。然而在这里，德国军官和我谈话时，我居然一丝不挂！

我走过去，他把手中的鞭子放在我的下巴上，让我抬头。我听到门格尔问：“你为什么在这里？”“因为我是犹太人。”他又问：“你父母呢？”“他们也是犹太人。”“你的祖父母呢？”我说道：“也是犹太人。”后来，我看见与我一起的女孩们正在排队剃头，就赶紧跑过去，因为我不愿被留在后面。我从未谈起过这段经历，因为无法表达出那种耻辱的感觉，我永远无法解释我的感觉。如果那时在集中营里我透过铁丝网看见我父亲，我该怎么办。

尽管幸存者受到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努力恢复。他们有能力在回忆过去和现实生活中保持一种微弱的平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少数幸存者采取回避战略，避免与其他幸存者和别的痛苦经历相接触。当我问幸存者：“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后，你仍有能力过一种相对正常的生活，你对此有何感想？”大多数人说，为了自己和孩子，在这样的事情中别无选择。他们经常使用一些思维技巧。艾达·科克强调说：“你永远也不可能过正常生活，但你可以自我麻痹，你可以想象。我总想我是很快乐的，我也要丈夫和孩子快乐。日常生活中该怎样就怎样，不要去回忆，只有伪装。但是，当独自一人或晚上时可以想。我必须过一种普通的生活以保护孩子……我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外在的，是为了我的孩子们；另一种是自己的，那是很压抑的。当我一个人时，我会停止伪装，如果我和别人谈话，他们会说，我是个快乐的人。但只有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我有双重人格，每个幸存者都是这样。”当艾达回到家乡时，她的女儿32岁，儿子34岁，她仍然不愿孩子们看到她悲伤的一面。艾达流着泪说：“为了他们，我不得不表现得高兴一点。”

如果你的行为正常，你就可以相信你是正常的；如果你相信你很正常，也许你就会在某方面产生正常的感觉。“有一个掩饰的技巧，你做你必须做的事情。你开创美好的未来，你来到这里，这是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人们不愿去听你抱怨。就像你习惯了集中营的生活，你会习惯这里的生活，这里比集中营更容易适应。与过去遭遇的事情相比，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表现得相对正常一些呢？”

我采访的少数幸存者都把他们的幸存归结为具有刚毅坚韧

的品质。“因为我比其他人坚强，我是坚强的犹太人，永远不会被压垮。”很多幸存者寻找有关家庭培养的理由，认为那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基础。“怎样才能看到了许多坏事后，还能做一个善良、文雅、有道德的人？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在一个好的环境中长大，他自然就是好人。”

当幸存者步入晚年生活时，他们更多的是回忆过去。由于临近死亡，他们在感情上更加脆弱。幸存者之所以回忆自己过去危险的生活和曾经犯过的错误，是因为重建生活的动力没有了，他们失去了奋力向前和忘却记忆之间的平衡，大屠杀事件又重新占据了他们的心灵。

第八章 危机家庭

一些家庭被毁灭了，一些家庭又再生了。

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幸存者比他们的压迫者具有更坚强的生存意志，他们的亲人虽已逝去，但是他们又繁衍了更多的后代。萨拉·施奈德的丈夫名叫莫里斯，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失去了前妻和孩子。1946年1月，莫里斯在同萨拉刚认识4天以后，就向萨拉求婚。2月，萨拉怀孕了。天真无邪的新生儿的降临，冲淡了幸存者的内疚、气愤和悲伤。一个孩子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受过恐怖的威胁。新生儿女的到来，可以使父母重新体验他们失去的欢乐。

在解放后的两年时间里，多拉自己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又组织了新的家庭。“当孩子出世时，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兴奋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孩子，我定了半天神才确认那真是我的孩子。”的确，多拉不再孤独。在二战后的若干年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都出现了生育高峰。^①

^① “美国陆军参谋官菲利普·伯恩斯坦负责战后欧洲犹太人事务，他公布了世界犹太人难民营中的人口生育高峰问题。他在1948年1月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仅在齐尔希姆难民营，每天都有一个新生儿降临。”见威廉·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2年，第129页。

幸存者们经常是很急切地与另一个幸存者结合。萨拉·宾德告诉我：“在卑尔根-贝尔森，每天都有人结婚。人们需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如果你孤身一人，就会感到孤独，所以我们要结婚。”几乎80%的幸存者都选择了幸存者做伴侣，当时的环境对这种高比率的结合起到了促进作用。^①在移民或其他群体中，幸存者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结盟关系。战后，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希望生活更丰富一些，国内管理联盟和犹太人组织安排了很多舞会，使许多没有成家的人借此迅速找到了伴侣。大屠杀的恐怖岁月过去了，人们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生活。

对于一些人来说，选择配偶更多是从实际考虑出发的。女人在思忖着：他有房，有工作，很坚强，我可以依靠他。通常情况下，某个家庭中的惟一的幸存者，特别是女性，一般具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波兰出生的卡拉·卡拉诺克是她家中的惟一幸存者。她说：“我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来到难民营，没有家，没有人说话，我感到非常孤独，就像河里的一块卵石……孤零零的，我总是哭。我结了婚，怀了孕，但我并不想与他过一辈子，我结婚只是因为我太孤独了。解放后，是他把我救出来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合……过去常想独自一人到美国开创新生活，但那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另外，那些有一定的亲戚或同乡关系的幸存者之间也常常比较容易结合，他们渴望与熟悉的人在一起，从中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战前的社会等级界限和宗教与世俗的区别荡然无存，身体的联系变得更为重要。人们不再考虑相互的“婚姻物质基础”，身分、家庭与道德的偏差、背景、价值观等等，所

^① 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第121页。又见卡哈纳、哈雷尔和卡哈纳：《心理健康的预言家》，第177页。

有这些都无法阻止他们的结合。他们互相依靠，一起挣脱大屠杀的阴影。战后，幸存者与过去的所有联系都不复存在，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与一些过去的熟人共同回忆，谈论往事，使个人的生活和记忆得以保留，不至于完全淡忘。

有了亲密的伴侣，也就有了一份安全感。战后当幸存者离开欧洲时，许多人仍然孑然一身，他们后来与一些在 30 年代就移民到巴勒斯坦和北美的欧洲人结合了。但由于缺少对大屠杀经历的共同体验，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中的一些家庭里产生了心理隔阂。埃利萨·科恩与一个在 1937 年到美国的德国难民结婚了。她说：“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经历。”我问：“为什么不说话呢？”她回答：“他从来不问我。”

幸存者成为另一个幸存者的配偶，就好像又增加了新的功能一样。他们不仅了解自己的伴侣失去了什么，还可以包容他们在那噩梦般的年代里的创伤和被剥夺的痛苦。幸存者相信，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可能理解从大屠杀过来的人的感受。

幸存者缺乏处理正常人际关系的经验。因此，现实不允许他们作出更理想化的选择。当德国人入侵索尔·西图维兹的家乡时，他年仅 10 岁，生活困苦不堪。解放后三年，索尔和一个 1939 年从奥地利逃到美国的女人结婚了。“那时，因为缺乏人生阅历影响了我选择配偶。我基本上是从孩童时代直接跨越到成年人，中间并没经历青春期。我结婚时，只有 20 岁。我们之间很融洽，我虽然孤独，但谈不上后悔。那时，我还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索尔和其他幸存者一样，由于在青春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因此对两性关系缺乏自信。索尔承认：“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得很好，爱情需要智慧，但我却很无知。”

一些移民到美国的幸存者更倾向于和美国出生的犹太人结

婚。嫁给一个没有大屠杀背景的人，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逃避过去的需要，幸存者希望彻底开始新的生活。幸存者在新国家的生活，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过去的阴影。嫁给一个美国人，可以帮助她从陌生的环境及痛苦的记忆中摆脱出来。如果他们的婚姻美满，就会使幸存者很快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然而在很多时候，幸存者注定要过一种不被理解的生活。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很难得到别人的同情与安慰。1948年，米纳·福格尔独自来到美国，她不想增加美国亲戚的负担，因此，年仅17岁就和一个比她大15岁的美国人结婚了。“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他不能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会有一些事情上烦躁不安，他还总是怀疑我被纳粹强暴过。”

理解孤独的内在涵义，譬如失去父母、断绝与所熟悉事物的联系、迷失生活方向、经历致命恐惧的延续等等，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女幸存者嫁给足以当她长辈的人的原因。她们没有条件考虑所谓的浪漫，在婚姻问题上，安全感和可靠感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大屠杀幸存者与美国出生的犹太人婚姻的离婚率比幸存者之间婚姻的离婚率要高，而且这些幸存者更倾向于不再结婚。^①有接近11%的幸存者之间的婚姻是失败的，相比之下，有18%的与美国犹太人结婚的幸存者的婚姻也是失败的。^②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幸存者之间的婚姻更令人满意。社会学家威廉·赫尔姆赖克把这种对婚姻的勉强维持，归结为传统价值观对欧洲长大的幸存者的影响。一旦结婚，婚姻就不再以浪漫为基础，对于生活来讲，婚姻是一种合作契约。或许一些幸存

^① 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第121页。又见卡哈纳、哈雷尔和卡哈纳：《心理健康的预言家》，第177页。

^② 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第126页。

者对重新开始感到害怕和软弱，才不得不维持原有的家庭。

对婚姻不满意，但又选择了忍耐下去的幸存者，都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因为有过突然、非自然地丧失亲人的创伤，所以幸存者对孩子的幸福予以了极大的倾注，以至于使孩子形成了对他们的过分依赖。有的孩子也产生了负疚感，有的犹豫不决，有的形成逆反和背叛性格。对于许多幸存者，正像他们选择配偶不是出于感情或爱情，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一样，他们（特别是一些女性）更多地照顾孩子，也是为了弥补失去的青春岁月——通过管理子女的事情，给自己创造满足青春期体验的机会。

幸存者之间的离婚率仅是那些与美国人结婚的幸存者的一半。^①究其深层原因，关键在于能否共同体味对方的生活体验，一味地限制和嫌弃对方是不会有幸福生活的。战后，很多幸存者是带着心灵上的累累伤痕结婚的，这些伤痕对他们婚姻基础产生了破坏作用，有时会喷发出很多怨恨的怒火。

“我希望他不要总是谈那些事情，否则会让大家都感到烦躁不安。”

“他受的伤害太多，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

“她总是那么没有耐心。”

“他的脾气太坏了。”

“她一遇到问题就想离婚。”

……

但是，幸存者与幸存者组成的家庭似乎更知足，在婚姻中有一种让人非常钦佩的、牢固的，充满仁爱的力量。尽管人们也要忍耐很多，但是，那是一种爱，是两人互相保护和更长久

^① 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第126页。

的契约。即使夫妇间想要表达不满或烦恼情绪时，也始终保持着对对方的尊重，二战造成的巨大创伤使他们相互同情。“在经历了那样的事情后，你还能让他怎样呢？”

尽管有很多目击者对二战进行了描述，但幸存者却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索尔·哈尔彭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遭遇，有时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索尔·哈尔彭的想法反映了很多幸存者的态度，当我自己都不理解时，其他人怎能理解或接受我的经历呢？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幸存者已经讲述了一些相关的事件或事实。一些幸存者为了让后代出版他们的回忆录，给各种团体做报告，教育他们的子子孙孙，并提出把他们的口述录音的想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采访的幸存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完全与自己的配偶谈论了大屠杀的细节，多数人都承认：“我从没有谈过细节。”

埃塞尔·雅诺夫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她说：“我和西蒙是在1950年结婚的。我出身于一个宗教家庭，我本应该嫁给一个有良好家庭背景的人，可能永远不会认识西蒙。他生长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家庭里。二战后，我一直在寻找像我父亲那样爱好和平的人。

“我不记得曾经和他坐在一起谈论过那些事……有一段时间他很紧张，他甚至没有和他的父母说声再见就离开了家……他不想说这些事……他从来不同我谈论这个话题，我也不说，除非有人来问我。无论如何，细节并不重要。当时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你若不选择关在集中营里，就要选择到处躲藏。西蒙藏了起来，还帮助其他人躲藏起来。他从不把自己的经历说的很可怕。我觉得他在大屠杀中的经历就像一场游戏，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或是一种冒险。在二战中他帮助过别人，这使他感

到十分欣慰。但对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却从不谈论。”

即使在夫妻之间，也遵守着“痛苦层次”的原则，即如果某人受伤害的程度不是很严重的话，他就会顺从他的那位深度受害的伴侣。为了不再加重伴侣的创伤，幸存者往往会根据他的伴侣受害的程度而装出很轻松的样子。

在比利时出生的安娜·玛莉安已经70岁了，她分别在奥斯威辛、萨克森豪森和特里西恩斯塔特三个集中营中忍受了极大的折磨。她的丈夫伪装成了一个非犹太人躲避追捕，后来参加了比利时的抵抗组织。安娜说：“他没有经历过集中营，如果我嫁给了一个经历过集中营的人，他会对我有更多的感情和同情，我猜想一定会与现在不同，有很大的不同。”安娜几乎没有对丈夫讲过她的苦难经历，她对我倾诉说：“其实我希望他多问我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幸存者都希望被人理解，被人同情。我所采访的幸存者中，有几个人为他们的伴侣对这些事没有兴趣感到遗憾。塞尔玛·布鲁克悲伤地说：“他对此不感兴趣，他自己也非常痛苦，他觉得他的遭遇比其他人更加恐怖。”甚至有一些幸存者的家人，不顾他们所受创伤的程度，拒绝他们在家庭中谈论过去的事情。这使他们的配偶都产生了一种不能畅所欲言的苦闷感。我问利奥·费尔德为什么坚持拒绝同他的妻子谈这些事情，他回答说：“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意思很明显，事情已经过去了。这真是太不可理解了，一个人该怎样看待战争经历所带来的影响呢？

在许多双方都是幸存者的家庭中，比其他的家庭更少谈论大屠杀。戴维·希曼尔斯坦和费拉·希曼尔斯坦的婚姻被纳粹破坏了。戴维解释说：“我与我妻子的妹妹结婚了，我无法同她女人一起生活……她理解我失去妻子的感情……如果这不是

她的姐姐，恐怕她不会接受。她总是说：‘如果将来我们死了，你去找你的妻子，我去找我的丈夫。’当我谈起大屠杀时，费拉显得不太高兴，她总是说：‘你怎么又说这事？’可能是因为她没进过集中营的缘故。”可能费拉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受过苦而感到歉疚，也可能那些惨痛的记忆令人恐惧，或许她已经厌倦理解丈夫的痛苦，或许在她心中已经装满了对自己所遭受损失的愤怒，没有地方容纳别人的感受。

索尔·西图维兹娶了一个远房的表妹，她在1939年春天从柏林逃到美国。然而索尔认为：“我妻子从来都不理解我。”他承认自己故意不提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她没要求我说，我也没说。如果我说了，人们就不得不接受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不想要任何人的怜悯。”

抑制思想和感情有时会对生理机能产生影响……如果主动抑制过程持续的时间过长，就会形成压抑的长期积累，患与压抑有关疾病的机会就会增加……人在经历了伤害事件后，不能与其他人讨论，就会出现特别严重的抑制从而导致生理疾病。^①

实际上，分担相似的痛苦或简单向配偶发泄一下对过去灾难的愤怒，可能会使婚姻关系更加牢固。当经历了痛苦回忆后，被压抑的东西几乎都得到释放，可以加快创伤的愈合。相反，压抑痛苦会产生距离感，使一个人无法被别人熟悉和理解。并且，配偶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心力交瘁的伴侣有可能关

^① 詹姆斯·彭尼贝克、S. 巴杰和约翰·蒂鲍特：《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及健康的披露》，《心理疾病学》，1989年第51期，第577-589页。

闭心灵之窗，永远不再敞开。

当我们审视幸存者对第二代的关系时，这种自闭、隔阂和空虚的混合感，常常通过外在的方式表现出来。威廉·赫尔姆赖克表示：“一般幸存者做出要孩子的决定，都要经历一系列矛盾和犹豫。一方面，他们害怕要孩子，因为他们担心下一代面临与他们自己同样的命运，很多人承认，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给孩子取了一个非犹太人的名字。^①的确，许多幸存者对在这个社会里建立一个新家庭缺乏信心，因为这个世界表现出对犹太人的憎恶，而且他们的仇视在继续增长。因此，他们给孩子准备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一个幸存者的孩子告诉我：“我叫约瑟夫，我的名字是非常国际化的，如果我不得不逃亡，它很容易翻译。父母反复告诫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医生，这样如果我逃亡到某个地方，就可以利用这些技能。我已经准备好了，等着随时都会出现的屠杀公告……我听人说过大屠杀，我已经为它的再次出现做好了准备。”

幸存者殚精竭虑重建生活，并且为了安慰和补偿而生养孩子。^②这意味着那些逃脱厄运的犹太人的不稳定状态。在他们心中，还存在着永远的潜在伤害，他们希望有人弥补这一空虚。幸存者想要保证这些易受伤害的孩子们的安全，对孩子和孩子所处的环境极其上心，反映了他们潜在的情感需要。

因为没有救助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而产生的负疚感，使幸存者在他的新生活中采取了更积极的姿态，以减轻过去生活所留下的挫败感和负疚感。另外，那些在大屠杀期间采取屈

^① 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第 127 页。

^② 有关幸存者 - 儿童动态学更为全面的讨论，见哈斯：《大屠杀的阴影》。

服、躲让态度的人也在自我谴责，他们追悔莫及，“如果有可能会，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不受伤害……”可能下意识的想法是：“我父母没有保护我，所以，我必须确信能够保护我的孩子。”

或许因为幸存者在过去已经有过多次濒于死亡的经历，许多幸存者至今仍然感到神经非常脆弱，这种“死亡焦虑”不断警告他们危险的来临。^①在每天相对安全的活动中，他们都认为可能会出现致命的危险。幸存者的孩子也出现了这种过分的、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这说明，父母对伤害的忧虑已经传染给了孩子。

一位31岁名叫德博拉·沃尔福的律师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她透露了双亲潜在的恐惧对后代的影响。

我受到了过分的保护。我妈妈总是说：“因为我们失去的太多，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特别珍贵。”我父亲都不信教，但是在我7岁的时候，他们决定将我送到犹太人学校。当时在是不是要解除孩子的犹太人身份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他们既不想让我做一个受人欺侮的人，也不愿意让我经历他们所受的伤害。

他们总是希望知道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家，我和谁在一起等等。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不得不总向他们汇报我的行踪。甚至当我上了大学后，我在假期回去看他们的时候，如果我在朋友家呆到晚上10点半，电话铃就会响起。我的朋友都知道打电话的肯定是我妈妈。父母从不鼓励我运动和在户外活动，他们很怕我受到伤害，各种活动

^① 哈维·巴罗卡斯和卡罗尔·巴罗卡斯：《集中营的影响》，第821页。

都令他们“担心”。如果我开车时汽油比较少，他们就担心我会半路上抛锚。这一切使我缺乏探索环境和外部世界的勇气。

在我的成长中有很多实例，我看到他们比那些非幸存者父母更担心、有更多的禁忌、更谨慎。他们想保护我避开所有的伤害、危险和坏影响。结果许多同龄孩子可以做的事情，我都不能做，也不能去别的地方。他们不允许我独立地做一些别出心裁的事情，除非是其他的孩子已经早就做过的事情。比如戴乳罩、化妆、穿高跟鞋、约会、与其他女孩子在外过夜、野营、住在校外等等。他们总是特别紧张和担心。

我的父母对我看得很紧，他们必须随时知道我在哪儿？我记得，当我参加犹太人野营时，我一到目的地就必须给他们打电话。我曾想：“别的孩子不用打电话，为什么只有我这样？”

他们似乎总是担心生活中会出什么差错，他们一直付出很多，他们在我身上花了无数的钱。而对自己却不这样，好像花在他们身上不值得。

我的父母对我保护过分、爱得过分，他们不想让我受到一点点伤害。与其他非幸存者的父母相比，我的父母是我永恒的家，他们对我真是奉献得太多了。即使我们不住在一个城市里，他们依然要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在有关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学著作中，最常见的观察材料就是描述许多幸存者对孩子过分保护的特征。幸存者为了安全的缘故告诫、保护、忠告他们的子女，以此保护自己的亲人。事实上，在不久前的一个关于第二代人的研究中，当我问参与

者：“你是否认为你父母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影响了他们抚养你的方式？”最普遍而又发自内心的回答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经历和非幸存者家庭的孩子有明显区别。在早年遭受了许多痛苦折磨，并在自己后来的人生旅途中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艰难险阻后，幸存者常常担心灾难会降临在自己孩子身上。第二代人在充满脆弱感的家庭气氛中长大成人。

这些幸存者可能已经对孩子说过，他们不能忍受另一次分离。其实，他父母与孩子之间出现的一般意义上的分离，对孩子发展自己的个性很有好处。但是，幸存者与孩子的分离，总会引发与过去分离相联系的情感及失去家庭成员的悲痛。这些幸存者并非想阻碍孩子的个性化发展，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适应自然分离的机会，因为他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没有经历过与自己父母自然分离的过程。此外，孩子的存在也肯定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减轻了这些幸存者的内疚感，同时也使幸存者对孩子产生了更多的依赖感。

为了减少他们的焦虑，幸存者过分地保护孩子，企图把自己的家庭成员维系在一起，他们的孩子是在一种直接的血缘关系的禁闭环境中长大的。同样，当这些幸存者的孩子承担了这种补偿大屠杀损失的责任后，他们会对这种家庭的连续性表现出欣赏的态度。少数幸存者的孩子可能会感到他们自己和英雄的父母相比要差得远，但是大部分孩子已经认同并接受了幸存者的特征。

有时，幸存者和他们的孩子还会经常变换角色。在第二代中的许多人承担了照看父母的责任。^① 在一项对幸存者的孩子和美国父母养大的孩子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宣称：“在我们

^① 卡洛德纳：《集中营幸存者的孩子们的社会化》。

调查的过程中，调查对象的不同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问到：‘你是否发现你自己像家长一样对待你的父母？’美国家庭中的孩子回答说：‘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吗？’这种情况在幸存者的子女中从没有发生过，他们能马上理解我们的意思。”^①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角色的变换反映了所有移民家庭的共同特点。孩子们之所以能“保护”他们的父母，是因为他们能更快地学习新语言和习俗。父母让他们帮助写信，回复电话，当陌生人来访时迎来送往。不管怎样，许多第二代人对父母的保护都与大屠杀的影响密切相关。

幸存者的孩子们知道如何防止他们脆弱的父母伤感，当他们估计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们父母的影响后，他们就用更多现代的东西，冲破幸存者的陈规陋习。可能他们也听到过幸存者对他们说：“你们在接纳粹的班！”但是，他们的行为确实减轻了父母的焦虑。

我母亲非常紧张、焦虑、过分地担心。她有很多特定的习惯，例如，她总在餐馆周围徘徊，这是以前饥饿心理的延续。她很想与我们亲近，但又总是隐而不露，犹豫不决。我认为，因为她总是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无法产生真正的幸福感，甚至我们也无法让她忘记过去。她对特殊的压力或失败反应过度，我知道这并非因为现在的事情，而是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此，我们从不告诉她任何坏消息，不能与她有现实的关系。当我们告诉她一些

^① 勒诺尔·波德兹等著：《大屠杀幸存者家庭的约定》，《婚姻与家庭健康》杂志，1984年第10期，第49页。

坏消息时，必须把它减弱到很小的程度。她能够很好地处理与死亡有关的问题，表现得很坚强，这一定是她过去经历太多的缘故。^①

看到父母心事重重和大屠杀期间留下的永久创伤，幸存者的孩子们通常设法避免触动他们的痛苦。即使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也会尽量不给父母添麻烦。而一些幸存者由于太专注于自己的伤痛，没有听见或看到孩子发出的忧虑信号。大多数幸存者夸大了孩子的快乐和自由，他们以此为满足，甚至有的幸存者把这些看作是对他们所失去一切的补偿。他们的孩子明了这一切，尽管有时也会有怨言，但仍然尽量顺从父母。

因为我母亲忍受着很多的痛苦，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不快。我母亲是她家里最小的孩子，我们感到为了补偿她的损失必须让她快乐。她对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包办代替，我们有很多事情也是为她做的，这是我们应该分担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我们的，但我认为过去的事情肯定会有影响……我的母亲总是对压力或损失反应敏感，我知道这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因为她的过去。^②

幸存者往往很难理解孩子的痛苦，因为他们的大脑充满了有关过去的恐怖记忆；或者因为他们太痛苦了，他们不愿孩子

① 哈斯：《大屠杀的阴影》，第92页。

② 同上。

再有什么不如意。因此，他们常常认为孩子没有什么体验能与自己的体验相提并论。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幸存者都爱把孩子的幸运与自己的损失相比较，而他们比较最多的，就是现在的充足和过去的匮乏。

可以理解，这些暗示形成了幸存者对子女权利感的障碍。权利并不是指更舒适的物质生活，而是表达愤怒，与父母期望的不同想法，从父母的保护下分离出去的权利。幸存者的话语，譬如“在我遭遇了这么多痛苦后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或者“这些与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相比又算什么？”明显地散发着对孩子的责备。

许多幸存者都没有意识到或理解横在他们与孩子之间的障碍，当人们向他们指出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承认自己的保护过了头。例如，他们会故作轻松地说：“与我经历的相比，你的这点儿事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大部分幸存者都把他们的动机描绘成无私、高尚的。“我的孩子就是我的一切。”“我努力工作，给我的孩子们创造出我没有享受过的一切。”他们训诫孩子不要哭，“因为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们要求孩子们变得坚强些，因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特别是对于犹太人），并且人们甚至你的朋友，也会变得自私残忍。

个人经历的惨痛生活刺激着幸存者选择生儿育女，毫不怀疑地爱上一个人，但是，这些也会给他们带来潜在的危险。在1947年，24岁的幸存者吉塔·米尔斯坦在德国西南部的难民营中怀孕了。吉塔和她的丈夫马克斯在等待她的表兄帮她办理签证，她的表兄住在美国费城。“我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签证才能办好。因为没有及时得到签证，很多人都很失望。我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我很害怕，我没有了父母，没有人能给我一些有益的忠告……我不想在德国生孩子，所以我只能流产。”

直到 1952 年，吉塔才在费城的犹太人居住区安全地生下了一个女儿。

一些幸存者，特别是那些在战火中失去子女幸存者，选择了不再要孩子。他们不愿回忆过去的痛苦。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很难保证不再产生无辜的受害者。多拉·莱文森有一个在战前出生的孩子，他们都是幸存者，她很害怕自己的好运耗尽。“战后我再也不想更多的孩子，不可预料的大屠杀把我吓坏了。在德国的时候，我几次堕胎（战后）……你看，在战争中为了救出一个孩子我们受了多少苦，这样的礼物……我不能要的太多。”

戴维·希曼尔斯坦建立了新的家庭，但他总是怀疑自己的忠诚。“我从没说过这些……我总是想与原来的孩子们在一起是多么快乐……我担心和现在的孩子在一起时不能有相同的快乐……像失去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泪水顺着脸颊滴下）……像失去了什么。当有所不同时，我就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对我而言，死去的孩子是不能被替代的。由于他们先来到世上，所以他们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我无力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我有什么权力让别人取代他们的地位呢？过去不公平的屠杀与不公平的现实混合在一起，为什么我现在的孩子有权利活着而以前的孩子就没有权利活在世上？无论用什么方法，我能最终保护他们吗？”

尽管他们的父母无所适从、过分保护或冷嘲热讽，大多数第二代都已经成长起来，带着父母与众不同的谆谆教导和不可思议的痕迹，大多数人已经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他们的父母让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树立了犹太人总是

充当替罪羊的形象，大部分幸存者的孩子还是比犹太裔的美国人显示了更多对犹太人身份的认同。他们几乎不与其他信仰的人结婚，他们更喜欢造访以色列。^①也许第二代周围的犹太语言促成了他们对犹太人身份的认定。

幸存者的孩子们满怀自豪和忧虑的复杂感情，接受了犹太人身份。一些人在认同自己的身份时，已经把犹太人面对残酷迫害的忍耐力变成一种优越感注入他们心中。由于相信非犹太人永远也不会接纳他们，这进一步促使第二代人延续自己民族的传统。最后，因为他们独特的背景，他们是大屠杀了幸存者的孩子，因而产生了对那些被屠杀了的人的深刻的责任感——他们必须保证犹太民族的延续。

幸存者的大屠杀中吸取的重要教训是明确的，并潜移默化地传给了自己的孩子。“你不能相信别人”可能是大部分人经常听到的训诫。贝弗利·迪斯金是一个31岁的小学教师，她讲述了自己父母对她的教导。

知道了他们经历中的可怕细节，使我形成了悲观的天性和愤世嫉俗的人生观。我想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不是普通家庭出身的、更有能力的男朋友。我的父母告诉我，不要相信他人。很多人讲究穿着，仪表堂堂，但那都是掩饰。

我对生活感到十分悲哀，大屠杀使我更看清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因为我们只是机器和动物，只有极少数是人。我妈妈会说：“在外面有很多的希特勒，所以你必须坚强。”

我有一种矛盾心理，害怕认识人类丑恶的本性。有的

^① 哈斯：《大屠杀的阴影》。

大屠杀的凶手不再从事杀戮与毁灭，而有的却毫无疑问地仍在杀戮。以前的作恶者毫无悔改之意继续屠杀，这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确实发生了，这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多的困扰。我不能盲目地相信他人，更不能太理想主义了……

在很大程度上，我已经认识到不能依赖他人。当问题发生时，只有很少的人会帮你，所以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生活可能会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所以如果你在心中保持自信，你就会过得好一些。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很像我父亲。

尽管不了解父母经历的细节，但从很小开始，第二代就知道一些很恐怖的事情曾经摧毁过他们的家庭，那场灾难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祖父或祖母去世了。一些父母发出类似“我已经受够了”的呐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黯淡的感觉。许多幸存者的孩子说他能感受到像“你无法理解我的经历”这样的情绪。

大多数幸存者一直到战后 30 年的时候，才比较多地谈论他们的经历，而在过去 30 年里，他们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奋力向前，远离惨痛的记忆。对幸存者来说，他们经历的每一种感觉，无论是负疚感，还是耻辱感和无助感，都会对回忆过程产生抑制作用。如果幸存者硬要回忆过去的经历，当初经历危险生活时的那种紧张感也会一并发掘出来，这是他们所不情愿的。除此之外，在公众意识中，大屠杀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人们对此缺乏了解，没有畅销的书籍和电影。为了避免引起争议，没有建立广为人知的纪念馆，没有好奇的听众鼓励幸存者把过去的事情说出来。

在过去 20 年间，只有极少数幸存者选择在公众集会上说出自己的大屠杀经历，但这种现象并不能代表幸存者家庭内部讨论的模式。大多数幸存者对孩子的回忆都是不连续的。很少有幸存者坐下来，耐心细致地给孩子讲述他及他的家庭所发生的一切。相反，只有碰巧遇上有关话题才会涉及到。因此，父母们很少把自己的真实经历都讲给孩子们听。

幸存者不对孩子说出自己的经历，反映了他们不愿意让孩子承受太多负担和痛苦的愿望，因为幸存者都希望重建一个正常的家庭。艾达·科克强调：“我从不不在孩子面前哭泣，我不愿把孩子卷进来。他们过去常常问我一些问题，我总是岔开话题，我不愿回忆，也不愿伤害他们，我不希望他们知道。我哭过，但从不在孩子面前。如果你问他们，他们就会告诉你，母亲总是很快乐，笑口常开，但那并不是真实的我。”

索尔·哈尔彭不想吓坏孩子，他只是希望他们会有所准备。“我的孩子很小时，问过我胳膊上的号码是干什么用的，我说那是电话号码。当我们长大一点，在学校听到了这方面的事情，我才开始告诉他们有关情况，但我不会说出毒气室的事情，怕吓着他们。我认为，如果两个幸存者夫妇整天谈论这些事情的细节，一定会把孩子吓疯的。我从不讲述那些事情的细节。我希望孩子逐渐了解发生的事情，以便再出现这种情况时，他们能够提早应付。”

美国犹太人对幸存者痛苦的漠视，幸存者自身对被接受的渴望，进一步降低了幸存者将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冲动。他们在早年移民过程中所吸取的教训，有时也适用于自己的家庭。埃斯特·费希尔向我讲述了她如何不被理解的经过。她说：“他们根本不想听，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憎恨你……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人们还因此取笑你。”

幸存者的沉默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他可能会受到责难性的询问（例如，你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人们的提问可能会使幸存者在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的问题上左右为难。缄口不言至少可以使幸存者减轻因回忆而导致的负疚感，他们既不愿夸大其辞，也不知道如何精确而完整地描述那场灾难。普里莫·利瓦伊问：“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能不能做到既自我理解，同时也让别人理解呢？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解’总是单方面的。”^①

为了解情况，孩子们经常询问父母有关大屠杀的经历，有时他们也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一个孩子找到一件父母以前的纪念品，无意中听到父母之间的对话或者与父母共同经历过大屠杀的朋友的谈话。由于缺乏直接面对这个问题的勇气，孩子的父母可能会给孩子一本书鼓励他们去读，并说：“这就是我的人生。”很明显，一些幸存者希望他们的孩子至少有选择性地了解一些有关大屠杀的噩梦。41岁的史蒂文·弗兰克尔是一名演员兼导演，也是幸存者的后代，他告诉我们当时他是如何偷听的。

我记不起第一次听到大屠杀的时间了，我很早就知道这些，也知道我父母经历的故事，还知道家中成员去世的细节。战后我父母住在德国的特克海姆难民营，他们在那里认识的许多朋友都移民到美国，因此我家里总有许多的幸存者。他们围坐在餐桌旁，痛苦愤怒地大声谈论战争和集中营。记得在一个周六晚上，我们同很多幸存者及其子女在一起，大家一起玩扑克。从一开始他们就讲了很多集中营的故事。我想我是在18岁以后才知道还有没进过集中营的犹太人。

^① 普里莫·利瓦伊：《淹没者与获救者》，第12页。

是什么因素促使一些幸存者公开而详细地讲述自己在大屠杀中的艰难岁月的呢？就像一些遭受龙卷风袭击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对遭受破坏的人有一种忠诚的责任，渴望为他们做见证，这种决动使他们甘愿忍受回忆的痛苦。他们可能相信自己会像天使一样，唤回战前的人类良心。即使有些幸存者从没有公开地对他们的孩子谈论自己在大屠杀中的所见、所闻，但也要求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一切。”

有人提出，如果在二战中以色列国已经存在，犹太人就不会遭受灭顶之灾了。直至1941年，犹太人才从欧洲迁回自己的家园。实际上，以色列国已经被看成是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抵御威胁的堡垒。然而，即使存在着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以色列国，大多数幸存者仍然相信犹太人有可能再次经历大屠杀。因此，他们经常告诉孩子过去的经历，是为了让他们做好准备，随时逃脱燃烧了若干世纪的反犹太主义怒火的袭击。65岁的塞尔玛·布鲁克告诉我：“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走。当二战爆发时我还是个孩子，对历史和世界一无所知。我希望孩子们知道什么时候是危险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及时地逃脱。”

由于各种原因，幸存者不愿总是同孩子们谈论过去，他们通常选择孩子成长的重要阶段，或者选择自己以及孩子的生活中出现危机的时候，才对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一位幸存者的后代解释说：“他们在许多年后才对我们谈过去的经历，父母不是故意要向我隐瞒这些事。当我无意中听到父母谈论他们经历的时候，我确信父母一定知道我在附近。但当我在屋里时，他们从不谈论大屠杀。事实上直到8年前我父亲才公开说这些事情。当时，我与妻子分居了，我父亲就告诉我，他的前妻和两

岁的儿子（我的名字和他一样）被杀的经过。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又说，她同样也失去了自己的前夫。他们告诉我这些是为了安慰我，他们想让我相信，无论出现什么困难，生活总会延续下去。”

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异族通婚问题上感到非常痛苦，因为这象征着有目的地灭绝犹太人的行为扩大了范围。他们往往采取回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令幸存者极为苦恼的是，他们的孩子也做这种事。安娜·马利尼在她的儿子宣布要同一个非犹太人结婚之后，才对儿子说出自己的经历。安娜很遗憾地承认，“我们从未谈论过去的痛苦经历，他知道我身上有一个号码，我不想让他感到伤心，可能那是一个错误……”安娜相信，如果她早一点说，她的儿子就会明白他的决定的含义了。

多年来，那些幸存者提及过去的事情，经常倾向于重复同样的故事。他们似乎已经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愿意向孩子们叙述那些故事，这使他们减轻了回忆的痛苦。另一些幸存者想进一步淡忘那些恐怖的年月，他们有选择地讲述一些战前的快乐生活（大多是虚构的）。

幸存者的描述支离破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幸存者在心理上对选择材料的掌握。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听众，包括孩子们，从来不多问，他没有必要讲太多的事情。因此，当人们要求幸存者详细叙述过去的一切，并用录像机录下访问过程时，他才会做到比较完整地回忆过去。为了丰富本书的内容，在我采访过程中，我不断地追问，一些幸存者才重新恢复了被压抑多年的记忆，回忆起越来越多的细节。这说明，听众了解的意愿是打开幸存者记忆大门的钥匙。

当年的老游击队员更愿意向孩子们讲述他们战争年月的经历，他们为自己的积极姿态感到自豪，他们经常为过去有能力

发泄一下对这场浩劫的怒火并拼命打击敌人感到高兴。因此，游击队员的子女比集中营幸存者的孩子们对父辈们在战争中的经历了解得更多，他们为父母感到骄傲。这些孩子一般比集中营幸存者的孩子对大屠杀的受害者采取更积极的态度。^①

即使偶尔提及过去的伤痛，幸存者也很少谈到具体的人，他们不愿谈论个人所受的折磨、虐待和侮辱，他们不愿意重新体验过去的痛苦和耻辱，也不想因自己的脆弱吓坏孩子们。幸存者也不愿回忆战时遭到杀害的妻子和儿女，害怕这些痛苦回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负疚感。承认这些，会促使他们现在的孩子和妻子产生不安全感。谈到原来的孩子和配偶，可能会使他们现在的家人产生一种填补空缺的感觉，这涉及到一个人对现在家庭的忠诚问题。一些幸存者的孩子经常用“神秘感”来描绘家里的气氛。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正如一个幸存者的孩子所回忆的：

我认为我对他们的经历知道的很多，但在最近，我才发现我父亲在战前曾经成过家，他们一直对我保密，我是在一次偶然机会中从表兄那里得知的。当我问父亲为什么没告诉我时，他说我母亲不想让我知道这些，出于对母亲的尊重，他才没对我讲。知道他过去有过妻儿，对我的震动很大。我母亲告诉我，近几年父亲总是说起他失去的儿子。我父母的年龄越大，他们谈的就越多。他们想在死前让人们了解一切……这使我感到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瞒着我。父亲因为没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儿抱恨终身。当

^① 索菲·卡夫-瓦纳基、艾里·纳德勒和哈达斯·格肖尼：《分担大屠杀的痛苦：前游击队员家庭和前集中营囚犯家庭中的交际行为及其后果》，《家庭历程》，1985年第24期，第273-280页。

他提到大屠杀时，他总是提到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三年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和领导品质。

一些幸存者不想对孩子说起过去，还因为他们担心有可能引起孩子的焦虑或没有兴趣（这可能也是焦虑的反应）。不同寻常的是，幸存者经常有选择性地对某个孩子多说一些大屠杀的事情，而对另一个却很少提起。我们发现，在一个家庭里，有的孩子非常积极地收集大屠杀的情况，而别的孩子则完全回避这一问题。

有些第二代的孩子宁愿向其他幸存者打听大屠杀的情况，也不直接向自己父母了解，以避免看到父母在回忆时的痛苦。抛开自己的家庭，他们可以镇静地面对这样的灾难，更容易抑制自己无能为力的恐惧。（“如果那些事情发生在我父母身上，那是否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许多幸存者的后代为了更多地理解父母，为了在感觉上与父母更接近，他们需要认同父母所遭受的痛苦。然而，要满足这种认同的需要，他们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成熟，能够把握父母的不幸经历与自己现在行为的关系，以便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恐惧和愤怒。

幸存者的后代对父母经历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位临床医生相信，父母讲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经历越多，其孩子就会变得越沮丧并为自己的好运感到负疚。^① 孩子也可能荒唐地认为，自己应对父母在战争中受的苦负责，或者为他们不能补

^① 伯纳德·特罗斯曼：《集中营幸存者的青春期的孩子们》，《加拿大精神病学协会》杂志，1968年第12期，第121-123页。

偿父母失去的一切感到内疚。^①（一个幸存者的孩子经常做白日梦，她时常想在离家不远的路上或车上找到她的外祖父并把他带回家，因为她妈妈非常想念外祖父。）为了减少负疚感，一些孩子已经对父母的经历表现出愤怒和厌倦的反应。

不同寻常的是，幸存者的孩子只是记得父母经历中英勇和成功的一面。幸存者经常强调这些行为，但幸存者的孩子们却很难把父母看成是英雄。了解父母在不断出现的生命威胁中幸存，也可能使这些孩子产生一种感觉，在未来的危险中，他们不会受到伤害。^②另一方面，幸存者把他们从死亡线上逃离的原因归结为幸运，可能会使孩子产生脆弱感。因为幸存的礼物不仅是命运的随意赠送，而且依赖于不能控制的因素。

无论幸存者对他们的孩子缄口不言，还是在短时间内一吐为快，许多第二代对他们父母的经历都有很多空白。因此，幻想父母大屠杀经历的事情不断出现。许多幸存者的孩子在他们想象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许多大屠杀以及关于他们父母经历的神话，特别是在父母对其经历保持沉默的家庭尤为严重。^③

汉纳·伯格曼是一位 27 岁的商务咨询员。他说：“因为我不太了解我父母的经历，所以我经常做与他们有关的噩梦。例如，一种经常出现的梦境是，德国人用人肉做肥皂和灯罩，我父亲走在选择线上，被检查是否可以做那种原料。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从来没有经历过挑选。”如此的创造经常影响到孩子

① 罗伯特·普林斯：《大屠杀的遗产：第二代人的心理历史学的主题》，密歇根州安阿伯，UMI 研究出版社，1985 年。

② 希勒尔·克莱因：《大屠杀的孩子们：悲伤与亲人的死亡》，《国际儿童精神病学协会及其相关专业年鉴》，纽约，威利出版社，1973 年第 2 卷，第 393-410 页。

③ 马丁·伯格曼和弥尔顿·雅各威编：《大屠杀后的数代人》，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82 年，第 311 页。

们对幸存者的理解，其后果之一就是他们对父母大屠杀背景产生抵触情绪。例如：他们想象父母是温顺和被动的，他们因此而感到惭愧和愤怒，此外，还会增强他们的脆弱感。相反，孩子们希望父母有一个更积极或者英雄般的形象，这不仅是为了增加对父母的敬意，而且可以增强自己面对逆境的自信。

也许幸存者的孩子们最关心的是，父母是如何逃离死亡的，这比幻想父母的痛苦更让人恐惧。^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常常可以决定孩子对父母的看法，同时，也可能导致孩子的想象出现偏差。

第二代人对于犹太民族以及大屠杀的历史背景知识的了解差别很大。一项调查表明，幸存者的孩子对于大屠杀的了解并不比非幸存者家庭的犹太孩子具有更多的知识，^②我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个发现。然而，许多第二代人都认为他们更了解大屠杀，因为他们看到了大屠杀给父母留下的后遗症。就像前面提到的，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对第三帝国的历史和纳粹对犹太人的残害了解很少，但他们却自认为知道的很多。

只有少数幸存者对他们年幼的孩子谈过自己在大屠杀中的经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许多人都是在较晚的时候才谈这个问题。随着大屠杀时代的远去，他们那裸露的痛感神经恢复了健康，死亡逼近的感觉煽动起他们谈论过去的渴望。在适应了新的环境之后，他们可以更安全地开始回忆。在大屠杀后的几十年，世界上的人们似乎也更乐于倾听，一些父母也带着他们的子孙重回他们战前的家乡或被监禁的集中营。

① 普林斯：《大屠杀的遗产》；沙麦·戴维森：《大屠杀幸存者家庭的跨代影响》，《国际家庭精神病学》杂志，1980年第1期，第95-112页。

② 戴维·赫勒：《集中营幸存者孩子们的文化与传统的主题》，《精神病学》，1982年第45期，第247-261页。

幸存者的孩子们很遗憾自己的父母曾那样自以为是，对孩子的痛苦一点也不表示同情；他们希望父母能为他们留下更多的感情空间，他们为自己的麻烦与父母们的相比总显得微不足道而愤怒。然而，幸存者也渴望得到理解，许多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对他们的过去更感兴趣，他们需要讲出来并且期望着孩子们去问他们，好让他们减轻内疚的负担。

卡拉·卡拉诺克声称：“他们从不过问，这使我感到伤心，有时我觉得似乎没有处理好与孩子的关系。他们不感兴趣，他们甚至对我和我丈夫做的有关大屠杀经历的录像带看也不看。”埃塞尔·雅诺夫对卡拉的伤心和痛苦颇有同感。“我希望他们（孩子）能对我过去的痛苦经历更感兴趣，我想这是我对别人家的孩子讲这些事情的原因吧。我现在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像你一样坐在这儿，问我所有的事情，我希望他们可以延续历史的回忆……然而我想他们不会这样做。”

当提及父母的经历和大屠杀时，许多幸存者的孩子表现出一种矛盾情绪。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认同父母的创伤。然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的同情心往往会拉近与父母的关系，由此导致与大屠杀有关的感情焦虑，例如内疚、气愤、脆弱等等会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家庭中来并且成为人们的行为特征。为了不被这些感情所困扰，他们希望能避免父母的悲伤以及与此相关的特征。

幸存者往往也很矛盾。他们既害怕把恐惧和悲伤的情绪传染给子女，同时又希望自己的孩子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提高判断局势的能力，希望孩子们更坚强并准备好对付他人不可避免的憎恨之情。有一点非常清楚，大多数幸存者在不愿直接对孩子谈到他们痛苦的同时，也热切地希望被孩子所理解。或许渴望同情与理解是人类的共性。

第九章 上帝看到了吗？

萨拉·施奈德告诉我：“五次亡灵祷告我都参加了。可是我那生活在以色列的兄弟却一点也不相信。不过，每次祷告前我都给他打电话，让他也去祷告。因为我父母相信，所以我想帮助他们。”

“我讨厌提到它，那真是太大的罪孽。要对抗上帝？我怎么敢呢？但是我情不自禁……当我阅读译文时，泪珠从我的脸颊上滚落……我的父母如此地深信不疑。在犹太人赎罪日，他们请求上帝的宽恕和帮助。天啊，如果你知道上帝是如何帮助他们……我对狗的保护都比上帝对他子民的保护强得多。”

“当我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一位母亲正抱着她的孩子。人们告诉她，如果她把她的孩子交给她的妈妈，她就可以活命。外祖母想把孩子抱过来，但是母亲却不肯……当她们争执时，一个纳粹党卫军冲过来，抢过婴儿，朝墙上扔去，就在母亲的眼前，孩子脑浆迸裂。上帝看到了吗？”

二战以前，大多数欧洲（尤其是东欧）犹太人都是严守宗教戒律的，即使是很典型的不遵守犹太人律法的世俗犹太人，也绝不会背叛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因为不论是信教的还是世俗的，作为犹太人，都意味着他们从属于那些有特殊意义、与之

密切相关的东西。当然，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来说，这种特殊性起源于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独特关系。我们和上帝订立盟约：为他的至高无上作见证，相应的我们会受到他神圣的保护。

信靠神是犹太人一直坚持的传统。是上帝把我们带出埃及，把红海分开，看着我们安全抵达应许之地。对于大屠杀幸存者战前的家庭来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惩恶扬善；他是一位主持公正，热爱孩子，承诺庇护的父亲。然而，对于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他却是一位抛弃自己孩子的父亲。

许多神学家认为，大屠杀导致了一场信仰危机，以至于出现过一种草率的、似是而非的神学理论（为邪恶的存在进行神圣的辩护）。幸存者回忆众多受害者时，不断地引用“无辜”一词。那么多的无辜者，那么多的无辜儿童，难道上帝不想去保护他们，惩治罪恶吗？

根据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传说，在受孕之夜，上帝在一滴精液中决定了一个孩子的贫穷或富贵，愚蠢或智慧，美丽与丑陋，男性或女性。上帝惟一没有决定的是孩子的道德品质。他给予人类选择的权力，好人得到奖赏，受到彰显，天使护送新生的灵魂升入天堂；恶人受到鞭挞，被烈火煎熬，下到地狱。^①

上帝给予人选择的自由，自由选择的代价就是罪恶的存在。很多人坚持认为，大屠杀是人在犯罪而不是上帝。绝大多数大屠杀的幸存者，包括那些最虔诚的信徒，都坚持认为这场

^① 乔治·穆尔：《约瑟夫斯论犹太哲学中的命运与自由意志》，《哈佛神学评论》，剑桥出版社，1929年，第22卷，第371页。

劫难不是上帝的旨意，^① 而是人对人的残害。多拉·莱文森说：“在大屠杀期间，我没有考虑过上帝在哪里，我日复一日地忙于生存，一天干活 12 个小时甚至 16 个小时，只盼望一天结束后的那顿饭。但是，在大屠杀后，我想到了上帝。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希特勒的错，而不是上帝的错。”多拉的丈夫和孩子都得以幸免于难。

戴维·伯恩鲍姆进一步解释道：罪恶是上帝创造至善的一种附属品，没有罪恶，至善也就不复存在。简言之，上帝没有创造罪恶本身，而是创造了罪恶的潜能。这种罪恶潜能的增长与人类在知识与自由上的增长成正比。人们越是自由，神的庇护就越不明显，以致上帝好像渐渐隐遁。^② 当人自行其是之时，上帝肯定不在场。

上帝永远注视着人类的行为，但却隐藏他自己，“掩面”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上帝隐藏自身是对离经叛道者的一种惩罚。

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没，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申命记》第 31 章第 17-18 节）

① 里夫·罗伯特·布伦纳：《大屠杀幸存者的信仰与怀疑》，纽约，自由出版社，1980年，第129页。

② 戴维·伯恩鲍姆：《上帝与魔鬼：犹太人的观点》，纽约，豪波肯，克塔夫出版社，1989年。

也许面对人类的种种罪行，上帝并不是简单地转过自己的脸，也许正是罪恶本身使上帝的视力变得黯然。他爱他所拣选的子民，但是又为他们的堕落而感到遗憾。犹太神学的基本教义是：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一个有待完善的不完美世界。如果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来完善这个世界的不足，上帝必定会隐藏他自己。当约伯面对上帝，要求知道为何他要忍受那些显然无意义的痛苦时，（其结果是对神的隐藏提出怀疑）上帝从旋风中回答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臂膀吗？你能像他发雷声吗？”

上帝提醒约伯有关人的责任，告诫约伯不要谴责神，而必须唤醒自身的潜力，作为上帝的子民来保卫世界。当然，这些事情由上帝自己来做也许要容易得多，但是这不符合上帝创造世界的公理。上帝随时可以插手，但是他使用无上的内力，继续隐藏着自己，使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救赎。

有人在犹太人的犯罪和大屠杀之间提出某种因果关系，幸存者因此一直受到排斥。然而一些犹太教教士（许多人属于哈希德派）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这些人暗示：大屠杀就像是上帝愤怒的显示，希特勒是上帝的工具。

但是，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讨厌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癆病和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地播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你们因这些事若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也要打

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打击你们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并且，他们将因先辈的不公正待遇而痛苦终生；他们将承认他们和前辈的不公正待遇，他们冒犯我，就是与我为敌。（《利未记》第 26 章）

犹太学者宣称，犹太人因为其同化倾向和在神圣的律法和戒命面前作伪证而一直受到惩罚。19 世纪末，约瑟夫·所罗维奇克先生提醒犹太人，必须注意将犹太人从其他国家当中分离出来。当犹太人与异邦人走得太近时，上帝就会让异邦人把他们推回去，犹太人在异邦人中渗透得越深，排斥力和愤怒就会越强。乔费兹·切姆将他的希望寄托在遵守律法的人们身上。他相信，如果失去了律法，罪恶的倾向就会显露。为了恢复对身份的记忆，上帝会让犹太人的周围充满了敌人。“因为我们的种种罪孽，所以要遭到惩罚”的预言，更能解释几千年来灾难不断降临在犹太人头上的原因。上帝利用纳粹是不是就像他使用苍老的亚述，作为“恼恨的杖”（《以赛亚书》第 10 章第

5节)。^①皮亚泽斯纳·里贝就把他的儿子、儿媳和母亲在德国轰炸华沙中的丧生归咎于自己的罪过。^②

戴维·希曼斯坦用自责的口气向我讲述了他在大屠杀岁月的经历：“一天，德国兵对三个蓄有胡子的虔诚的犹太人说，带上经文护符匣去干活。他让三人跪下，头戴经文护符匣^③，祈祷上帝来帮助他们。德国兵一边打他们，一边嘲笑他们。几天后，我看见他们并问他们：“这就是他们对你们所做的事情，难道你们还相信主吗？他们抓走了我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并把他们放进毒气室里。”他们对我说：“是的，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罪的，真正的犹太教徒变得越来越少，现在很多犹太教徒都和异教徒结了婚，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处罚我们。”“但是，他们干嘛要杀害那些无辜的孩子呢？”“那正是对我们最大的惩罚呀。”听完这些，我走开了。”

按照一些犹太教人士的观点，例如约尔·泰特尔鲍姆就认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盲目崇拜”是错误的。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一定是上帝的驱使，而非人力所及。受人敬重的犹太高等学院院长伊兹查卡·赫特纳先生曾经认为，直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呼声变成了强大的现实压力后，伊斯兰教才成为犹太人的公敌。因此，是犹太复国主义诱使西方的基督徒与东方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消灭犹太人。伊萨查·肖盟·泰克特尔是一位哈希德派教徒，在如何看待决定犹太人命运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方面，与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于1943年在布达佩斯被德国占领以前，写完了一部名为《孩子们的快乐

① 伊曼纽尔·雅各布维兹老师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关于集体奖励和惩罚的教义仅仅限制在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中。

② 参见1943年冬他给巴勒斯坦的兄弟（耶什阿华·夏皮若老师）所写的信。

③ 犹太教徒把经文盒系于额上。——译者注

母亲》的著作。在书中，泰克特尔先生热切地主张犹太人应该离开海外犹太人聚居区，重建耶路撒冷，这是“最后赎罪”的必要前奏。作者还谴责了正统犹太教领导人的观点，因为他们在二战前的几十年里一直反对在巴勒斯坦定居，这在无意中为后来的大屠杀出了一份力。库克也赞同泰克特尔的主张，即采取一种“新的正统犹太教”的立场，劝导犹太人改造他们的现代环境，缓和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他相信，犹太民族一定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自己的家园再次创造新的生命。

根据哈希德教派的观点，由于人的有限的理解力，可能很难理解上帝的旨意。但是，所有来源于上帝的东西都是善良和仁慈的。因此，基于信仰，人们必须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接受爱和个人的牺牲，绝不能怀疑上帝是最为公正的信仰。按照这种观点，大屠杀就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最大考验，是一个现代的“以撒献祭”。

乔费兹·切姆首先提出这一格言：“对于有信念的人，不会有任何问题；对于没有信念的人，不会有任何答案。”尽管如此，犹太人还是努力寻找一种可以减轻其痛苦的解释。当他们面对死亡时，一些虔诚的信徒会唱着下面的歌，歌词源于梅莫尼德斯第十二条信仰原则：

我相信完美的信仰，
救世主就要来临，
救世主就要来临，
我确信，
尽管需要等待，
但我仍然确信！

面对死亡，信徒们催促本·蔡恩·哈伯斯塔姆老师逃亡，但是哈伯斯塔姆没有逃走，因为他信奉苦难时期就是救世主即将来临的观点。他问：“为什么要藏起来？一个人要在救世主面前藏起来吗？”^① 在特里布林卡集中营，伊斯拉德·夏皮拉告诉他的信徒：“我们不应该责备上帝的行为，如果命中注定我们要在这个赎罪期为救世主的来临献祭，并且因此要经受烈火的煎熬。那么，我们应该为有此殊荣而感到骄傲。”^②

对于哈希德派来说，苦难是上帝隐藏仁慈的形式，苦难表明人有机会更加靠近上帝。当贝尔泽·里贝的长子在犹太会堂被纳粹用火烧死后，他就是用为上帝牺牲来表达自己的悲伤：“这确实是上帝的仁慈，我也准备好了自己的牺牲。”^③

对于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来说，殉道是一种安慰，因为它给予人们的苦难以某种意义。灾难是为了赎罪，离应允的回报更为接近。正是通过犹太人的殉难，使得所有的民族都能认识那惟一的真神上帝。因此，近些年来，犹太舆论很欣赏对“大屠杀”一词的使用。^④ 大屠杀一词源于希腊，它意味着一个“全部奉献”的典礼。但是，不同于佩特里亚克·以撒向神奉献自己那样，600万人的毁灭决不是犹太人奉献给上帝的一个“祭品”，犹太人被判处了他们并没有选择的死刑。

除部分虔诚的信徒外，幸存者们都认为，600万人的死与宗教信仰无关。幸存者们崇敬600万个亡灵，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对自己所受的折磨和迫害未作任何申辩。否

^① 佩塞克·辛德勒：《对大屠杀的反应》，纽约，豪波肯·克塔夫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6、27页。

^④ 也许首次使用“大屠杀”一词来描绘欧洲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的人是美国犹太史学家鲁弗斯·利尔斯，见以色列：《犹太人历史》，1949年。

则，他们就不是普通的男男女女，而应是烈士了。

我自己知道，在我的镇子里以及其他地方，这些年来有数百名死难者。他们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有些是良民，有些是恶棍，还有些是两种品质兼而有之。我们镇里有个不诚实的屠夫，一个愚蠢而又卑鄙无耻的家伙，他遭受了很多的迫害，最终和全家人一起死在毒气室里。另一个邻居的妻子，不讲道德，从不顾及别人的看法，她勾引每一个她所看见的男人，不断地给她原本美好的家庭带来耻辱。所有这些人都不是信男善女，他们的死也不是为了神圣的上帝。还有那些在集中营抢掠他人财物的低级下流的无赖们，虽然绝大多数都死了，但他们的死也不是为上帝献身。在街上，我总能看到这种人，我试图避开他，他也试图避开我。越是道德败坏的人，往往他们存活的机会就越大。他们并不像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那样，为了圣洁的上帝而贡献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而不惜作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以别人的生命作为自己幸存的代价。^①

现代神学家抛弃了犹太人基于神迹的传统宗教信仰，通过修改神学中的有关概念，着手解决上帝与灾难关系的难题。也许上帝只是创造了恢宏浩瀚的宇宙，可是他却没有参与历史。也许上帝是善良仁慈的，但却不是万能的。与其说上帝死了，倒不如说上帝不在场。（或许有些人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但是，这对于那些相信上帝有能力干预的人却是十分痛苦的。）

^① 布伦纳：《信仰与怀疑》，第233页。

1961年8月，美国神学家理查德·鲁本斯坦同东西柏林福音传道会主教海因里希·格鲁伯一起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因为，当时一位新教牧师断言，上帝利用纳粹作为实现他意志的一种工具。鲁本斯坦对于这一断言感到震惊，他强烈反对神圣意志或神的关怀的观念。他坚持说，人类生活条件反映不出先验的目的。

在鲁本斯坦看来，上帝、契约和上帝拣选的子民（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荡然无存。上帝要么是允许，要么就是无力阻止灭绝其子民的行为，这样的上帝不值得人们的信仰。契约的种种说教和上帝的拣选都是对无能者的训练。大屠杀之后，各种先验道德的说教已经荒废。鲁本斯坦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际上没有神”的时代。^①然而最近，鲁本斯坦有某种程度上的改变。“当我在写《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后》时，我强调契约和拣选学说的惩罚性和惟一性两个方面。数年来，我逐渐欣赏事情的另一面：人性对契约及其同等作用的深层需要。”^②因此，我们有更多的理由使宗教礼节持续下去并且公开存在。鲁本斯坦明白，人们需要有目的的生存。

通常，正统犹太教徒对于他们数百万的兄弟姐妹惨遭屠杀事件，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寻找答案。对于一些人来说，那的确是令人忧虑的问题，会使人对挑战失去勇气。或许他们信仰

① 他的思想首先表述于 R.L. 鲁本斯坦的著作中（《奥斯威辛之后：极端的神学和当代犹太教》，印地安纳波里，鲍勃斯·梅里尔出版社，1966年）。另参见 R.L. 鲁本斯坦：《奇妙的历史：大屠杀和美国的未来》，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75年。

② R.L. 鲁本斯坦：《盟约与灾难》；耶胡达·鲍尔主编：《为了未来的纪念：工作记录和附录》，牛津，珀盖蒙出版社，1989年，第1卷，第666-671页；他的新的立场进一步演变，参见 R.L. 鲁本斯坦和 J.K. 罗思：《走近奥斯威辛：大屠杀及其遗产》，亚特兰大，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年。

的基础早已被摧毁，已经承受不住更多的压力了。其他一些人只提出一些陈词滥调：有限的人类不可能理解无限上帝的行为方式。

在神的应许和神的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让人紧张不安的关系，这种紧张表现为上帝是带来拯救呢（例如：出埃及）？还是进行惩戒（例如：毁灭寺庙）？大多数律法学者都否认大屠杀的独一无二性，他们反对使用这一特殊的术语。正如敏感而富于同情的伊利泽·伯克威兹所注意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其令人恐怖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它所带来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困境却不是独特的。因此，大屠杀后神学家的窘境，不会比犹太领袖们在公元70年（第二座寺庙的毁坏）或1492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更为麻烦。^①由于大屠杀之后犹太人仍顽强地生存下来，所以犹太民族是不会被灭绝的。

哲学家埃米尔·法肯海姆先生拒绝从自然神学中得出结论。在法肯海姆看来，我们的任务“不是解释上帝，而是如何生活。”对于犹太人来说，法肯海姆新提出的第614条戒律^②是神圣的义务，它可以使犹太人在大劫难后仍能保持信仰，而不因敌人的打击而背叛。救世主来临的时代一定会对难以解决的神学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③

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都回避了针锋相对的神学辩论。因为

① E. 贝克威兹：《大屠杀后的信仰》，纽约，克塔夫出版社，1973年；E. 贝克威兹：《上帝、人类与历史：犹太人的解释》，纽约，乔纳森·戴维出版社，1959年；E. 贝克威兹：《在地狱中与神同在》，纽约，桑合德林出版社，1979年。

② 犹太教的传统戒命、律例和规条共613条，这一条是一个补充。——译者注

③ E. 法肯海姆：《上帝在历史中的存在：犹太人的见解与哲学反思》，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70年；E. 法肯海姆：《犹太人回归历史：奥斯威辛时代的反思与新耶路撒冷》，纽约，肖肯出版社，1982年。

人类（尤其是幸存者）是脆弱的，他们需要一种护身符，所以许多人继续信奉上帝。尽管幸存者常常把自己的幸存归结为“运气”，但是，生活在偶然事件丛生的地方或罪恶统治的地方，使人充满着畏惧，幸存者已身受重创，他们不能再忍受失去信仰的支柱。

上帝在哪里？……我不得不有所信仰。如果你没有信仰，你就是一个动物。

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我恰好是一名信徒……但是，我所目睹的是，在集中营里虔诚的信徒也会问上帝在哪里。……我相信有至高无上的存在者，我相信既然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就应该有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但是，当特别正统和虔诚的信徒被送进焚尸炉，焚烧尸体的青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从根本上讲，我相信上帝，如果我们不相信，文明早就结束了。如果我没有亲眼目睹那些暴行的话，我的信仰会更坚定一些。一个婴儿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把他的脑袋撞在墙上？当时上帝在哪里？

我们问自己许多问题……当然，人不可能明白世间的许多事情。一些好的东西化为灰烬……你不能放弃一切……你该让你的家庭也信仰神，因为这是你的全部遗产，如果你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一切。

在战前就是犹太教信徒的幸存者中，大约有一半人在大屠杀期间乃至今天仍然保持着信仰。战前相信正统犹太教的那些

人，其信仰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① 索尔·哈尔彭过去把他的孩子们送到希伯来人学校，定期到犹太会堂，遵守所有犹太人的节日。他对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横眉冷对，对世界前途感到极度地担忧。“我不知道，如果有上帝，我们又是上帝挑选的人，为什么他让这么多的小孩遭到杀害？……我知道许多不太好的人却活了下来。战前，我们惟恐做了什么坏事被上帝看到而遭受惩罚。现在，我并不知道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去相信一些事情。”索尔也许对上帝有某种疑问，但是他仍然想去信仰一些东西。

对于幸存的随机性需要有一个说明。我们的生命毕竟太宝贵了，不能舍弃生命，胡思乱想。我们必须解除对生命安全的忧虑。对于艾达·科克来说，她的幸存有一个神圣的逻辑。“最初我想，如果有上帝，为什么他要最先杀死所有善良的人——孩子、老人、宗教信仰徒？后来想到，也许上帝想尽快杀死他们，以便最早解除他们的痛苦。曾有一度我什么也不相信。但是，我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的事情，所以我想，上帝拯救我是有道理的。”这需要相信，你是被上帝选中来拯救的，也是上帝在减轻幸存者的痛苦，也许上帝赦免谁是有目的的。

相信机遇就是否认保护。郝奈·利德是一个现代正统犹太教信徒，他宁愿相信上帝。“我甚至更为相信……尤其是当我遇到困难并且战胜它的时候。当你被枪击中却活了下来，你肯定会信仰上帝——确无无疑，是上帝的手拯救了我。”从灾难概率的表面看来，我们像是在和上帝做交易。任何被解救的迹象都使我们离他更近，当我们如愿以偿，就会用我们对他的信心来偿还所欠下的债。一个在二战前不信仰上帝的集中营的同

^① 布伦纳：《信仰与怀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喊叫：“天啊，你疯了吗？！”

现在我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我没有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而感到耻辱，而是感到骄傲。以前，如果我看到街上的犹太人穿着“犹太标志”——戴着圆顶小帽^①和穿着黑色外套，我不会喜欢它。今天，如果我看见一个犹太人身穿黑色外套，我则会感到骄傲。如今，我不相信上帝，但是我相信犹太人。

大屠杀以前，我总是觉得不同，我不想成为犹太人。别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是一切坏事之源。大屠杀使我觉得做犹太人真好。现在，只要有可能，我都会让那些与我打交道的人知道我是犹太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自豪于他们的犹太血统。当大屠杀的伤痛刺激着许多幸存者振作人生时，埃塞尔·雅诺夫的心情却很颓丧，“我比任何人都更像犹太人，但我并不引以为自豪。在某些方面，我觉得犹太人不像其他人那样容易被接受，犹太人和其他人是不平等的。与非犹太人在一起时，我只是陪衬……多年来，在过犹太新年和犹太人赎罪日的时候，我总是编造种种谎言在单位请假……我感到自卑，我对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非常不满。”

在生活中，大屠杀的幸存者们都全力献身于犹太民族的未来复兴，很少有人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通婚，他们比美裔的犹太

① 犹太男子在祷告、学习、吃饭等时戴的帽子。——译者注

同胞们更关心种族的婚姻。^① 对于大多数幸存者而言，他们对以色列国的献身与忠诚已成为其神圣的责任。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90% 移居美国的犹太人都访问过以色列，与此相比，只有三分之一的美裔犹太人去以色列；幸存者中近60%的人曾经访问以色列两次以上，但是，只有15%的美裔犹太人这样做。尽管幸存者只占美裔犹太人人口不到2%，但是他们却购买了10%的在美国出售的以色列债券。^②

大屠杀幸存者相信：只有以色列才能永久地保护脆弱的犹太人，阿拉伯人是现代的纳粹，他们希望通过消灭以色列来消灭所有犹太人。幸存者痛恨美国犹太人“天真”的批评，这些人逐渐破坏了以色列政府必须采取的果断立场。

全世界都在反对犹太人。每时每刻他们都忙于对付以色列。其他国家做错了什么事，他们不会介意，但是，只要以色列做了什么事，每个人都横加指责……在世界上只有我们自己热爱自己。现在他们尊敬我们，那是因为以色列非常强大。有个名叫伊兹哈克·沙米尔的小伙子对布什总统说：再也没有人瞧不起我们。

以色列是惟一可以防止另一次大屠杀的国家。犹太人必须为以色列竭尽全力。不要坐在那里一味地批评以色列，许多批评者应当为此感到羞耻。以色列不一定按照美国的意图做事。

^① 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第259页。幸存者把这一责任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孩子的异族通婚率比美籍同龄的犹太人要低得多。参见哈斯：《大屠杀的阴影》。

^② 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第185、186页。

幸存者深信，只有犹太人可以彼此保护。戴维·希曼尔斯坦强调：“我们需要一个犹太国家。世界上的每一位犹太人都必须帮助以色列。因为上帝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国家。”绝大多数战前不太关心自己犹太身份的幸存者在战后却更为关注自己的身份。钱纳·李在1940年以前是波兰克拉科夫市的居民，他告诉我：“战前，尽管我信犹太教，但我是一个波兰爱国者，典型的波兰人，非常波兰化。现在我觉得犹太民族是一个国家。也许战争给了我们教训，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犹太人。”

幸存者通过对上帝的呐喊（虽见不到他的容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通过否认上帝的存在来惩罚他。一些幸存者坚信，“上帝没有拯救我们，我们绝不能原谅他。”但是，他们越呐喊，信仰与非信仰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如果上帝不存在，为什么还呐喊呢？因此，上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吊袋，用以发泄强烈的痛苦与愤怒。杰里·辛格是犹太教的积极参与者，他谈论道：“当关于宗教和上帝的讨论议题出现时，我感到非常困难。我一直痛恨大屠杀或对儿童的谋害。我亲眼目睹了刺刀刺穿了一个婴儿和母亲。我还见到非常虔诚的人在祷告时被杀死。我说的是好人、无辜的人……孩子们。”

完全拒绝过去信仰的幸存者，虽然摆脱了神的遗弃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他们也失去了信仰所带来的安慰和对祖先的认同。对于许多幸存者来说，关于善良力量的信念已经被邪恶势力所代替。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美德也就不复存在（或相对无力、软弱）。

主张依靠上帝保护的信仰系统被自我保护的意识形态所代替。对于幸存者来说，以色列民族的神已经让位于以色列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信仰经常被证明靠不住的时候，大

屠杀却增强了犹太人对本民族的认同。

罗丝·弗里德兰德曾经是一名虔诚的被同化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如果不是因为大屠杀，我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犹太人。在正常条件下，我会越来越淡化这一身份。我第一次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听到那些波兰女孩唱‘我的犹太人妈妈’等歌曲的时候，我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它使我很痛苦，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什么。每次听到那些歌曲，我都会流泪，不是因为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痛苦或者其他别的原因……我受到了太多的伤害，我想和犹太人呆在一起。现在，我必须和犹太人在一起。”

第十章 血债血还

在纳粹白色恐怖的统治下，大多数犹太人对自己的前途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时常受骗于某些花言巧语，不得不通过干活求得生存。他们巴望每一次骤然加之迫害都是对他们的最后一次打击，因而迫切期待着同盟国的军事胜利。当最后的胜利终于到来时，他们已经身心疲惫，无力反击了。

凶手们十分清楚，犹太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残暴行为，因而犹太人也渴望着以血还血。对于犹太人，儿子看到父亲被殴打致死，女儿看到母亲被害死，孩子被从父母手中夺走，善良的人被推进毒气室……他们无助地看着自己的亲人遭受奇耻大辱、忍饥挨饿、严刑拷打，他们做人的尊严荡然无存。

但是，当幸存者获得自由以后，当表面上看来不可一世的纳粹被推翻以后，他们为什么不为自己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孩子以及朋友们去报复那些刽子手呢？他们的愤怒究竟要宣泄何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既是人类的基本要求，也是为的公正！

甚至上帝也告诫人们要公正。

若有人恨他的邻居，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

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治死。你眼里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申命记》第19章第11-13节）

二战结束后，幸存者本可以向迫害者发泄愤怒，但由于刚刚解放，幸存者精疲力尽竭、不知所往；而且，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希望寻找其他活着的亲人，所以在获得自由后，他们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亲人方面，从而错过了复仇的大好时机。索尔·加伯解释说：“对于一个被击倒的人，愤怒会随之而来。”

当人受到巨大伤害时，当不公正的感受占主导地位时，往往需要一段时间凝聚心中的愤怒。当如此众多的无辜者被杀害，当人的精神支柱摇摇欲坠时，人们肯定需要时间，来重新确立方向感和认同感。“我的心像被掏空了，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我伤彻身心。如果你在战后出生……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一切。”

解放后，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在德国生活的大多数幸存者们都恢复了力量和内心的平衡。他们随即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他们的生活已被破坏殆尽，必须集中精力重建新的家园。如果向敌人发泄愤怒，只能让幸存者回到过去，回到那暗无天日的生活。愤怒会使幸存者感到自己还处于囚犯的地位，使他继续把自己锁闭在受迫害的生活中不能自拔，以至于延长痛苦的生活。另外，由于同盟国不断重申法律条令和秩序，经过战后一段时期的混乱后，杀人又一次被认定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复仇者的愿望渺茫起来。

尽管个别幸存者饶恕了侵略者，^①但是，大多数幸存者都拒绝这种方式。或许这反映了人类的本性。那么，他们那愤怒之舟会驶向何方？又会在哪里停止呢？人们该如何选择呢？“最令我吃惊的事情是……我在思考，我在思考自己和我所认识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传统根基的年轻人，在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和大屠杀之后，当他们有机会复仇的时候，他们却为什么能从这个深渊中挣脱出来，从人性的深渊中挣脱出来，站立起来，奋力向前，为他们自己，为了下一代人而创造，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尽管在当时抢掠和偷盗是非常容易做的事情，但他们却没有做，这是为什么？”

关键点在于，幸存者对能够活下来已经感到十分庆幸，同时，他们非常清楚这个世界欠他们的太多，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采取什么行动。威廉·赫尔姆赖克指出：“战前一代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在早期移民浪潮到来的时候，许多犯罪行为接踵而来，但是，几乎都与犹太人无关。如果生存的需求使人还原到动物般的行为，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说明在新移民和他们的孩子当中，几乎没有犯罪或者青少年犯罪行为这一事实呢？”^②

尽管对自己的行为采取克制态度，但看到盟军为他们报了仇，幸存者们还是非常高兴的。安娜·马利尼在特里西恩斯塔特被苏军解救出来，她说：“我觉得……我会用他们对我们的方式进行报复……但是我不能……然而，看到其他一些狱友们痛打德国看守时，我特别高兴。”许多幸存者在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个人复仇的想法。赫谢尔·卡普兰

^①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见多识广的人》，纽约，自由出版社，1960年。

^② 赫尔姆赖克：《反对一切不平等》，第84页。

的父母、姐妹、哥哥和妻子在庞纳遇害，他心存积郁地说：“许多次我都在想，如果在街上遇到德国人，我就会把他干掉。”幻想至少允许人们对无法做到的事情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戴维·希曼尔斯坦对自己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态度感到特别的内疚和矛盾。“两个德国兵认为我妻子不是犹太人，想让她离开，但法国的盖世太保却说：‘不，让我再检查一下。’结果她未能脱身……我特别想找他报仇，我想到那里把他杀掉。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想法更好呢？但是，我又想，他也有孩子，孩子会想念他。我考虑来考虑去，不停地考虑……最终我没有那样做。我仍在想……也许我不这样做是错的。你不是一个凶手……但是我希望……我希望……我要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做。”戴维为妻子和孩子的被害而深深自责，但他却把自己痛失亲人的切身感受推及对方，从而阻止了自己的复仇举动。“我要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做。”戴维也明白，复仇也许可以得到一时的痛快，但是它并不能替换，从根本上说那是无益之举的。

67岁的巴巴拉·洛温斯坦也有类似的无能为力的感受，她对自己和别人都感到失望。“我总在考虑报仇，不幸的是，我只是想想。当我来到这个国家时，走在街上，我就设想一个囚犯头走在我身旁，我逮捕他并把他送交警察局。战争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敌人都消灭了……在维也纳犹太人居住区有一个可怕的家伙，他叫穆若，在审判他时几位幸存者都出庭作证。然而，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到那里去的幸存者竟受到威胁，穆若竟被宣判无罪。我知道，有一群来自维也纳的人住在以色列，他们是地下组织的人，他们要求以色列政府派特工人员，争取在奥地利杀掉穆若，但是，以色列政府拒绝了。之后他们

商量着自己做这件事，但是没有成功。”罪犯们潜伏下来，没有人对他们采取行动，巴巴拉感到非常悲哀。

在自己的心目中，当对方不可战胜的形象不断得到强化时，尽管现实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想法也不会立即随之改变或消失。索罗门·戈尔德斯丁遗憾地说道：“（解放后）我看见苏联人走进一户德国人家，杀死了里面所有的人并把房子烧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勇气做到这一点。美国人把正在押解的德国人召集起来，他们对我们说：‘这是我的来福枪，你们可以杀死他们。’但是我们却没有做。”

要想克服人类的恐惧感是十分困难的。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可能会永远感到软弱无力。埃塞尔·贾诺认为，超人和凡人之间的力量差异是不可调和的。“我对德国人从来没有过憎恨感……也许因为我还在怕他们。我感到忧虑和痛苦，但并不感到气愤。当我愁眉苦脸的时候，我感到他们赢了。我对他们的报复就是继续活下去。”埃塞尔·贾诺的报复也是一种报复类型，只是一种象征而不是直接的报仇。甚至在50年以后，当有些幸存者直视德国人时，仍会感到胆战心惊。

对于大多数幸存者来说，他们都感受过恐怖和焦虑，都做过噩梦。在环境的刺激下心神不安，因为环境勾起了他们对往日的回忆。但是，幸存者愤怒的发泄却常常受到阻碍，因为愤怒需要行动，愤怒是对侮辱的反击。

大屠杀幸存者在重新获得自由后，在尚未恢复正常情感之前，更容易马上实施报复。但是，在刚开始时，他们会感到太疲劳，太虚弱，太迷惑，太恐惧。一段时间后，由于生活远离了迫害和死亡，远离了造成其软弱的环境，自我平衡心理和寻求安宁生活的愿望会慢慢地滋生——幸存者会专心于重建新的生活。

复仇的另一个障碍是，复仇的结果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一个人如何为所有的人复仇呢？如果人们只是遭受了轻微的损失，实施报复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整个家庭、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被毁灭了，仅杀死几个凶手，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能代表“已经报了仇！”否则，就会把大屠杀的悲惨程度看得微不足道。

是的，幸存者渴望对罪犯予以严厉惩罚，这不仅惩罚了坏人，而且也是解开内心死结的方法。“在内心深处，迫害的经历使我感到极度的孤独，摆脱离弃感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纳粹分子站在刑场的时候，我想他也经历着对自己所犯罪行的精神惩罚，在那一刻，他受到了公正的惩罚。”^①

刚解放的时候，许多人冲进德国人的家，夺走他们的食物和衣服，集中营里的难友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一些人把集中营的看守打翻在地，痛揍他们。在布肯瓦尔德解放的那一天，19岁的杰里·辛格和另外两个难友，不顾一切地扑向一个德国卫兵。“我们把他带到纳粹党卫军大楼的三层，蒙上他的眼睛，让他在一块木板上走，然后把他推到窗外，活活地摔死。”

许多获得自由的人得到盟军的特许，尤其是得到苏联红军的特许，可以对从前迫害过他们的人进行某种报复。我访问的几位被苏联人解救出来的幸存者都提到过，当时士兵们把枪递给难友们，瞄准以前的德国看守，但是，没有人记得有谁接受了这个提议。

下面是盟军士兵发泄愤怒的自我描述。1945年4月29日，第42师和第45师解放了达朝市。一支美军小分队激愤于纳粹

^① 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第70页。

的暴行，毅然决然地处死了他们正看守着的 122 名纳粹分子。有些美国士兵故意只打伤集中营德国兵的腿，让犹太人对他们进行复仇。其中一名美军士兵把刺刀递给一个犹太人，让他砍死了一个德国兵。^①

75 岁的奥蒂斯·莫耶曾经是美军第 42 “彩虹”师的一名士兵，1945 年 4 月 30 日，他们到达达朝市。他十分清楚地记得，部队开进集中营后，看到铁轨上大约有 40 至 50 节货车车厢，里面装满了犹太人，大多数人已经饿死了。“集中营中的一些幸存者向我们走来，问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们带走一些德国人，主管的上校让我们交给幸存者 4 个德国人，并且不让我们干涉。他们活活打死了这 4 个德国兵。”^②

1945 年 5 月底，来自巴勒斯坦的志愿者组成了英军犹太旅，奉命从意大利进入德国。在他们出发前一天的早上，一位下士高声朗读《在德国土地上战斗的犹太战士的誓言》：

记住你的六百万同胞惨遭杀害，
要对同胞们的敌人永远仇恨，
记住战斗的人们对你的重托，
记住犹太旅是占领德国的犹太人部队，
记住我们的军旅有自己的徽章和旗帜，它的目的就是
复仇，

记住我们的仇恨就是整个社会的仇恨，任何不负责任的行动都是对全社会的损害。

作为一个犹太人要表现出对自己种族和旗帜的骄傲，

① 罗伯特·阿布朱格：《内心的邪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 年。

② 马库斯·史密斯：《悲惨的达朝地狱》，阿尔布奎克，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72 年。史密斯描写了被关押的犹太人怒喊着猛踢躺在地上的德国兵的情景。

即使与德国人在一起也要洁身自好，
切不可听他们的话，也不要进他们的家，
诅咒他们、他们的妻子、孩子、财产以及他们的一切，永远诅咒他们，
记住你的使命就是拯救犹太人，把他们转移到以色列，解放自己的家园，
你的职责就是献身和忠诚，把爱奉献给死里逃生的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

以色列小说家哈诺克·巴托夫当时还是一个在犹太旅服役的年轻人，他后来写道：“血在我们的血管中沸腾，我们的部队整装待发，我们的战车准备就绪，我们的旗帜高高飘扬。回响在耳边的话语，使我们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在‘誓言’宣读之前，部队指挥官就告诉我们：‘你们新的使命就是以道德之师对付毁灭一切道义的敌人。’道义！我们要为犹太人民复仇。尽管我们不会从中得到快乐或享受，但是我们必须报复他们！我们要让折磨犹太民族的死敌永远胆战心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想：‘明天！明在我们就要打到德国去。’”^①

但是，犹太旅没有进发到德国，而是出人意料地部署在塔维西奥小镇，准备解决任何有关特里斯特未来的争端。从山上的村庄俯视塔维西奥，可以发现一些走散的德国纳粹士兵以及来自比利时、匈牙利、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他们与当地入混在一起。犹太旅刚刚到达塔维西奥后，那里就发生了许多意外事件：德国人遭到袭击，纳粹的房屋被

^① 迈克尔·巴佐哈：《复仇者》，纽约，霍索恩图书出版社，1967年，第22页。

放火烧掉，好几起强奸案，但是无人知道罪犯是谁。

犹太旅的参谋们（他们都隶属于哈根纳）为频繁出现的暴力事件感到焦虑不安，因为这些行为将对建立国家的紧迫目标带来不利的社会舆论，必须以更有秩序、更少破坏性的方式引导人们的复仇愿望。为此，哈根纳的领导人决定从部队第二营中精心挑选出人员组建秘密部队，为犹太人民的利益向纳粹分子讨还血债。

在以色列的切姆·拉斯科夫·卡米（后来在 1957 年至 1960 年间担任以色列军队的总司令）、迈尔·佐里拉（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将军），包括莫舍·科普维兹、马德·托克亚斯（后来成为以色列伞兵部队著名中校指挥官）和多夫·科恩（埃策尔恐怖组织的一名成员，几年以后遇害。当时他假扮成一名英国军官，参加攻击圣琼德艾克监狱的战斗，解放了大批关押的犹太人）的领导下，这支小分队通过秘密查访，迅速处决了 200 名左右藏匿在意大利北部、奥地利和德国的纳粹罪犯。从 1945 年底到 1946 年初，纳粹党卫军军官、盖世太保的头目和纳粹的高级官员神秘地从克拉根弗特、英斯布拉克消失……

甚至犹太旅的其他战士也不了解，卡米和他的战友经常装扮成英国军队进行侦察活动。在最近的采访中，卡米谈到了当年的情形：“我们组成小分队，穿上英国军服，开着英国吉普车，在晚上行动，提审那些列入名单的嫌疑犯。纳粹分子以为自己是被英国情报部门审讯。审讯官提走嫌疑犯，表面上是送到战俘营，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永远地消失了。在审讯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人名，重要的人物都被我们处决，不太重要的人就交给英国当局……我的上校（非犹太人）也许已经怀疑到我们正在做一些超出职权范围的事情，我敢肯定，他意识到了

什么，但是他却佯装不知。”^①

这些复仇者（后来以“诺克敏”而著名于世）并不认为自己是杀手，他们深信自己是在完成国家的使命。在执行任务以前，他们常常阅读犹太情报局有关死亡集中营的报告。卡米向队友解释说，哈根纳只会惩罚那些确实证明是犯了罪的纳粹分子。因为许多人的罪行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以后也许会被盟军释放。诺克敏只有在证据确凿时才干掉他们，而迫害非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则移交给英国。^②

正当复仇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另一个复仇行动也开始了。它是由前哈绍默·哈特扎伊尔领导的一支大约 50 名游击队员发动的独立复仇行动，其精神领袖是诗人和前游击队领导人阿巴·科夫纳。他们被称为 DIN，脱离了犹太战斗组织（犹太游击队的核心组织），为幸存者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而努力。DIN 分为 4 个小组，尽管每个小组只有 10 名成员，但是，每个组都有各自的领地，也常常与犹太旅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如果需要的话，联络员会提供制服、身份证和车辆，穿上美军、英军或波兰的制服。DIN 最为典型的行动是，其成员到达一个战俘营，传达伪造的命令，说把有关囚犯都转移到另一个战俘营，当然这些人永远也不会到达预想的目的地。

1946 年初，科夫纳设计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为了得到犹太情报局和哈根纳组织的支持，他到巴勒斯坦游说。他的组织计划在西德几个主要城市的饮用水中投毒，目标是杀死 600 万德国人。但是哈根纳不同意这一鲁莽的方案，不过却模棱两可地同意了该组织的第二套行动方案，即对美国战俘营中

① 与卡米会晤，《耶路撒冷邮报》国际版，1989 年 7 月 22 日，第 9 页。

② 巴佐哈：《复仇者》，第 24 页。

的几千名纳粹分子投毒。科夫纳后来说，切姆·魏茨曼帮助他获得了毒药。魏茨曼是一位化学家，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①

科夫纳带着毒药进入欧洲，在经过图伦港时，被英国人逮捕了。科夫纳确信，在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中，肯定有人为了阻止这次计划而出卖了他。但行动并未因此而停止，1946年4月13日晚，他手下的几名战士冲进一家面包房投毒，该面包房主要为纽伦堡外第13战俘营提供面包。媒体后来报道的纳粹战俘死亡人数各不相同，或许一个也没死。^②

只有少数几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复仇事业，始终不渝地追剿纳粹罪犯。例如西蒙·威森索尔和赫尔曼·兰贝恩，他们对过去的苦难耿耿于怀，因此选择了与众不同的道路。但绝大多数人仅仅在1945年的春天才些许满足了一点复仇愿望——在刚解放后的数小时内，人们痛打德国兵或者杀死他们。

当我第一次问马丁·伯恩斯坦，是否曾经有过复仇的想法时，他的脸上显出了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在他看来，复仇就像以前的谋杀一样毫无意义。然而，在短暂的困惑之后，马丁很快恢复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复仇心态，他说：“我认识一个男人，现在他已经死了，在战争中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惨遭杀害。战争结束后，他闯进了一户德国人家，用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

保罗·李满足于某种怪异的复仇方式，这种复仇方式只具有某种心理意义。“有一次，在慕尼黑市的一辆电车上，我们

^① 塞格夫：《第700万》，第143页。

^② 《毒面包降临于纽伦堡附近美国战俘营里的1900个德国战俘》，《纽约时报》，1946年4月20日，第6页。

回想起了当年在集中营的情形。当时一个德国兵抽完烟，几个难友争先恐后地去抢烟蒂，而那个德国兵看见后就用脚踩住他们的手。想到这里，我也把烟头扔到电车上，当德国人想抬起它时，我就走上前去，踩住了他的手。”这显然是为了报复，至少是某种欲望的宣泄，与挤脓包类似。

一些游击队员习惯于诉诸暴力。他们把以前经历过的个人侮辱，变成对其迫害者的人身报复。他们一般都参与有组织的行动，例如“复仇者组织”，采取更为自发的复仇方式。本·卡斯在二战期间长期与游击队生活在丛林里，曾经与俄罗斯的1.8万名游击队员并肩战斗过好几年。他一直愤愤不平，常发牢骚。在二战刚结束的几个月里，他在波兰，从早先杀害犹太人的AK组织中逮捕了许多波兰人，把他们交给苏联政府监禁起来。乌克兰游击队中的一些犹太人，为了报仇雪恨，临时加入了苏维埃秘密警察，他们都亲自逮捕和清算过纳粹的合作者。^①

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前游击队员，是“复仇者组织”的成员，谈到他的复仇行动：

我杀死了4个纳粹罪犯。在奥地利格拉兹附近的朱登伯格，曾有一个难民营，里面住着很多犹太人，他们有的来自南斯拉夫。我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共同负责难民营，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一个叫阿洛伊斯·高恩达的纳粹罪犯正藏在该区中。我询问难民营里的一些犹太人，试图找出更多有关高恩达的罪行。只有来自南斯拉夫的人清楚地记得他，高恩达曾经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中声名狼藉的

^① 塞格夫：《第700万》，第141页。

安提·帕维利克的同伙，他在扎格里伯呆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绞尽脑汁，用各种酷刑“审问”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在犹太人成批送往死亡集中营以前，他们被集中在一起，在这种场合，高恩达总是在场。数十人作证，他们亲眼看到他枪杀儿童，从母亲的怀抱里抢走婴儿，猛掷到地上，把孩子摔得头破血流。

当局势发生变化后，高恩达逃得无影无踪。他穿过边境，在一家游乐场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游乐场在朱登伯格附近建起了场地和杂耍区，高恩达从事能发挥他特长的的工作，负责打靶场。

我们一行4人（3位从南斯拉夫来的犹太人和我）来到露天游乐场。守卫难民营的盟军士兵把枪借给我们。大约在早上10点钟，我们来到射击场，那里除了高恩达之外，没有别人。我们问他能否用他的枪打靶，他就把自己的来福枪递给我们。当假人滑动的时候，我们朝它们开了枪。之后，我让两个人放风，我对高恩达说：“我知道你是谁，在扎格里伯你和尤斯塔沙在一起，你们残害了数百名无辜的人。”

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脱身，就像其他人一样，想找借口拖延时间：“那不是我的错，我只是奉命行事。”

我们用他的来福枪和自己的枪同时向他射击，他缓缓倒下，死在打靶场上。

第二个人是在巴德奥斯干掉的。我化装成纳粹党卫军的一个成员，来到艾希曼的前妻和孩子们住的地方，希望发现一些线索。

碰巧，我结识了一个名叫冈瑟·哈利的古董商，他私下里告诉我，他销售的大多数物品都是从犹太人家里抢来

的。接着，他向我吹嘘自己参与了镇压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起义，还特别详细地描述了他是如何开枪打死最后几个犹太人的。听着这些，我尽最大的努力强压住怒火。

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战友到他家里，把他抓起来。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身份并宣判了他的死刑。之后，我们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嘴里塞满东西，同一块大石头系在一起，然后扔到湖里。就我所知，他的家人一直都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第三次处决行动发生在维也纳郊外美丽的威纳沃尔德森林中。一些咨询中心的犹太难民和其他在罗思查德医院避难的人，为了生存而进行黑市交易。有一个男子经常来看他们的交易。一天，有一个难民突然记起以前曾经见过他，他的名字叫约瑟夫·贝尔基，曾在波兰的切斯托乔瓦杀害过许多犹太人。当初德军占领切斯托乔瓦城后，其军工厂中的一个负责人就是约瑟夫·贝尔基。那时在一些车间干活，需要提供特殊的手套和面具，以防酸的腐蚀。但是，当犹太人作为奴隶在工厂干活时，即便对妇女和孩子，贝尔基也下令不发给他们手套和面罩，他还十分得意地看着犹太人被酸腐蚀后的惨状。如果这些犹太人提出要去看病，他就把他们都杀掉。

约瑟夫·贝尔基是一个为了钱而无恶不作的人，我们以与他做交易为借口，在一天夜晚把他诱到森林里。在那儿，借着火把的光亮，我们对他进行指控和审讯，宣判他的死刑，然后用丝袜把他勒死，将尸体埋在树下。

对这一切，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懊悔，谁会懊悔呢？^①

^① 巴佐哈：《复仇者》，第73-76页。

幸存者的另一复仇对象是犹太变节者。保罗·汉德尔住在慕尼黑附近费尔德尔芬难民营的前德军营房中。在刚刚解放时，他亲眼目睹了幸存者围攻和痛打犹太囚犯头的复仇事件。在以色列，幸存者也纷纷向警察局检举犹太卖国贼。195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有关惩治纳粹分子和犹太变节者的法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约有30名犹太变节嫌疑人受到调查。但是，官方对此反应冷淡，^①法官们也保持沉默。最高法院法官莫舍·西尔伯曾写道：“对我们这些以色列法官来说，很难从感情中摆脱出来。惩罚这类可怜虫使我们感到降低身份。追究起来的话，罪魁祸首还是纳粹分子。”^②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屠杀幸存者主要把他们的满腔怒火发泄在那些非犹太人身上。他们不愿谈论变节者，也不倾向于谴责那种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变节行为。或许幸存者们已经发现，他们自己出于自我保护的欲望也曾做过某些不太光彩的事情。或许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上，无法用简单的是非标准进行判定。1946年10月的一天，当杰里·辛格在斯图加特的街上散步时，与一个过去的犹太囚犯头相遇。“我真想揍他……然而，我不知道该不该因他过去的行为谴责他。”

彼得·威登写过一本名为《斯特拉》的书，书中涉及到一个在柏林声名狼藉的犹太“追捕手”（他帮助盖世太保追捕犹太同胞）。彼得·威登说，犹太领导人在欧洲组成了一个“道义法庭”，用以审判那些出卖良心的人。这些非官方的仲裁者们也会仔细考虑当时所处的环境，查看是否情有可原。

^① 塞格夫：《第700万》，第261页。

^② 《最高法院的意见》，耶路撒冷司法部，1959年，第8卷，第1056页。

那些自我任命的法庭不能超出犹太人内部事务的权限进行惩罚，他们最严厉的判决不过是逐出教会，也就是说让那些人不配享有特殊的权利。……犹太法庭不辞辛劳地对审判给予公正的评价，他们对被告的处理有时让人觉得过于慈悲。

该法庭位于柏林市乔奇马斯塔勒大街13号，在犹太人社区办公室存在了十几年。由一位大屠杀幸存下来的律师担任主席，另一位幸存的律师协助他，同时还需要有至少两位中立的陪审员。他们传唤所有能找到的证人，包括起诉人和辩护人，双方的证词均被审核和考虑。

即便是普遍被人鄙视的变节者——囚犯头，也会获得听证的机会，有时甚至会否决一些不实之辞。战后审判的案例之一，是对名为哈里·施瓦茨的犹太人的审判，他的案件于1947年1月9日审理。

5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曾经在波兰普拉斯乔的小型集中营与施瓦茨是狱友。在那里，被告的确被纳粹任命为囚犯头，证人们指证他在那儿打过犹太同胞。

当施瓦茨的变节历史被“道义法庭”受理时，人们发现，当时他才18岁，正忍受着极度虚弱、饥饿、双脚浮肿的痛苦。施瓦茨承认偶尔用手打过犯人，但那不过是在纳粹的粗暴威胁下不得已才做的事情。

还有人指控他在集中营偷过食物。但是，事实表明，普拉斯乔是一座不同寻常的集中营，在该集中营中关押的大部分是波兰人和非犹太人，这些犯人确实得到比犹太人更多的食物。证人作证，波兰人有剩余的食物，而施瓦茨只是从他们那里偷食物，他从来没有剥夺过犹太人的食物，也没有虐待过他人。

法庭的判决是：“哈里·施瓦茨没有迫害犹太人。”

……在奥地利，西蒙·威森索尔创建并管理着一个犹太人的“纪律委员会”。西蒙是莫索森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人物。该委员会经过严密追查，证实有30个曾为纳粹效过力的奥地利犹太人有罪。^①

愤怒妨碍了人生，使人长时间生活在痛苦之中。因此，幸存者尽量尝试改变现状，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总是怨愤满腔，他们不得不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愤恨……把我们每个人都钉在过去苦难的十字架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愤恨的人无法融入周围和谐与和平的气氛中。因此，人们提出一种快乐主义的建议：让我们忘掉过去，放眼未来，努力追求共同的美好生活。”^②

因为大多数幸存者的满腔怒火都淤积在心灵的表层，所以在情绪不佳的时候，在高度敏感的时候，在焦躁不安的时候，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在内疚懊悔的时候（对自身的愤怒），就会无法扼制地喷发而出。但是，幸存者们也发现了某些积极的办法来转移难以平抑的愤慨。二战结束后，许多人聚集到巴勒斯坦，积极参与了战后重建工作。幸存者排除各种障碍，热情地支持以色列的发展。他们对大屠杀一直保持着鲜活的记忆，这是对战争罪犯的无声控诉（一种持续不断的复仇形式）。他们尊崇受害者，通过公共的纪念活动来声讨、制止罪恶。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存在和犹太人一代又一代的新生，他们执著

① 彼得·威登：《斯特拉》，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2年，第273-276页。

② 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第69页。艾默里后因愤怒异常而又无法宣泄，便愤然自杀。

地坚信纳粹主义注定要失败。

记忆和纪念并不具有惩罚的力量，幸存者需要极为隐蔽的复仇形式。由于受犹太文化传统制约，他们不愿承认复仇的内在此在动机。正如苏珊·雅各比在一篇有关复仇的论文《野性的正义》中所阐述的，寻求复仇往往是心理不平衡的表现。

赫迈因·瑞安同她的美国军人丈夫从德国移居到美国后的20年里，一直是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居住在纽约市郊区的一个住宅区里。但是，1972年，她被美国移民和归化局送上法庭。对她的指控是：她曾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原名叫奥弗斯海茵·赫迈·因布劳斯坦纳，是马丹尼克死亡集中营的一个罪恶的军官。

在驱逐出境的听证会上，大多数证人都是马丹尼克集中营的幸存者。瑞安的辩护律师问所有的人，他们是否“出于复仇”的动机，但是所有的人都以克制性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声调说，他们仅仅是想得到公正的判决。

……一位记者问：“你为什么在这里？”……证人用异样的口吻反问道：“我为什么在这里？”那语气显示出对记者提问的不满。“我在这儿当然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们。”当天晚些时候，该记者告诉他的同事：“看得出来，这就是对那个女人的复仇。”^①

人们经常残忍地要求幸存者通过宽恕来表现他们少有的同情心。而幸存者往往冷静地回答：我没有权力忘掉死者。在这

^① 苏珊·雅各比：《野性的正义》，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个世界上，杀人凶手们又何尝有人站出来认罪呢？有谁会说“对不起”？有谁承认“我做了可怕的事情”？有谁不立即为自己找借口、理由进行辩护，而承认自己做了错事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宽恕问题竟然导致了一场辩论。有人提出，在指控中要注意区别无辜和保护大多数（那些不是积极主动参与纳粹杀人活动的人，那些当时非常年轻不应该负责的人，那些战后出生的人）。他们对幸存者提出这些区别，是为了减轻对自己的谴责。幸存者们想知道：在大屠杀中，怜悯在哪里？耻辱在哪里？惩罚的确实证据在哪里？引人注重的惩罚限制又在哪里？因为不存在对凶手进行正义的惩罚，所以幸存者们尚未得到满足和安慰。相反，环境要求他们向前看，忘记过去，原谅过去，以便让其他人感到舒服。

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因为那是对死难者的侮辱！

第十一章 集体的罪责

我问大屠杀幸存者：“在 1945 年的时候，如果你是法官或陪审员，你会怎么惩罚德国人呢？”

——“扔一颗原子弹，把他们斩尽杀绝。”

——“他们怎么对付犹太人，就怎么对付他们。”

——“让他们在地上爬，也让他们吃 50 年的霉面包，喝 50 年的脏水。”

大屠杀幸存者想让德国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愤怒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实的政治情形是：同盟国希望保存强大的西德作为缓冲器，对付来自东方的潜在威胁。杰克·戴蒙德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曾经目睹过好几次对战犯的审判。他说：“在 1945 年，我一直坚持必须杀死所有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不论他是一个官僚，还是纳粹党卫军或者是一个小职员。此外，我觉得还应该让德国人受 50 年的惩罚，马歇尔计划^①是错误的。我确信，在德国废除死刑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严格地说，它救了那些纳粹分子，树立

^① 1947 年 6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时，提出的援助欧洲恢复经济的计划。该计划有助于美国对西欧的控制，并在客观上使德国在 60 年代初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译者注

了坏榜样！如果那些罪人逃脱了杀人犯应受的惩罚，就会鼓励其他人犯罪。为了死去的父母，我怎么能忍受这种判决呢？这是同盟国的错误……太便宜德国人了。这些讨厌的家伙，简直令人心寒。我不在乎他们是否为此而努力，他们根本不配。我不相信集体的罪责，我认为，即使让他们的后人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用他们的劳动果实赔偿给世界上遭受其迫害的所有人也是没有意义的，罪犯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纽伦堡审判是惩罚的一个缩影，它使得少数臭名昭著的纳粹头目受到审讯。但是，同盟国出于自身的利益，想使德国恢复兴活力，所以，纳粹教员轻松地返回了教室；纳粹医生恢复了行医；纳粹法官再次穿上他们的制服。第三帝国的帷幕落下来，没有人再谈论过去的岁月，一切又恢复正常。正如琼·艾默里在1976年所写的：

德国人把自己看成是牺牲品，自称他们过去也遭受过各种苦难。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冬天的战役中，在德国本土众多城市遭到的轰炸中，在纽伦堡的审判中，他们都曾吃过苦；更为悲惨的是，他们的国家战后被一分为二。因此，他们不愿意再代第三帝国受过，正如有人回忆所说的那样，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批判”它。

1958年，我在一家旅馆吃早餐的时候，曾与来自德国南方的一位商人进行交谈。首先他有礼貌地问我是不是以色列人，然后就试图让我相信，在他的国家不会再有任何种族仇恨。他说，德国人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不再怨恨犹太人，对抵抗战士和犹太人也没有异类的感觉了。

可是那些犹太人怎么还在要求赔偿呢？^①

德国人知道，过去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政治的牺牲品，由此煽起了民众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凡尔赛条约》强迫德国陷入悲惨的经济困境，剥夺了德国的财产（殖民地），强迫德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正是由于犹太人煽动不必要的投降，因此首先使“德国的背后被戳了一刀”。在第三帝国的宣传中，也包含着把自己视为受害者的内容。在1934年上演的一出戏中，就曾经含蓄地把希特勒等同于耶稣，把雅利安的卫兵描绘成使徒。

对受害者和侵略者定义的模糊不清，从希特勒对一群纳粹军官臭名昭著的演说中可以找到最好的证据。在希特勒的演说中，他吹捧了他们在消灭犹太人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的精神”：

在你们到来之前，我就想提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此时此刻，在我们中间，必须十分坦率地强调……驱逐犹太人，灭绝犹太民族。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容易，每个党员都说：“犹太民族即将灭亡。”“消灭犹太人，灭绝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八千万高贵的德国人，每个人都可以挑选一个犹太人做奴仆，其他的人都应该剿灭。然而，只有人谈论这种方法，却没有人看到它的实施，也没有人亲自去实践过。你们大多数人必须了解这一点，看到100、500或1000具排列整齐的犹太人尸体的意义。为了坚持到底，为了消除人类的弱点，为了

^① 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第66页。

保持我们的完整性，我们必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在我们的历史中，它是尚未载入史册、也永远不会载入史册的最光辉的一页。^①

艾默里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作品中，就预见到未来的声名狼藉的公开辩论。在 1986 年，就第三帝国历史和德国人的名誉问题，曾经爆发了为世人所熟知的争论。^②朱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一份著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清算罪行的形式：德国现代历史作品中的道貌倾向》的文章。在文章中，哈贝马斯对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专门研究纳粹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德国著名专家）所写的一本书进行批驳，同时也对厄恩斯特·诺尔蒂和迈克尔·斯特默两位知名学者所写的文章进行批判。哈贝马斯反对大屠杀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思潮认为，大屠杀事出有因，必须从前后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大屠杀。德国人屠杀 600 万犹太人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德国政治中，并非存在着某种决定性和致命性因素。希尔格鲁伯、诺尔蒂和斯特默都持有这种看法。

查尔斯·梅尔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不可驾驭的过去：历史、大屠杀和德意志民族的同一性》一书的作者。他评述道：许多新修正主义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纳粹主义不过是对共产主义的反动”。（诺尔蒂由于其理论而臭名昭著。他认为，尽管有争议，但是，希特勒当年入侵苏联是一种自卫行

^① 露西·道威多维兹：《反对犹太人的战争》，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5 年，第 149 页。见《对主要战犯的审判》文件，1919RS。

^② 当时在德国掀起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试图为大屠杀暴行进行辩护，遭到包括犹太人在内的维护正义人士的强烈抗议。——译者注

为，是为了反对来自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民族的潜在威胁。按照他的说法，大屠杀或者“所谓的消灭犹太人”不过是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反应，甚至只是模仿而已。)①因此，修正主义就成为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用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进一步加强对西方的亲和力。修正主义者一直利用历史文件作为手段，反复强调其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确保西德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纠正1968年以后出现的学术政治化的左派倾向。②

当然，随着德国重新统一，东德人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围绕着修正主义的敏感话题做文章，相反，他们持有另一种观点。他们的看法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类已消除了种族的差异。

缺乏对大屠杀凶手的惩罚，导致人们不信任幸存者的人品甚至对其冷嘲热讽。在解放后的数年中，当幸存者试图讲述他们亲眼目睹的恐怖事件时，人们不愿意听。在后来的年代里，愈来愈明显的是，竟然没有人再度谴责那些迫害者。另一个迹象是，全世界都习以为常，幸存者成了无人过问的无辜受害者。对于幸存者来说，由于罪犯没有对所犯的罪行进行赔偿，所以他们的痛苦得不到减轻，内心感到极不平衡。这就进一步证明：世界没有什么道德秩序可言。大屠杀是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幸存者被剥夺了获得安宁的权利。社会应当保护犹太人，制止任何进一步的迫害。

德国对自己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缺乏反省。到1968年为止，他们一直都在装聋作哑。由于学生的抗议运动席卷了整个

① 厄恩斯特·诺尔蒂：《神话还是修正主义》，第17—38页。

② 查尔斯·梅尔：《不可驾驭的过去：历史、大屠杀和德意志民族的同一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

西欧，德国形成了反对正统派的组织，孩子们对第三帝国的参与者进行质问。在德国，战后第二代人在学校很少能听到有关大屠杀的事情，正如许多人告诉我的那样：“德国历史课似乎到1933年就结束了。”毕竟他们的老师早在几年以前还效忠纳粹。但是，在1968年时，已经是成年人的德国孩子问自己的父母：“爸爸，在战争中你都干了些什么？”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很简单：不过是私人的、家庭的事情。1979年1月，当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在西德电视台公开播出后，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反对的呼声。

许多德国人对连续剧《大屠杀》的指控表示愤怒。在梅因兹，有人扬言用炸弹炸毁西德电视台的广播设备。但是，与此同时，《与过去有关的条款》却得以顺利通过。该条款的某些部分涉及到在海上打捞德国战争期间的沉船或飞机残骸（查尔斯·梅尔称这段历史为“有用的过去”）。其蕴涵的目的是，战后几代人应该对40年前父辈和祖父辈所做的事情负责。

大屠杀幸存者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一些人极度仇恨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和其他德国人，他们发自内心的仇恨使自己难以从理性上划分罪犯的界限。“我恨他们，他们都是毒蛇。当我看见德国人时，就控制不住自己。我不理解的是，有些犹太人竟开着奔驰轿车或者到德国去旅行。”幸存者认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这种民族特性，为各种针对犹太人的犯罪提供了条件。索娅·韦斯说：“在某种程度上，德国后来出生的年轻人对他们父辈所犯的罪行是不应该负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父辈更好一些。在一定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那样做。不要欺骗自己，如果他们控制世界的话，他们难道会不高兴吗？我从来不信任他们，我要尽可能远离他们。”对于像索娅·韦斯那样的幸存者来说，对德国人的宽恕无异于把犹

太人置于万劫不复的险境。

然而，67岁的卡拉·格拉诺特却将纳粹罪犯与那些后来出生的年轻人区分开来。“现在已经有三代人，所以你不能谴责所有的人。我还是认为要把那些在军队或在纳粹党卫军中服役过的老家伙堆在一起，烧死他们。”

那些年轻的德国人也试图把自己与长辈所犯的罪行区别开来，因为他们不能对父母或祖父母所犯罪行负责。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对他们的责备，他们感觉轻松了许多。在1987年赫尔穆特·科尔首相对以色列的国事访问中，他把德国的罪责精炼为“后生者的祝福”。科尔对以色列人说，他出生于1930年，当纳粹上台时，他甚至不满3岁，所以，他不希望为此感到坐卧不安。

在第二代德国人的成长过程中，大屠杀的有关信息遭到否认，他们的孩子经常通过二手资料来了解各种暴行。第二代的学校教师对其父辈们的罪行感到愤怒，有时自己还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强调道义上的教训，这些教训来自学生们的祖父辈和曾祖父辈的野蛮行为。人们可以理解，在德国第三代人中，许多人都强烈拒绝与过去的集体罪责之间的牵连。对于他们来说，第三帝国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为什么我必须与那么遥远的行为有关联呢？加入到对以色列政策的谴责行列中，成了他们发泄愤恨的方式。他们指出，犹太人也迫害人，他们试图通过魔术般的调和，洗刷掉自己国家的可耻历史；通过把犹太人说成是压迫者，从而减少对犹太受害者的同情。

有些幸存者，在痛苦的岁月里，曾得到过某个特殊的德国人或非犹太人的仁慈对待，这些人最倾向于把德国罪犯和无辜者区分开。72岁的阿贝·斯塔克在洛杉矶郊外新开发的小区里生活，那里风景如画，绿树成荫。他把房子布置成一个私人大

屠杀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复杂的、小规模德国奴隶集中营的复制品，他曾被监禁在这个集中营里。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图表和照片贴在墙上，一摞摞与大屠杀有关的文章堆放在书架上。

阿贝说：“有一个德国工头，大约30岁，他曾经说，战前他是社会民主党员。因为那时已经是1944年，我非常虚弱，还要用手搅拌水泥。我问他是否可以给我找一个轻松点的工作，因为我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第二天早晨，他把我带到工厂的地下室，他在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巨大的黄色圆圈，然后对我说：‘从中心开始挖，直到那一边。’我知道他们有电动工具，可以很快干完这个活。但他对我说：‘不用着急，当你挖到那边时，战争就会结束了。’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当他离开我时，我感动得哭了，这是长时间以来我遇到的第一个仁慈的德国人。我呆在那里‘工作’，一直到1945年。这个工作使我得以恢复体力并且幸存下来。”

在不屈不挠地与邪恶的斗争中，人类善良的行为改变了阿贝·斯塔克对于人本性邪恶的看法。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有这样一句格言：“当你拯救了一个生命，就如同拯救了全世界。”这句格言应当修改为：当你拯救了一个生命，你所拯救的人就不会再把整个世界看成是邪恶的。我问阿贝：“你怎么看待德国人？”他说：“这是一种感情上的考虑，要知道，你不能把所有德国人都看成是坏人。他们尊敬自己的祖先，那是因为祖先给他们留下了许多好东西。你不能谴责所有的德国人，有不少像威利·布兰德那样的人，你不能把他们与戈林（纳粹头目之一）同等看待。”

反过来，我也体会过许多幸存者的满腔仇恨，他们都经历过德国人或非犹太人的背叛行径。人的背信弃义的本性助长了

对仁慈的玩世不恭的看法。背叛使人感到孤独，这使个人与他人的界线开始变得截然对立，或许永远不能沟通。

幸存者对于任何德国人妄图修改第三帝国历史或是改变其一贯的政策都高度敏感。他们对赫尔穆特·科尔邀请里根总统在彼特博格公墓敬献花圈一事表示震怒，因为那是埋葬纳粹党卫军成员的地方。在纪念仪式上，纳粹分子被当做纳粹统治下的受害者加以颂扬。有人混淆视听，篡改记录，使大规模的屠杀变得无足轻重。

然而，幸存者也许对1988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事件最为忧虑不安。40年前，当德国复兴的时候，幸存者就感到过沮丧。在我与幸存者的谈话中，我反复听他们说：“我无法置信，他们居然能得到同盟国的帮助，应该让他们多吃点苦头。”

祖国的分裂也许是德国惟一明显的、可以辨认的惩罚，这堵墙作为侵略的提醒物最终建立起来。当东德一块砖一块砖地拆毁这一象征的时候，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50年前，即1938年11月9日，德国人开始在本土开展了最大规模的犯罪活动，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犹太人及他们的财富、宗教机构和文化，史称“砸碎玻璃之夜”。

幸存者无不感到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他们对于发往世界各地的庆祝照片感到由衷的害怕。本·卡斯无可奈何地抗议到：“他们运气太好了，他们还没有还清欠我们犹太人的债。当柏林墙立在那里的時候，我非常高兴。如果东德现在独立，起码会使西德受到俄国的监视……我原以为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墙的倒塌，而现在我却活着看到了。”

幸存者并没有把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冷战时期的民主胜利。尽管自由世界曾向数百万受压迫的人许过诺言，但是幸存者不

再相信他们所承诺的自由。由于这堵墙曾经削弱了德国潜在的力量，所以，它的拆除给许多人带来焦虑和不安。多拉·莱文森告诉我：“对于墙的倒塌，我很担忧，我始终害怕德国的力量。事实上，如果没有犹太人的谴责，事情会变得更糟糕。他们马上就会重新振兴，飞快地从灰烬中崛起。你应当看到的，在1945年，德国被毁坏到什么程度，我的天，他们又是如何兴起的。”就像在50年以前，当犹太人被昂首挺胸、金发碧眼、穿着打蜡的长筒黑靴子、外表看来不可一世的压迫者屠杀的时候，多拉与许多人一样，已经预见到那个国家恶魔般的力量。他们为此感到胆战心惊：“我的天，他们又兴起来了。”

以色列人曾经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感情做过比较研究。1990年拥有最多读者的一家犹太报纸进行了一次调查，主要是看人们对德国统一有什么反应。分析结果显示，36%的人认为统一是一件积极的事情，28%的人反对统一，35%的人对统一不关心。显然，对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德国统一既未引起恐惧和忧虑，也未在幸存者中引起明显的焦虑。的确，三分之一强的犹太人根本就不关心，^①也许可以理解的是，以色列人更关注于自身的安全，因为他们总是面临来自邻国的持续不断的威胁。

1939年，西欧的犹太人远远少于东欧或中欧。截止到1945年，40%的西欧犹太人以及90%的东欧犹太人惨遭杀害。西方犹太人已经被同化到他们所在的国家和社会当中，因此，他们并不乐意认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更难区分开来予以消灭。他们的非犹太人的邻居往往愿意把他们掩护起来，使他们

^① 《关于德国统一的公众立场》，《Yediot Aharonot》，1990年7月6日，第1页。

容易进入抵抗组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二战期间西欧国家缺少反犹太人的情绪。相反，臭名昭著的法国维希政权在周边国家的支持下，非常热衷与德国当局的合作，围捕犹太人，尤其是外国的犹太人，将他们流放到东部的杀人中心。丹麦也许是欧洲大陆西部惟一被占领的国家，它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反犹太人的偏见。戴维·希曼尔斯坦是比利时公民，当战争扩展到他的国家时，他与妻子和孩子们装扮成非犹太人逃到法国南部，但却被法奸保安队全力追捕，遭到虐待，最后于1942年9月从德兰斯被驱逐。戴维抱着发高烧的女儿，经过三天三夜，全家人到了达奥斯威辛。在那里他们一家人立即被分开，彼此再也未能见到。戴维被送到西里西亚的佩斯克雷奇，那里是奥斯威辛附属劳动营。他从那里逃跑，历经千辛万苦，返回比利时，住在比利时南部里森萨一个非犹太人的小镇上。一天早上，他在房东的厨房里听收音机，里面广播俄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消息，那里发现了20万双儿童鞋。戴维听后哭了起来，但他的房东却劝慰他说：“你为什么哭，那不过是一些犹太儿童。”

因为大多数被同化的西方犹太人不仅要认同他们的祖国，还要认同民主启蒙思想，他们没想到同胞会出卖他们，这使他们感到震惊。在其他方面，西方犹太人感到，与那些落后的、留胡须、穿束腰长袍的东方老表们相比，他们与德国、法国或荷兰的邻居们更为接近。

前奥匈帝国以及更东边的一些国家，如波兰和罗马尼亚都具有反犹太主义倾向。有很多强烈反对犹太主义的法西斯组织：斯洛伐克的“赫林卡卫士”、克罗地亚的“尤斯塔沙”、匈牙利的“穿越之箭”、罗马尼亚的“钢铁卫士”、波兰的“恩德克”。这些团体由组织严密的骨干成员构成，在德国入侵之前

就十分活跃。数世纪以来，由于天主教神学对犹太教的蔑视，由于地方贵族势力把农民的痛苦巧妙地转嫁到犹太人身上，致使对犹太人的厌恶之情广为蔓延。这些地区新生的民族运动的向心力也促使人们把犹太人当做“外人”，他们认为，犹太人只忠实于本民族，因此是易于背叛的，不值得信赖。

玛莎·贾纳斯在切尔姆长大，1942年逃往华沙，后来被派到格拉劳动营并被分配在一个工厂工作。我问玛莎：“你对波兰人的感觉如何？”她回答：这些年来，在集中营里我都不害怕德国人。但是，有些波兰人却总是到处询问，试图搜寻犹太人。”

从其他二战前就生活在波兰的幸存者口中，我听到：“德国人？我不相信他们。波兰人？我更加不信任他们。因为那里的教会势力很大，而教会是特别反犹太主义的。当我们被驱逐出境而遭到围捕时，竟然有一些波兰人做纳粹的帮凶。”

解放后，当幸存者零零散散地返回波兰时，他们发现他们的邻居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哎呀！你回来了？他们没有把你们都杀了？”邻居的失望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斩掉犹太人这条祸根，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愿让出已经占有的犹太人的房屋和产业。他们的失望和贪婪促使他们杀害了许多犹太人。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没有想到会遭此不测，他们还以为自己会比纳粹迫害者活得更长久。

来自其他国家的幸存者都不再同情他们原先的同胞。

“匈牙利人？我对他们比对德国人还要仇恨。”

“奥地利人都是纳粹分子，他们一直是反犹太人的，甚至比德国人更有过之。”

“罗马尼亚人是野蛮的，是畜生。”

“我也不相信比利时人。”

实际上，只有捷克人（那些来自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和意大利人没有受到我所采访的幸存者的指责。少有的仁慈，所以异常珍贵。伯利纳·索尔·哈尔彭在1939年1月非法穿越比利时边境。1940年5月，他被法国和比利时警察从非犹太人的村庄查出来，送到法国南部。他从法国和德国势力范围内跑出来，在意大利占领区找到了落脚之处。在意大利投降同盟国后，德国人随后占领了该地区，意大利人帮助索尔和数百名犹太人向东转移，穿山越岭，深入到他们的国家。当索尔告诉我那些意大利人为他们这些受人猎捕的“贱民”提供避难所、食物和钱财的时候，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现年79岁的保罗·李^①在战争爆发时，是克拉寇犹太体育学校一名体育教师，也是一名波兰陆军军官。很明显，他是一个行为反常的人。由于保罗曾被一位非犹太人营救，也由于在战前他就把自己看成是更具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提出了与我所采访过的其他幸存者迥然不同的看法，“不幸的是，波兰的犹太知识分子首先遭到屠杀。那些幸存下来的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与波兰离心离德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我来自克拉寇，那里是犹太文化的中心，甚至虔诚的犹太教徒也讲一口道地的波兰话。在波兰东部地区，当地波兰人受到的教育少，所以反犹太主义的宗教势力极为强大。对于犹太人来说，波兰是一个天堂。为什么在波兰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呢？因为他们来说，波兰比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或者荷兰更好。”

在战争期间，也有一些非犹太人，敢于冒个人甚至是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来救助犹太人。犹太人也赞美那些具有高尚道

^① 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该电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德、反对贪婪掠夺犹太民族的人。有关资料保存在大屠杀的纪念馆和耶路撒冷资料中心，由犹太人组成的国际组织也一直在前线寻找和发现这些善男信女。那些被非犹太人的邻居掩护过的幸存者，定期为这些热心人汇去一笔钱，作为他们感激的象征，而那些救助者们直到今天还生活在铁幕的后面。然而，在幸存者中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不同意“正直的非犹太人”的一般说法。

哈里·蒂索尔是家中惟一的幸存者，他有9个兄弟姐妹，他对波兰同胞非常了解。“他们比德国人更坏，是他们帮助德国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他们在这里谈论‘正直’，在那里谈论‘正直’，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正直可言，一点也没有。”对于幸存者来讲，“正直的非犹太人”运用了毫无根据的逻辑对称方法：即有一些坏的非犹太人，也有一些好的非犹太人。事实上，占绝大多数的非犹太人（尤其在中欧和东欧）在屠杀犹太人方面都是积极地参与或者消极地顺从，大多数的例子表明，这些地区的非犹太人很高兴有人承担这项任务。

74岁的萨拉·施奈德曾经遭受迫害，被匈牙利同胞和纳粹分子出卖。她说：“对我来说，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任何犹太人都都是宝贵的。基督徒则不同。非犹太人，我憎恨他们，我能忘记他们杀死我的父母吗？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不会。”

的确，作为幸存者的孩子，我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谆谆教导我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要泾渭分明。不但我的祖父母和5个姨妈被他们杀害，而且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在试图装扮成一个非犹太人时，在华沙的电车上被一个波兰人认出，他喊来盖世太保，把他逮捕了。

我所了解的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非犹太人。我们人少，他们人多。非犹太人不同于犹太人，他们是粗野的，我们是敏感的和人道的。他们的迫害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为了社区和安全，我们必须依靠自己。要避免非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犹太人的生存总是处于危险，所以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民族身上。我们住在美国，但是我们是犹太人和外国侨民，像这样的情况已经延续数代。我们住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恨我们，或许什么时候他们会起来杀死我们。^①

因为“正直的非犹太人”的说法带有历史修正主义的味道，所以使幸存者感到忧虑不安。“他们在这里谈论‘正直’，在那里谈论‘正直’，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正直可言，一点也没有。”很多幸存者觉得，并不只是纳粹造成了大屠杀，而是因为非犹太人。大屠杀只是非犹太人两千年来迫害的极点，他们总是憎恨犹太人。幸存者相信，非犹太人将永远憎恨犹太人。

对修正主义的担心还在于，它不公平地驱使幸存者谈论他们不愿意谈论的犹太变节者。是基督徒杀害了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杀害了他们自己。许多人已经感到疑惑，而另一些人则猜测，一定是犹太人做过什么，才使他们惹祸上身。出于天性人们相信，坏事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犹太人真是变节者或杀人犯，那么数世纪以来基督徒加给犹太人身上的不道德的形象就会得到证实，基督徒所犯的罪行就会得到赦免。

^① 哈斯：《大屠杀的阴影》，第106页。

相信人的善良可以带来安慰，对人类的全面信任和认同，也可以提供某种保护的盾牌，可以免于受到另一群人的攻击。但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断言，犹太人过去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今后还会被分开。因此，幸存者否认人是善良的这类安慰说法。

每一天我都对世界失去信心，命运未卜的犹太人，灾难深重的犹太人……必须毫无信心地生存下去。我的邻居以友好的方式向我打招呼：您好，先生。我脱下帽子：您好，太太。但是，太太和先生却仿佛远隔十万八千里。因为，过去，一位太太看见他们带走一位先生，透过正在启动的车子上紧锁的窗户，先生看到太太就像一个石头天使用般地无动于衷。^①

该隐与亚伯交战，几乎从一开始，罪恶的力量就预示着他们要超过善良的力量。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连他的兄弟都不相信的话，又怎能相信他的邻居呢？所以你不要期盼，要做最坏的打算。琼·艾默里在他自杀前几年曾写道：“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受过痛苦折磨的人，都不会再有世界是家园的感觉。他们不会再信任这个世界……从此以后，只有恐惧统治着他们。”

我经常考虑这种划分，这种划分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划分十分相似，他们要求把自己放在一个分隔间里，使他与别人完全分离。然而，正如我所说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一些日常生活，人们必须参与，家庭、孩子、他们

^① 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第94页。

的需要、每天的需要、工作等等，隔离不能阻碍这些事情，如果不摆脱这种隔离就无法开始正常的生活。然而，这种隔离却总是在那，它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一种世界观……这种感觉令人悲观……真正理解人、人类本性、死亡的真理，这是人类可望而不可及的。真理都是无情的，人们不可能真正地接受它。然而人们又必须继续生活，履行自己的职责。^①

人世间，人们既承受这世界的养育、救助和生存的保证，也会承受那炽热炭火的炙烤。幸存者已经认识到，善是超常的，而恶是常在的。过去，幸存者已经看到了虔诚的无力和罪恶的蔓延，他们理解他们的人类同伴，他们在不安中等待着下一次迫害的到来。

^① 兰格：《大屠杀的见证》，第59页。

第十二章 我们记住什么？

诸如“我为什么能活下来”的问题，在所有大屠杀幸存者中所激发出来的不是负疚感，而是责任感。幸存者很少去追捕纳粹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其他方式履行对死难者的职责：支持以色列；抚养犹太儿童以维持种族的延续；纪念 600 万死难者；凭良心作证，驳斥种种对事实的歪曲。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自信，消除原来的脆弱感和屈辱感。

什么也替代不了个人证词的强大力量。幸存者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种现象。每当我在课堂上讲到大屠杀时，个人证词就明显变成最重要的东西。学生感触最深的往往不是我所讲的课，也不是布置给他们该看的书，而是一盘 97 分钟的录像带，那上面记录了幸存者巴里·布鲁克所感、所见和所忍受的痛苦。

大多数人都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待大屠杀的，它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对于那些受到创伤的幸存者来说，这一事件的过程及其结果正在延续。对大屠杀余波的敏感，肯定会强化人们的意识，阻止其他潜在悲剧的发生。

当大屠杀的幸存者提供证据，说明创伤导致他们身体衰弱时，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天生的巨大的恢复能力。一些评论家强

调前者，而另一些人则坚持后者。其实，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幸存者发觉自己正处在两难境地。承认他们受到严重的伤害，意味着压迫者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但是否认那些伤害又可能暗示那些迫害算不了什么。

大屠杀的幸存者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的缩影，先知约伯的直系后代。犹太人总是被教导要牢记祖先们所遭受的苦难：在埃及充当奴隶；哈曼的种族灭绝阴谋；教堂被摧毁；因放逐而散居于世界各地。要求记住这一切的训诫，在《圣经》中出现过 169 次之多。但最根本的创伤是无限制的自我毁灭，因为它形成了持续的焦虑和无助感。所以，人们过美满、和平生活的能力被减弱了。犹太人不会把这些丰厚的遗产仅仅埋藏在极度痛苦的记忆中。

的确，我们也必须承认，正义感、善良、道德动机在那段绝望的时间里支撑着他们。然而，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好的利他的方面，不过是表现出人们自我保护的愿望。大屠杀暴露了人性中潜在的邪恶。我问从莫索森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的索尔·加伯：“你希望人们从大屠杀中记住什么？”他说：“这是人类在 20 世纪所谓的文明时代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必须弄清楚，人们怎么可以对飞溅在他们衣服上的孩子的脑浆麻木不仁呢？人们怎么能对一位母亲不要杀她的孩子的苦苦哀求置之不理呢？如果懂得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的灾难。”

虽然大屠杀曾使人们陷入怀疑或者负疚，同时也揭示出人们是多么轻而易举地杀戮与折磨同类，而且居然相信这是一件正确的甚至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它表明，人类很容易抑制住同情心。

把大屠杀说成是“残暴的野蛮事件”就会忽略重要的方

面。大屠杀是一些人强加给另一些人的。“当时，不仅是德国人，还有其他人也想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杀光犹太人之后就会杀黑人、棕色人和黄种人，最后只剩下那些金发碧眼的人。”

所以，绝大多数幸存者相信大屠杀会再次发生。对于我们当中没有经历过灾难的人来说，大屠杀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对于幸存者而言，大屠杀则更多地显示出正在进行中的犹太人的历史，被其他种族憎恶的历史。的确，幸存者坚持不能把大屠杀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这里有相关联系。人们在几乎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否定犹太人最基本的信仰；对于很多复杂问题，人类巧妙地找到简单的答案；人们轻而易举就找到一只替罪羊，通过打击别人来缓解自己的焦虑，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比其他种族更优越。

索尔·范戈尔德以学习犹太法典为借口，最终得到一张去美国的签证。“我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我到美国的第一天，乘公共汽车从迈阿密到纽约。在车上，我注意到一位黑人妇女对我很尊敬，而我却不过是一个经过伪装逃到美国的流浪汉而已。如果有人因为出身而忍受侮辱，那绝对不会是我。但是，很明显，世界并没有因为大屠杀的结束而改变。”

尽管 600 万是一个固定的抽象数字，幸存者希望人们记住，但这些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母亲、父亲、儿子、女儿。他们也希望我们完整评价那个难以康复的犹太世界。“东欧犹太人的动荡生活……混乱……推动力、文化、出版物。贫乏的经济生活、排犹主义，这种动荡生活是难以描述的……多样化的组织——犹太复国主义、佛教。当开始选举时，在犹太人中出现骚乱。很难明白……很难理解……数千个犹太会堂。人们甚至不知道东欧失去了什么。”

不恰当地讲，新一轮的暴行淡化了人们对幸存者的同情，似乎人们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只能同情特定的群体。也许是在进行的暴力行为太多了，以至于人们不必对任何人寄予同情。安·查诺夫斯基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在大屠杀中相继遇害，他强调说：“我希望人们不仅记住这次屠杀，也要记住其他的屠杀。人们应当抗议和反对它，而不仅仅是了解它。”

大屠杀幸存者很快就会离开人世。毒气室、饥饿、恐惧、羞辱等都会随着幸存者的去世而被人淡忘。尽管反犹太主义者总是愤怒地谴责文身行为，但是幸存者胳膊上的数字已经不再刺痛他们的良心；一些犹太人提出的同化、接受或者“正常化”的简单要求，也让位于其他方面的受害者。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能力避免自己的意志薄弱和潜在的麻木，也有能力反对我们邻居的残忍行为。

一次，当我在犹太会堂的演讲结束后，有人问道：“难道不是时间的流逝使我们忘却了过去吗？”然而事实上，大屠杀幸存者是永远无法摆脱记忆的束缚的。他们内心长存的独白是：“我经历得太多了，人既然来到世间，就要坚强地活下去，但人不能忘却过去那刻骨铭心的苦难。”